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

延安时期

毛泽东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 与实践



陕西人民出版社

A84
65

88344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

DF-69/05

延安时期毛泽东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主 编 席文启

副主编 刘 阳 韩玉芳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陕)新登字004号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

延安时期毛泽东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主 编 席文启

副主编 刘 阳 韩玉芳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 376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5印张 6插页 147千字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5419—4989—2/G·4293

定 价：9.20元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彭 真 马文瑞
主 编 杨植霖 强晓初
副主编 李 鉴 吴 木 邵 华
王巨才 赵喜民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巨才 王海珠 孙钱章
刘益涛 刘孟泽 杨植霖
李 鉴 吴 木 邵 华
宋 柏 范 平 赵喜民
萧少秋 曾宪新 强晓初
廖广洲

总 序

DF69/03

为纪念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共同组织一套大型的“毛泽东在延安”丛书的编写工作。

这套丛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中共中央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前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重点是从遵义会议到新中国建立)这一历史阶段,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所进行的艰辛开拓和卓越奉献。

这一历史阶段,即延安时代是中国共产党人继井冈山时期之后,政治上更加成熟,组织上更加团结统一,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标志着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人政治上开始成熟和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的高超能力。后来,“左”倾的错误不仅在中央,而且在许多革命根据地也居于统治地位,中国革命和根据地的事业遭到严重损失,党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被迫进行长征转移。长征有遵义会议之前和之后的区别。长征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有客观原因,但主要是中央内部“左”倾错误的干扰,不能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持续胜利发展。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是党的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纠正了中央内部的“左”倾错误,进一步体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有能力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以后,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制定了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运用整风学习的方法,教育全党的干

部,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实现了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统一,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领导中国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事业的成就更加巨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历史阶段,在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的生涯中,是内容最丰富、成就最辉煌的一个时期。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著作以这一历史阶段写得最多,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最为显著。正是在这一历史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地总结人民群众的创造,划清了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界线;制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完整的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明确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条件,以及对建设新中国的初步规划;找到了加强党的建设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发扬和培育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克服了党内不良的作风,集中地形成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延安精神。正是在这一历史阶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独创性的贡献,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指导理论。

这一历史阶段,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所取得的历史成就和积累的丰富经验,是取之不尽的宝贵财富,全国人民可以从中多方面地汲取营养,增长智慧,取得借鉴,开拓今日的事业,奔向光辉的未来。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应该把这一历史阶段作为最主要的时期。

“毛泽东在延安”这套丛书的编写,许多同志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们表示衷心地感谢!当然,对于我们来说,这套丛书的编写出

版,只是研究这一历史阶段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工作的开端,愿同各方面有志于此项事业的人士,共同把这项事业开展下去,逐步取得更多的研究成果,以推动今天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

毛泽东在延安丛书编辑委员会

1993年7月1日

目 录

开篇的话	(1)
(一) 一个重要时期.....	(1)
(二) 若干基本特点.....	(2)
(三)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4)
一、牢牢掌握思想教育这个中心环节	(7)
(一) 从经济、政治、文化说起.....	(7)
(二) 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16)
(三) 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	(24)
二、从政治上动员民众	(33)
(一) 从政治上动员民众,是胜利的最基本条件.....	(33)
(二) 普遍而深入的民众政治动员	(40)
(三) 给群众以看得见的利益	(50)
三、把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	(62)
(一) 用进步的政治工作培育新型军队	(62)
(二) 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	(66)
(三) 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政治工作	(76)
四、把非无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	(82)
(一) 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82)
(二) 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87)
(三) 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94)

五、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	(104)
(一) 光辉的榜样.....	(104)
(二) 完全彻底为人民.....	(109)
(三) 巨大的威力.....	(119)
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扩大共产主义宣传.....	(125)
(一) 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125)
(二) 把共产主义宣传与当前纲领的实践统一起来	(135)
七、宣传鼓动工作要丰富形式,讲究艺术.....	(146)
(一) 宣传鼓动工作要丰富形式.....	(146)
(二) 宣传鼓动工作要讲究艺术.....	(161)
八、把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到文化工作中去	(174)
(一) 文化战线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重要战线.....	(174)
(二) 开通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渠道.....	(181)
(三) 在为群众服务中使群众受到教育.....	(189)
结束语: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196)

重要参考文献

后 记

开篇的话

（一）一个重要时期

从 1935 年 10 月到 1948 年 3 月，延安地区一直是中共中央所在地，这个时期也就构成了我党历史上的延安时期。长达 13 年之久的延安时期，无论是在党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历史上，还是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是一个孕育了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和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的极其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对于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来说，也同样是极其重要的。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既是马克思主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的综合运用，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毛泽东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又占有突出的地位。不论就其理论体系的完整性而言，还是就其理论内容的丰富性而言，都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发展史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阶段。甚至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列宁斯大林所继续，而在毛泽东那里得以成熟的。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集大成者。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在毛泽东全部

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中又占有特殊的地位。在这个时期中毛泽东早已发端的思想教育理论在各个方面都得到了扩展和加深。例如,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从党的干部的思想教育、党员的思想教育、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思想教育到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教育,都有系统的论述。又如,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教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国际国内战争形势的教育到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教育,无所不精。以至我们今天讲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不能不重复地谈到这个时期毛泽东领导我党进行的思想教育的伟大实践;讲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不能不屡屡涉及这个时期毛泽东的许许多多精彩的理论论述。

延安时期不愧是一个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发展史上的辉煌时期。

(二) 若干基本特点

概括毛泽东延安时期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有如下基本特点:

其一,从理论上说,把社会存在的决定作用和社会意识的强大反作用紧紧地结合起来了。这一时期,毛泽东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理论有很多论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这样一些观点:一切事情要人来做,做就必须先有人从客观事实中引出思想、道理等方能做得好的观点;思想性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起决定作用的观点;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观点;在战争中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民众的政治动员头等重要的观点;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的观点等。这些观点对那时的思

想政治教育实践起了指导思想的作用,同时又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伟大真理。

其二,从内容上说,把共产主义宣传与当前行动纲领的实践紧紧地结合起来了。如何把共产主义宣传与当前阶段的具体实践既互相区别又紧密结合,始终是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大问题。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出色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提出,一方面,我们应当扩大共产主义宣传,加紧马列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社会主义,也不能指导民主革命达到胜利;另一方面,我们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从事的是新民主主义的实践,没有这一纲领和这一实践,我们也不可能有民主革命的胜利,当然也就谈不上将来的社会主义。他要求我们既要把这二者严格区别开来,不能混为一谈;又要把这二者紧密结合起来,不能对立、割裂。前者是我们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指导思想,后者是我们进行实践的具体政策。没有前者的后者是盲目的,没有后者的前者是空洞的。一切以共产主义为最高纲领的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的同情者,都必须为着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毛泽东的这样一个基本思想,贯穿在整个延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全过程,为我们在各个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树立了典范。

其三,从方法上说,把说理教育与实践教育、形象教育紧紧地结合起来了。搞思想政治教育不能不进行说理教育,但要使说理教育更有效地发挥作用,还必须与实践教育、形象教育等紧密结合起来才行。毛泽东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把这两方面很好地结合起来了。他提倡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就和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动手开荒种地、纺线织布;他提倡青年知识分子走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就带头把儿子交给老农,拜师学艺;他提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就树立起白求恩、张思德等光辉榜样。这样一种说理教育与实践教育、形象教育紧密结合的方法极大地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威力。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所创造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的特点是多方面的,上述三个特点仅仅是其中的代表。

(三)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发展的重要阶段。但是,这个阶段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前有源头,后有活水,源远流长。

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发端可以上溯到建党前后的岁月。建党前的新民学会时期,他团结学友,办起《湘江评论》,宣传过新思潮;建党之初,他深入工农群众,以举办文化夜校等方式从事过启发工农阶级觉悟的活动;大革命时期,他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指导过革命宣传并亲自撰写了很多政治理论宣传文章。这些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为其后来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验基础。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1929年,毛泽东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会起草的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总结了建军初期思想教育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进行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系列方针原则,成为我党历史上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山巨著,标志着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开始形成。这部著作和同时期的其他一些著作对延安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发生了重大影响,延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几乎每一个重要思想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它的源头。它足以证明,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

的成熟绝非偶然。

毛泽东延安时期的思想 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在延安时期之后也没有停滞,它同样随着历史的潮流向前发展了。无论是在解放战争的最后阶段,还是在解放初期的艰难岁月;无论是在抗美援朝的前线,还是在“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甚或是后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年代,毛泽东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都有长足的发展。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观点,政治和经济、政治和业务的统一、又红又专的观点,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的观点,政治工作共产党要管、青年团也要管的观点等等,都是延安时期之后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精华。当然,这些观点不言而喻地与延安时期的思想同样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至于毛泽东晚年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上的许多失误,恰恰是违反了他在延安时期的正确思想和正确做法。

毛泽东延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不但源远流长,而且其本身也是博大精深的。或者说,正是它本身所具有的博大精深,昭示出它的源远,孕育了它的流长。

其博大,表现在这一时期在思想政治教育各方面都形成了一整套的思想。前面曾经谈到毛泽东这一时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教育内容、教育对象、教育方法等方面的论述,其实,这一时期他的有关论述还远不止于此。例如,关于军队政治工作三大原则(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瓦解敌军)的论述;关于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转变到无产阶级革命轨道的论述;关于整顿党的作风的论述;关于“团结——批评——团结”的论述;关于把思想教育寓于文化工作之中的论述;关于宣传鼓动工作的艺术的论述等等。这使得毛泽东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和相当广博的外延,实在无愧于博大二字。

其精深，表现在这一时期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各方面都提出了很深刻的思想。例如，毛泽东关于思想等第二性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具有决定性的反作用的思想。这个思想是毛泽东所独创的。马克思恩格斯早年比较重视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起决定的作用，对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论述不够充分。恩格斯在晚年的书信中大大地补充了这方面的思想，提出了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的系统理论。毛泽东的这个思想是沿着恩格斯的思路而来的，但又有新的发挥。它为我们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大作用提供了深刻的理论依据。又如，毛泽东关于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毛泽东论述这个问题的几篇文章中，已经构成了一个颇为全面的人生伦理的思想体系，他在为人民服务这个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核心思想基础上，阐发了共产主义战士所应具有的工作观、技术观、是非观、苦乐观、生死观，从而大大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生哲学理论。由这两个例子足以说明，毛泽东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所具有的精辟见解和深邃含义。

当然，我们下面写的内容远不能完美地体现这种博大与精深，但我们为此做出了努力。

一、牢牢掌握思想教育这个中心环节

毛泽东极其重视对人的思想教育。从一投身革命他就意识到：促使国家富强的活力蕴藏在每个社会成员身上，只有激励个人的主动性才能使之迸发出来。毛泽东 1918 年 4 月同蔡和森等人发起成立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便取“革新人民”之意。其最初的宗旨即包括“改良人心风俗”的内容。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从未放弃“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并进行了成功的实践。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充分展开了他的关于人的思想教育的伟大思想。

（一） 从经济、政治、文化说起

毛泽东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基础理论之一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关系问题。在大革命时期和井冈山的斗争中，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造了军队政治工作和思想建党的经验。来到延安后，毛泽东得以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从理论的高度，认真回顾和总结这些经验，以其特有的透辟和鲜明，提炼出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阐述了经济、政治、文化的相互关系。

1. “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毛泽东在 1937 年 8 月写的《矛盾论》中有这样一段著名的话：“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

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前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我们这样说，是否违反了唯物论呢？没有。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①

毛泽东在这里鲜明地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实践和理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它们的地位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第二性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是十分重要而深刻的，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可以这样说，重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强调在先进思想指导下的革命群众运动的历史创造活动，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特有的思想观点。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社会是以经济为基础、由各种因素相互作用而获得发展的。恩格斯曾经说过：“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25——326页（凡本书《毛泽东选集》——四卷的引文，均出自1991年第2版）。

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①“列宁在谈到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的时候说,因为这个科学的哲学是“从费尔巴哈那里产生出来的”,因此,为了和机械唯物论划清界限,“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坚持的是辩证唯物主义,而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特别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②可见,毛泽东提出的经济和政治决定作用和反作用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不仅如此,毛泽东关于第二性的东西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的见解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提供了新的论点。可以认为,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没有像毛泽东这样明确地阐释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所具有的决定性反作用问题。于是就有一些人,责难攻击马克思主义,是简单的“经济决定论”。在我国三十年代展开的哲学论战中,就有人以他们的无知或者故意提出唯物史观所说明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只是简单的因果关系。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虽驳斥了这些歪曲和攻击,但没有提出新的论点。而毛泽东则以他在《实践论》等著作中关于政治对经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巨大能动作用的鲜明确认和具体论证,更全面、准确地说明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有力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依据他所论述的这一唯物辩证法的新论点,毛泽东结合中国的实际进一步认定,革命的宣传教育工作对中国尤为重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在1939年纪念五四运动大会上的演讲中宣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506页。

②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336页。

布：“中国的革命运动，都是从觉悟了的学生青年知识青年们开始发起的。”^① 靠了他们对先进思想的传播，革命才能发动起来。20年后，毛泽东在进一步研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关系时又写道：“我们的革命是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宣传运动开始的，这有利于在社会上创造出新的舆论，由此去推动革命向前发展。只有在革命中推翻落后的上层建筑，才有可能摧毁旧的生产关系，旧的生产关系被摧毁后，新的生产关系才能建立起来，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扫清道路。”^②

2. “文化将给予经济政治以伟大的影响”

在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哲学理论的深入研究中，毛泽东始终着眼于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因此，他不仅在深层理论上创造性地提出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方面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的观点，而且进一步研究了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的辩证关系，论述了思想文化对于建立经济和政治的重要作用。这一理论观点，集中体现于毛泽东在1940年1月所写的《新民主主义论》这部重要著作中。

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③ 毛泽东这里所说的“文化”，是指广义上的文化，是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在相对应的意义上使用的概念，既包括文化艺术，又包括思想理论。这从毛泽东强调在这种文化中，“居于指导地位的是

① 转引自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第10页。

② 转引自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第1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63—664页

共产主义的思想”，“由于现时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① 等论述中可以看出。

毛泽东特别强调革命文化对于经济和政治的能动的反作用。他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而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② 在伟大神圣而又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毛泽东认为，尤其要用先进的思想文化去武装、教育、激励人民，使精神力量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因此，他把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看得同等重要，认为这是在抗日战争中两条不可或缺的战线，他要求“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③ 这即是说，革命的文化工作者，要在深入人民群众中，用先进的思想文化把人民群众组织成一只坚不可摧、无往不胜的队伍，这样我们就将无敌于天下。

毛泽东坚信革命的思想文化将给予经济和政治以伟大的影响和作用，这一思想在实践中得到了证明。1944年3月22日，他在关于边区文化教育问题的讲话中，谈到秧歌的利用问题时，兴致勃勃地告诉人们，有一个秧歌叫《赵富贵》，听说跑到吴起（镇）一演，就在演完那一天，连长那里就跑去一个士兵，把自己的手捆起来，请求处罚，他说，我想开小差，不但自己开，还组织别人开。他还讲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04、70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0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08页。

出,在他的被服里钉了多少法币,后来一检查,果然有一些法币钉在那里,讲出来了,当然也就不处罚了。毛泽东自豪地说,这就是我们的文化。早几年的大戏、小说,为什么不能发生这样的力量呢?因为没有反映出边区的经济和政治。毛泽东进一步引导说,文化是经济、政治的反映,又指导经济和政治。老秧歌反映老经济、老政治,并指导老经济,老政治,新秧歌反映新经济、新政治,并指导新经济、新政治。毛泽东强调,一定要充分发挥各种形式的思想文化在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上的重要作用。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概括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概念以及对这一思想的科学论证,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实和发展,使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应该有血有肉交互作用的思想得到了具体的说明。毛泽东的这一理论至今还有着重要意义。当我们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时候,谁能无视毛泽东当年的理论贡献呢?当党中央反复强调“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时候,又怎能不把这一方针和毛泽东重视思想文化对于经济政治的反作用的思想联系起来呢?

3. 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在对经济、政治、文化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之后,毛泽东一贯坚持的思想建党,用政治改造军队,用先进思想教育民众的思想得到了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因而在新的斗争任务面前,毛泽东以更大的自觉和自信,指出思想工作在各项工作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它是团结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克敌致胜的法宝,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首先,毛泽东指出政治工作是军队工作的生命线。1944年4月,在他主持修改过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这一文件中明确说明:“政治工作是我们军队的生命线,”宣布:“在一定物质基础之

上,思想掌握一切、思想改变一切。”这确是对我军从小到大艰苦发展、成长为一支新型人民军队成功奥秘的深刻揭示。在长期的艰苦经历中,毛泽东深深体会到:没有军队的政治工作,就没有我们军队的今天。概括他这方面的思想,有以下几点:

一是只有加强政治工作,才能变旧式军队为新型军队。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深情地回顾了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创造和发展,“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①

二是只有加强政治工作,才能实现党的领导,保证军队工作的正确方向。建立国共统一战线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毛泽东强调,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为此要健全政治机关。1939年2月19日,毛泽东、王稼祥、谭政联名发给前总、三个师、各军区各级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的电报要求:各级政治机关干部必须是党员。电文说,“部队不断扩大,新的杂色部队被收编,可能有许多政治干部不是党员,如此将使八路军优良政治制度的传统难于保持,党的领导及其政策的执行更无保证。以后无论何项性质之部队,一经编入八路军建制,必须从中建立党的组织,其指导员、教导员以及各级政治机关的主要工作者必须是党员”。^②毛泽东提出“抗大”教育方针的第一条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三是只有加强政治工作,才能激发全体官兵的积极性,实现全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80页。

^②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与教学研究资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281页。

国军队的总动员。“七·七”事变后，大敌当前。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两篇文章中，分别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八大纲领和十大纲领，其中都首先提到了全国军队的总动员的问题。如何动员军队呢？那就是通过改革军队的政治工作，使指员和战斗员团结一致。

第二，毛泽东指出对民众的政治工作“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在过去的长期战争环境中，我党对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集中体现于军队政治工作。而在抗日战争中，面临着全民族的危亡，普遍在全体人民中进行政治工作开展政治动员就成了亟待加强的大问题。毛泽东说，“抗日以前，没有抗日的政治动员，这是中国的大缺陷，已经输了敌人一着。”人民的大多数是从敌人的炮火和飞机炸弹那里得到“动员”的，“但这是敌人帮我们做的”。要使战争得到胜利，“决不可以再输敌人一着，相反，要大大地发挥这一着去制胜敌人。”^①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反复强调：“这一着是关系绝大的”，“这一着实在是头等重要”，“这是一件绝大的事”，这个问题“实在太重要了”。

对民众的政治工作为什么如此重要？毛泽东说，“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②他还具体解释说，“军队须有源源不绝的补充，现在下面胡干的“捉兵法”、“买兵法”，亟须禁止，改为广泛的热烈的政治动员，这样，要几百万人当兵都是容易的。抗日的财源十分困难，动员了民众，则财政也不成问题，岂有如此广土众民的国家而患财穷之理？”^③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8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8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12页。

对民众进行政治工作的内容目的是什么呢？毛泽东说，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人民，必须使每个人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使几万万人民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

如何对民众进行政治工作？毛泽东认为，不是一两次动员就够了，而是要进行经常的抗日战争的政治动员；不是将政治纲领背诵给老百姓听，而是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进行生动切实的政治动员。

第三，毛泽东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延安时期，新的背景是：党的组织发展了，已有了 121 万党员；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确立了，但历次“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影响没有清算；党又面临着领导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艰巨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更加感到进行思想教育的极端重要性，从而提出了掌握思想教育是“中心环节”的论断，断言：“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①

毛泽东认为，只有掌握思想教育这个中心环节，才能在全党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指出，我党历史上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路线，都是以理论和实际相脱离为特征的。所以要使我党成熟起来，就必须在全党进行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教育，这是掌握思想教育的首要任务。为此，毛泽东不仅撰写大量文章，再三再四向全党进行宣传，而且还发动和领导了延安整风运动。整风运动的最大成功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入了人心，使全党在思想上统一了起来。对此，毛泽东感到欣慰，说，“几年来的整风工作收到了巨大的成效，使这些不纯正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 1094 页。

的思想受到了很多的纠正。今后应当继续这种工作，……更大地展开党内的思想教育。”^①

毛泽东认为，只有掌握思想教育这个中心环节，才能克服党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指出，党员中“大多数是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他们有很可爱的革命积极性，并愿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训练；但是，他们是带了他们原来的不符合或不大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入党的……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矛盾，一个绝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形下，如果不进行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我们还能顺利地前进吗？显然是不能的。”^②

毛泽东认为，只有掌握思想教育这个中心环节，才能形成我党新的工作作风，更好地完成我党的政治任务。毛泽东指出，通过思想教育，“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③

（二） 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人和物的关系问题是支撑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思想的又一基础理论。在人与物之间，毛泽东十分重视人的因素，他在延安时期的名篇《论持久战》中写道：“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④毛泽东认为，人的决定性作用来自于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又与人的主观世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9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10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93—1094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69页。

界的改造有极大关系。由此，毛泽东十分强调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1. “天地之间人为贵”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亲身体会到人的重要性。他不只一次地表达过“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思想。为什么“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呢？毛泽东指出，因为事情是要人做的，只有人才有自觉能动性，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作为主体的最重要特性。在延安时期，面对中国人民反抗强敌的严酷斗争，毛泽东在其大量论著中，反反复复地说明以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来克敌制胜的思想。

他在1936年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1938年写的《论持久战》中，几乎以完全相同的文字强调着这样一个观点：“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人类在战争中强烈地表现出这样的特点。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①

在这段时期里，毛泽东特别喜欢谈论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话题。他在1939年2月20日写给张闻天的信中说，“孔子的体系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78页。

是观念论”，而“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了主观能动性。”^① 当他结合抗日战争说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时，对这种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和逻辑引申。概括他这方面的思想，主要有这样三点：

其一，战争“是主观能力的竞赛。”毛泽东告诉人们，人类的能动性，可以在战争中表现出举足轻重的作用。战争是对人类主观能力和意志、精神、勇气的最高检验。“战争力量的优劣本身，固然是决定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但还不是主动或被动的现实事物，必须经过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方才出现事实上的主动或被动。在斗争中，由于主观指导的正确和错误，可以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也可以化优势为劣势，化主动为被动。一切统治王朝打不赢革命军，可见单是某种优势还没有确定主动地位，更没有确定最后胜利，主动和胜利，是可以根据真实的情况，经过主观能力的活动，取得一定的条件，而由劣势和被动者从优势和主动者手里夺取过来的。”^②

其二，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人心”和“军力”的对比。毛泽东批评唯武器论是战争问题中的机械论。“我们的意见与此相反，不但看到武器，而且看到人力……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③ 人心的向背是很重要的，我们的战争是正义的，是求和平的，全体人民必将“决一死战”，“准备着一切牺牲”，“坚持到底，不达目的，决不停止。”^④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9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69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76页。

其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动员,离不开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项政治原则,离不开统一战线政策的良好执行,离不开文化的动员,离不开争取国际力量和敌国人民援助的努力。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①

这完全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思想脉络:要取得抗战胜利,必须重视人的因素,发挥全体人民的主观能动性;而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则必须要加强和改进政治工作,“政治越改进,抗战越能坚持”,通过政治工作,实现全国人民、全国军队的总动员,把蕴藏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历史主动性、创造性、积极性的巨大能量释放出来,变精神力量为置敌于灭顶之灾的巨大的物质力量,就一定能打败日寇。“抗日战争是要赶走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②

2. 人要“自觉地改造自己”

正因为毛泽东格外看重人的因素,人的能动作用,因而也就尤其强调人要实行自我改造。这一改造着眼于“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强调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通过人们对主观世界的改造,以更好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更有效地改造客观世界,因而这种改造是全人类的改造,人人都要改造。毛泽东这种关于人的改造的观点与其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有机地统一起来,并成为后者的逻辑基础。

为了使无产阶级更好地担负起在改造世界中的领导责任,毛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7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79页。

泽东首先提出无产阶级的自身改造。毛泽东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和农民分手的时间不长,且又处在小资产阶级的包围之中,首先的改造问题就是要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正是这样提出思想建设问题的。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份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如果不加以节制,不加以改造,他们就会用小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对此,毛泽东提出“组织上入党,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严肃问题,告诫全党加强思想改造。毛泽东还认为,中国无产阶级担负着艰巨的历史任务,所以自身改造要注意解决一个素质问题。“大批的新党员,新干部还没有足够的革命经验。他们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还不懂得或懂得不多。他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完全的统一的理解,还相距很远。”^①对此,毛泽东提出要运用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使全党成熟起来。

毛泽东对广大农民群众有很深的感情,同时他也清醒地看到,小生产者的落后保守意识必须加以改造,必须在思想上帮助和引导农民,使他们真正能够担当革命主力军的重任。为此,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讲话、文章和文件中,多次提出农民的自我改造和对农民的思想教育问题。1938年4月4日,毛泽东在“抗大”的演讲中谈到农民同志要克服自身的弱点,他告诫说,“农民同志要警惕一下,不要见钱就眼红。”在4月30日的讲话中他又说,“譬如三万块钱请你一个人带走,骑了马走,那时候一看,前后左右都没有人,钱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12页。

就在荷包里，你打不打主意，想不想一下子呢？由此想到了回家，买田地讨小老婆。”这里，毛泽东以他特有的精细的揣摩和生动的语言把小生产者的落后性刻划了出来，意在提醒农民同志，要随时注意改造自己的私有观念、狭隘意识，不断锤炼自己，使自己成长为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毛泽东还认为对农民党员绝不能放弃教育的责任。他在《关于军队吸收知识分子及教育工农干部的指示》中严肃地指出：“对工农干部尤其是农民干部，应该号召他们好好学习文化与政治。不识字和无知识，绝不是共产党员和八路军的光荣，而且不识字和无知识便不能成为很好的共产党的八路军的好的干部。工农干部应该知识分子化。工农干部无论其革命历史怎样久，若不求上进、不学习，便无发展前途，便会落伍和堕落。”^①

毛泽东始终十分关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他指出，知识分子实行思想改造的根本就是要接受唯物史观，要认识到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他在1938年8月5日在抗大的演讲中说，马克思的主要先生是工农。同年8月22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又说，马克思从无产阶级那里学习了东西，又去教育无产阶级。1939年9月25日他在一次讲话中又强调，世界上最有学问的第一是工农，第二是马克思。他还指出知识分子实行思想改造的途径是和工农相结合，“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分子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对于那些看不起工农、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十分不满意。一次他在延河滩上散步，碰上一位作家从城里回来。那作家手里拿个拐杖不停地挥舞，遇上驮盐的毛驴队他大摇大摆地过去，将老乡和毛驴队挤到一边。毛泽东见状气愤地说，“这是流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教学研究资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294—295页。

氓行径，目中无人，他看不起劳动人民，只是因为他认识几个方块字……就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摆臭架子！”

毛泽东认为，人人都要改造，自己也不例外。他曾这样谈到自己思想改造、思想转变的过程：“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①

3. 对人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从实际出发，必须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

以调动人的积极因素作为出发点去考察毛泽东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理论，就必然要涉及到毛泽东关于对人的思想教育必须和解决人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这又一根本性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在他的大量论述中，特别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结合实际。这个“实际”，首先是指人们的实际思想水平。毛泽东多次指出，思想政治教育不能脱离人们的实际接受能力。在这方面，他十分赞赏两个人，一个是彭湃，一个是陶行知。

1942年11月2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指出，对群众进行思想教育，也必须贯彻群众路线的原则，不能操之过急。他举出彭湃革命活动的例子说，彭湃是农民运动的大王，他是留学生，是中共中央委员，他怎样做呢？他自己去拜观音菩萨，老百姓1月19日去拜，那天他也去，如果不去，人们就会认为他这个人不大正派，连菩萨都不信。毛泽东进一步引申说，破除迷信是我们的原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51页。

则,但也要有灵活性。陕北经常有庙会,很多同志去参加庙会,我们的秧歌队也去,人家还是迷信,我们不能强迫群众不信,要慢慢改造。这个从受教育者思想实际出发的原则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他过去搞农民运动时就说过:“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时期农民会用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①

毛泽东还十分欣赏陶行知的大众教育的主张,认为这个主张反映了群众的实际水平,不脱离群众,实际上是寓思想教育于文教活动中,便于为群众所接受。在1938年4月11日边区国防教育会成立大会的讲话中,他径直把陶行知的实践和孔子办学并称。在他看来,识字倡学,是思想渗透的基本条件。大众识字的过程,就是接受新事物新道理的过程。只有让文化大众化,才能借助于通俗浅显的形式使群众接受新的观念。他推崇中国“文以载道”的传统。1943年10月30日,他在文教大会上,把文化和思想统一起来,说得很明确:文教工作的伟大任务,就是要人们觉悟起来对敌人奋斗,这个敌人就是大多数人不识字,死了还请和尚道士念经,就是说精神上没有解放,还有封建思想等各种不好的习惯,如果把这些敌人打倒了,不仅为革命事业带来诸多方便,如陕甘宁边区脱盲的儿童团、民兵,用查路条、写标语的方式进行抗战工作,而且还使过去的穷人庄稼汉获得一种人格的尊严。

毛泽东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结合实际,这个“实际”还指人们的实际生活问题,要满足人们的实际利益需要。他在1942年的一本书中谈到中国古代孔子、董仲舒等提倡的“去食存信”,“正其谊不谋其利”等观点时这样写道: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3页。

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有同志不懂得经济工作的重要性，不管不问，或者是中了董仲舒们“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些唯心的骗人腐话之毒。我们不是处在“学也，禄在其中”的时代，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寻饭吃，离开经济工作谈教育、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毛泽东这一思想是其井冈山时期寓政治教育于关心群众生活之中的思想的继续和发展，也是我党思想教育有效实践的理论总结。

有了这一明确的指导思想，尽管延安时期的斗争环境十分艰苦，毛泽东总是尽可能地为群众解决物质生活条件问题。抗战前期，陕甘宁边区政府收到的经济援助占财政收入的大部分，边区政府确定了“休养民力”的方针，取消了过去的几十种捐税，使人民负担大减。1941年以后，外援几近断绝，绝大部分财政收入要取之于边区人民，考虑到群众的实际困难，毛泽东又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他还亲自为《解放日报》写了《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的社论。正是由于我党和毛泽东同志充分注意了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才使我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

（三） 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

在毛泽东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中，对党内的思想政治教育是重要组成部分。严格说来，毛泽东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首先是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观点提出来的。毛泽东始终认为，全党的思想建设是教育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支柱。延安时期，党内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是开展全党的学习运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明

辨两条思想路线的大是大非。

1. 毛泽东带头学习

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全党的学习任务：“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他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得更多一点，更好一点”^① 这样，毛泽东就从正面教育、从开展学习运动找到了在新的历史情况下开展党内思想教育的突破口。

毛泽东发出学习动员后，自己率先垂范，带头学习。他几乎把一切工作之余可以利用的时间都用于学习了。读书忘记睡觉、读书忘记吃饭是常有的事。他在延安时期常读的列宁的《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两本书，是经过万里长征从中央苏区带来的，虽然破旧了，仍爱不释手。毛泽东在这两本书中写了很多批语，有几种不同颜色的笔划的圈、点和杠，写有某年某月“初读”，某年某月“二读”，某年某月“三读”的字样。他在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时，在这本书的第三版上先后用毛笔、黑铅笔在书眉和空的地方写下了近一万二千字的批注。他看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连续读了许多遍，整本书都画满了各种符号。天头地脚都写了评语。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曾这样记录了毛泽东学习的情况：“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为什么要这样读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33页。

书？毛泽东在1939年1月28日在延安的一次演说中说过一段很精彩的话：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

毛泽东在读书学习过程中，还亲自给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等学校的学员们上课。他备课十分认真，一次给陕北大学上哲学课，他足足花了四个夜晚和三个白天的时间备课。由于他讲课时深入浅出，通俗生动，因而对听课的学生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他形象的比喻，幽默的话语，使会场十分活跃，有时甚至发出哄堂大笑。事后，毛泽东曾诙谐地对人说：“我折本了，准备了三天四夜，只讲半天就讲完了。”后来他又应抗大邀请，给红军老干部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总政宣传部派人作了课堂记录，整理出来后经本人审阅修改打出来，这就是至今流传下来的著名的《辩证唯物论提纲》，《实践论》和《矛盾论》是其中最优秀的部分。

毛泽东在读书学习过程中，还亲自把周围的人都组织起来。1938年，毛泽东曾在自己的办公室内，召集哲学座谈会，每星期三夜晚座谈一次。开始时只是他身边的秘书，干事等七八人，由一个人中心发言，其余的则围绕这个中心题目进行漫谈。每次都是由毛泽东主持座谈。随着哲学座谈会影响扩大，参加的人愈来愈多，不少高级干部和理论工作者也纷纷报名参加，会便由毛泽东的小窑洞移到杨家坪中央组织部的大窑洞，毛泽东仍经常去参加。毛泽东还亲自组织过哲学小组、主持过哲学年会，形成了很大的感召力。

在毛泽东的带动下，全党掀起了学习热潮。干部帮助战士，有文化的帮助没文化的，还有很多同志认真钻研，常常为一些理论观点争得面红耳赤，全党的学习积极性都被调动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因势利导，在1941年5月19日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是为了革命实

践的需要,不是为了单纯的学习。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这样就为全党学习指明了方向,提高了全党的思想政治水平。

2. 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

毛泽东要求对全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从干部做起。他说,“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①他号召广大干部发扬“攻读”精神,以“挤”和“钻”的方法进行学习。为此,延安时期,党和毛泽东同志发出了一系列文件,制订了很多措施,使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得到了加强。

1939年2月17日,党中央设立了干部教育部,以张闻天为部长,李维汉为副部长。1939年3月,中央宣传部制订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规定延安的在职干部编班编组,坚持每天两小时的学习制度。1940年1月3日,中共中央先后发布《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和《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必须把干部教育放在党的重要工作地位上来,切实加强对学习的领导。1940年3月,党中央规定5月5日,马克思的诞辰日为“学习节”,要各单位届时总结学习经验,对学习好的进行鼓励。1941年9月26日,中央作出《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指出: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决定成立高级学习组,其成份以中央,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或省委之委员,八路军新四军各主要负责人,各高级机关某些职员,各高级学校某些教员为范围。延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33页。

安以外各地各重要地区,均建立高级学习组。高级学习组设组长、副组长及学习秘书各一人。学习组之下分设若干学习小组,由小组长负责。延安及各地高级学习组统由中央学习组(以中央委员为范围,毛泽东为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管理指导。1942年2月,毛泽东亲自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对干部教育的重大意义,基本任务,具体内容,方针原则,方法途径等问题作了系统的论述。决定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在全党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应该是第一位的。而在在职干部教育工作,在全部干部教育工作中的比重,又应该是第一位的。在职干部教育的重要地位,是由干部在党的事业中的地位决定的。”

为了加强对干部的教育,延安时期,我党创办了中央党校、马列主义学院、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军事政治学院,行政学院、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等十余所培养各种干部的学校。这些学校均在不同程度上把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作为一门重要课程。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经常到各干部学校讲课,作报告,用马克思主义科学地阐明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基本问题和党的纲领、路线、政策。

为了加强对延安各干部学校的领导,中央政治局于1941年12月制订了《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着重指出和阐述了在教学中如何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问题。《决定》向各级干部学校提出了三项要求:“第一,必须使学生区别马列主义的学习与马列主义的实质;第二,必须使学生领会这种实质(不是望文生义,而是心知其意);第三,必须使学生善于应用这种实质于中国具体环境;而抛开一切形式的空洞的学习。”^①《决定》还指出了贯彻理论联系

^①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五),第20页。

实际的各项措施。首先要改善教员的质量,“改善教员质量是学校办好的一个决定条件。凡地委及团以上干部的教育,应由中央委员及中央各机关负责同志亲自担任指导。对现有各校教员,应根据新的标准分别审查处理之。中宣部应给各校专任教员以实际帮助,提高他们的质量。对教员的政治的与物质的待遇,应改善之。”^①其次要改进教课内容和教学方法。“凡担任学校教育工作的同志,均应认真的研究教课内容与教学方法,使理论与实际一致的原则,在教课内容与教学方法中贯彻起来。”^②1941年底到1942年初,中央作出《关于中央党校计划》,改组了中央党校,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负责政治指导,任弼时负责组织指导,彭真为教育长。学习时间延长为两年,教学中坚决贯彻“理论和实际、所学和所用一致”的原则。

毛泽东还亲自为各干部学校编写教材。他主持编写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系统地论述了中国革命发展规律和党的建设规律。从1940年12月开始,毛泽东用半年时间主持编辑党的历史文献集——《六大以前》,随后又编印了《六大以来》,共收入1921年至1941年党的重要文献754篇,为党的高级干部研究党的历史提供资料。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以及这前后在党的高级干部会上和宣传工作会议上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的演讲等,实质上都是全党干部进行思想建设的有力教材。

3. 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

延安整风是我党思想建设史上的一个创举。毛泽东认为,它是

①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五),第21页。

② 《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五),第22页。

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而采取的一种形式。事实正是如此，整风运动是“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是全党的学习运动。

首先，整风运动以学习为主。整风运动从始至终贯穿着学习的线索。中共中央成立了由毛泽东主持的总学习委员会。整风运动又叫整风学习。整风学习共分发动、学风学习、党风学习、文风学习、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五个阶段。整风运动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中最主要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就是要改造我们的学习，解决如何正确地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如何正确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正确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的关系问题。说到底，就是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提高全党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参加整风的同志要学习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 22 个文件。

参加整风的很多同志都是第一次有机会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感到收获很大，甚至终生得益。袁宝华同志在回忆延安整风时这样写道：“就我自己来说，入党前，读过《共产党宣言》，当时读起来，很多不懂，不甚了了。在延安学习，那是非常认真。从《共产党宣言》学起，硬是一字一句地学。后来学习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一系列整风文件。通过认真学习，大大提高了理论水平，也培养了良好的学习态度和热爱学习的习惯。”

第二，整风运动以开展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教育为主。整风运动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其实质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

路线的教育运动。整风运动以反对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作为主要任务,也就是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教育放在了首位。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党批判并纠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但是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方法的高度对造成过去党内历次“左”倾和右倾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的总结。一段时期里,王明那种言必称希腊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在干部群众中还很有影响。王明讲演时,总是抱一堆马列主义的原著放在讲台上,讲演中,他不说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而是按一国际、二国内、三全区、四本部的框式套;举例子也不举群众熟悉的,不是英格兰、法兰西就是希腊、罗马、阿比西尼亚;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时,总要把卷、章、节、页、行的数字都说出来,然后大段大段地往下背。不少人对王明这种脱离实际而又头头是道的长篇大论非常欣赏,认为是理论高深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必须对全党开展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教育。他在亲自撰写的整风学习文件中反复强调,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践相结合。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矢和的的关系,“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①这种态度就是要向实际作调查研究、而不是脱离实际,夸夸其谈。

通过整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逐渐深入了人心。很多同志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一切从实际出发开展工作。张闻天等领导同志亲自带头,到农村、工厂进行调查研究。陈云同志到西北财经办事处搞财经工作,每个星期都要开一次座谈会。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成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01页。

为了风气。思想路线的教育使全党的思想素质有了很大提高。

第三,整风运动以提高认识、开展自我教育为主。毛泽东认为,整风运动是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教育,因此主要是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解决思想是非问题,即便是犯过错误的人,也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避免历史上错误的斗争方法”,“要用自我批评的方法”,“全党要团结”。^① 在中共中央召开三次政治局会议讨论王明的错误时,王明称病没有参加。毛泽东多次去看望他,并派人听取他的意见。在党的耐心帮助下,王明当时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还写信给党中央,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党的七大上,经过毛泽东做工作,仍选举王明为中央委员。

毛泽东指出,整风还要解决党员的“思想入党”问题。毛泽东关于“组织上入党,思想上没有入党”的说法,使很多人大吃一惊。感到警醒,增强了思想改造、加强党性锻炼的自觉性。毛泽东关于“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的指示,使人们拿起批评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自我教育。这样,重视思想改造,努力转变立场的风气很快形成。曾沐浴过这种革命风气的老同志这样描述:“延安整风时,同志之间无处不谈整风学习,无处不谈思想改造。会上会下,饭后到延河边散步,星期天访亲看友,大都在相互切磋,相互砥砺。许多知识分子说,在整风中,有一种脱胎换骨之感。”

^① 1943年9月至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

二、从政治上动员民众

有人曾把旧中国的民众比喻为“一盘散沙”，并把旧中国的支离破碎、衰败落后归因于此。然而，当1936年7月16日，在陕北的一间窑洞里，美国新闻记者斯诺向毛泽东询问对中日战争前途的看法时，毛泽东却向来访者传送了这样的信息：中国人民可以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1948年3月，当毛泽东离开陕北的时候，不仅日本侵略者已葬身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蒋家王朝也陷入了灭顶之灾。

中国的民众何以变得如此强大和不可战胜？

历史的这一页写着：毛泽东和他所领导的共产党人成功地从政治上动员了民众。

（一） 从政治上动员民众，是胜利的最基本条件

毛泽东非常重视民众的力量，认为中国革命若离开了民众，便不可能胜利。

1919年，他凭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初步了解和对民众的朴素感情，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和《民众的大联合》等文章中，大声向世人宣告：“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①这是“因为一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92页。

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积极投身于工农运动,从实践中进一步感悟到工农大众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1925年,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他说:“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② 1927年,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热情讴歌农民在反帝反封建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指出农民运动的兴起,“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③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根据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新的实践,揭示了民众与革命战争的关系,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④ 他称“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⑤

到延安后的13年,民族的和阶级的战争在更大规模上展开,敌人异常强大,局势十分险峻。毛泽东始终保持着在其革命生涯早期所形成的对人民力量的信仰,并用新的思想和实践,继续丰富和坚定着这一信仰。

1935年秋季的中国时局是,国民党一味地“剿共”媚外,致使东北的全部国土,华北的大部分主权,皆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国人急切地寻找着救国良策。就在这时候,毛泽东率领红军踏上了陕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3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6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9页。

北的土地。他立即组织召开了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确定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提出“组织和团聚千千万万民众”，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攻。

延安，地处中华民族的发祥地。在延安地区黄陵县城北面的桥山，有座轩辕黄帝陵。据传，黄帝教民耕织，德播四方，深得百姓爱戴。在他死后，每逢清明，陵前便要举行祭祖谒陵活动。1937年4月5日这一天，初到延安的毛泽东顺遂民俗，亲笔书写祭文，同朱德总司令一道，恭遣林伯渠前往黄帝陵祭祀。祭文深深地表达了他依靠民众，坚决抗战，战则必胜的决心和信心。文中写道：“……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抗战。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志此，永矢勿谖……”^①

一年之后，他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了《论持久战》的著名讲演，提出了人民战争的思想。他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我们数万万民众站立起来，日本侵略者就会“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②

由于共产党高举团结抗战的旗帜，爱国军民携手战斗，加上国际力量的援助，到1945年6月，抗日战争已接近胜利。这时，毛泽东思考着如何将反帝反封建的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在七大闭幕词中，他作了回答。他借用古代《愚公移山》的寓言，把中国共产党人比作“愚公”，把中国人民比作“上帝”，他说：“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

^① 《时代的精神支柱》，第3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11—512页。

挖不平呢？”^①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国民党就悍然发动了内战。对革命力量来说，战争初期的形势相当严峻。国民党在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方面均占有明显优势，而且背后有美国政府撑腰。在当时，美国看起来是不可战胜的，因为它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力和经济力，而且垄断着原子弹。在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敢不敢以革命战争来反对反革命战争？1946年8月，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会见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明确指出“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②

被毛泽东视为“上帝”、“真正强大的力量”的“人民”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毛泽东反对对“人民”这一概念作僵化、狭隘的理解。到延安不久，他就说过：“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③因此，他认为，应从每一时期战胜主要敌人出发，团结广大人民，团结得越多越好。”具体而论，在抗战时期，除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要加上一切其它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在解放战争中，则以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为根本力量，包括一切反蒋反内战的民族、党派、团体。

他为什么要如此地强调相信和依靠最广大的民众？因为，在他看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④联系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而论，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的对比，不但是军力和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10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9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55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31页。

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如果中国人的大多数都站在革命战争方面,敌人暂时掌握着的较为强大的军力和经济力,就算不了是优势。优势就在我们一边了。我们就可以在战争的一切需要上获得“无穷无尽的供给”,包括取之不尽的精神支持,源源不绝的人力支持,充足可靠的财力、物力支持。

毛泽东高度重视民众的力量,但他从不认为,民众可以自发地成长为革命力量。他认为,要依靠民众,就得动员民众。这两者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在大革命时期,他就深感中国人民受剥削压迫之苦,却又不知痛苦的根源,因而开夜校,办讲习所,出版刊物,以唤醒民众;一双草鞋、一把雨伞,不辞劳苦地深入韶山农村、安源煤矿……,进行革命启蒙。创建红军后,他又把宣传群众作为红军的三大任务之一。

到延安后,面对国家、民族的深重危机,革命任务的异常繁重,他愈加感到动员民众的重要、迫切。在文章和讲演中,他一次又一次地谈到孙中山先生的遗嘱:“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1939年5月4日,在向延安青年发表讲演的时候,他说:“这位老先生死了十多年了,连同他说的四十年,共有五十多年,这五十多年来的革命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呢?根本就是‘唤起民众’这一条道理。”^①

怎样才能“唤起民众”呢?

孙中山先生没有回答。

毛泽东回答了。

在《论持久战》中,他明确提出,应当从政治动员做起。他说: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65页。

“这个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没有许多别的东西固然也没有胜利，然而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①

为什么唤起民众需从政治动员做起呢？概括毛泽东的论述，主要因为：

第一，政治动员能够启发民众的觉悟。这是从政治上动员民众的首要意义。他讲到，要取得革命胜利，除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问题以外，还有一个人民群众的觉悟问题。中国政治的黑暗、落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进行的欺骗性宣传，阻碍着民众觉悟。而当民众不觉悟的时候，不仅不能成为革命的推动力量，反而有可能被敌人所利用。要使民众觉悟起来，就要进行进步的政治动员。通过政治动员，使群众认识真理，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丢掉对统治阶级的幻想，觉悟起来，投入斗争。朱德同志也曾用他特有的简明语言，表达过同样的思想。他说：“我们讲练兵必先练心，是要启发战士们的阶级觉悟，要他们了解自己属于什么阶级，怎样受压迫，怎样受剥削，为了解除自己所受的压迫剥削，要怎样团结起来，怎样练好本领。他们懂得了这个道理，再看一看社会的情况确是那个样子，一点也不假。从此以后他们的心就完全为革命了，……所以练兵必先从政治着手。练心就是做政治工作，启发战士们的阶级觉悟，使他们从不觉悟到觉悟。”^②

第二，政治动员能够凝聚民众的力量。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发挥得如何，不仅取决于他们的觉悟程度，而且取决于他们的团结程度。要使数万万民众团结起来，共同奋斗，就要进行政治动员。通过政治动员，树立起共同的奋斗目标，使大家心往一处想，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13页。

^② 《朱德选集》，第102—103页。

劲往一处使。“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群众齐心了，一切事情就好办了。”^①

第三，政治动员能够激发民众的信心和勇气。历史前进的道路是漫长而曲折的。中国革命的道路也是漫长而曲折的。人民群众在同强大的敌人作斗争的过程中，会面临种种艰难险阻，难免会在一部分群众中产生悲观失望情绪。为此，需要通过政治动员，帮助群众克服消极情绪，增强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勇气，“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②

民众的政治动员工作由谁来做呢？无疑的要由共产党人来做。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共产党人就是民众的“救世主”呢？

1948年4月，毛泽东在从陕北到河北的路上，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谈话时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③

毛泽东用简短的38个字深刻地揭示了民众政治动员工作的本质内涵，说明中国共产党的群众思想政治工作，本质就是让群众起来自己解放自己。这是用中国共产党的切身经验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的深刻说明，是对党领导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过程的经典概括。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从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对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所作的完整阐述，为开展群众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奠定了理论基础。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1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10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18页。

（二）普遍而深入的民众政治动员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我们党以及毛泽东的革命活动就是从宣传鼓动民众起家的。因此,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党中央到达陕北之间的14年中,党和毛泽东本人在做民众的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已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比如,从工农劳苦大众的特点出发,用浅显易懂、生动形象的语言,向他们宣传、解释深邃的革命理论,用他们遭受剥削压迫的亲身感受,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把文化教育与政治教育结合起来,通过办文化学校等形式,在普及文化的过程中普及进步的政治思想;通过提出一听就懂,言简意赅的斗争口号,如“打倒洋财东、”“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等,开展有力的反帝反封建政治鼓动,激起群众的斗争热情;把重视口头宣传和重视文字宣传结合起来,借助演讲、报告、刊物、传单等,传扬人民斗争的胜利,戳穿敌人的谎言欺骗,播撒革命思想的火种。

到延安以后,已经身为党的领袖的毛泽东在指导伟大的人民战争的过程中,把个人孜孜以求的探索与全党的智慧和人民的创造,历史的经验与新鲜的经验熔于一炉,边实践,边总结,使民众政治动员工作的水平,得到了极大的升华。

在政治动员工作中,确定政治动员的内容是极为重要的环节。在毛泽东看来,对民众进行政治动员的内容很多,比如,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的普及、爱国主义教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教育,等等,但中心的任务,是将“革命的政治目的”和“政治纲领”告诉人民,也就是进行党的路线和政策的宣传教育,特别是进行党的中心任务的宣传教育。在《论持久战》中他说:“什么是政治动员呢?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其次还要说明达到

此目的的步骤和政策,就是说,要有一个政治纲领”。^①这里所说的“战争的政治目的”,是指“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这是抗战时期党的中心任务,也是这个时期党的路线的主要内容;“政治纲领”是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抗战建国纲领》,这是服务于党的路线的具体政策。

党的路线和政策何以成为从政治上动员民众的中心内容呢?从毛泽东的论述看,主要因为,党的路线和政策抓住了社会主要矛盾,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要求,揭示了社会前进的方向,同时也就揭示和反映了最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以此来宣传、教育群众,则使群众能够认识真理,认识自己的根本利益,从而觉悟起来,团结起来,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正如他在抗战初期讲到的,通过抗日政治目的和政治纲领的动员,可以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这样,“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②也正如他在七大闭幕词中说的:“大会闭幕以后,……同志们回到各地去,要宣传大会的路线,并通过全党同志向人民作广泛的解释,“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③

为了使党的路线、政策深入人心,起到启迪、团结、激励人民奋斗的作用,毛泽东强调政治动员必须经常,必须普遍,必须深入。

把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这是毛泽东十分强调的。

他指出,战争的政治动员“不是一次动员,就够了,“不是将政治纲领背诵给老百姓听,“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8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8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101页。

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①他要求共产党人大声疾呼地向全国人民作不疲倦的解释和说服，以便把“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②

他本人正是这样做的。

就拿抗日战争时期来说。

党中央一到陕北，就确定了团结一切力量，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民族革命战争，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的抗战路线。当时，革命形势正处在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的时期。对于党的路线，一些工农群众不理解，提出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难道错了吗？怎么原来的敌人现在变成了朋友？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反复讲解党的政策变化的原因，用通俗的语言宣传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他说，面对民族危亡，一个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一个则依靠单兵独马，去同强大的敌人打硬仗，这两种做法究竟哪一种好？当然应当选择前一种。经过大量的说服工作，使党制定的新的路线得到了群众的理解和接受。

抗日战争初期，一方面，日军在军事上节节进逼；一方面，中国军队在前方也打了一些胜仗。许多群众对战争的前途一时认识不清，只是各抓住某一方面的事实，或认为中国在战争中可以速胜，或认为中国必败。毛泽东敏锐地把握群众情绪的脉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战争局势作了全面分析，科学地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的，但最后胜利肯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帮助群众克服盲目乐观或悲观失望的情绪，树立克服困难、争取胜利的信心，为实现党的路线奋斗。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8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79页。

1939年以后,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边区军民不仅面对敌人军事上的包围,而且遭受来自国民党和日军两方面的经济封锁,生活极度艰难。当时的形势是,不发展生产,就无法坚持抗战,要使党的抗战路线贯彻到底,就要发动群众进行生产。毛泽东及时地觉察到新形势的要求,早在1939年2月,就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尖锐地指出,“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这就是我们的回答。”^①过了一段时间,他感到不少人还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就继续做宣传动员工作,进一步发出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丰衣足食,支援前线的号召。大家终于真正懂得了抗战需要生产,生产为了抗战的道理,纷纷表示:“绝不让日蒋的罪恶阴谋得逞!”唱着:“多打些粮食也是抗战”的歌子,以极大的热忱投入了大生产运动。

到1945年的中期,抗战已接近胜利,“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高”。^②这时,毛泽东认为,仍然不能放松政治动员。因为新的形势提出了新的要求——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这就要继续提高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团结程度。为此,他积极宣传国际国内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好形势,增强人民夺取胜利的信心和勇气。

毛泽东就是这样,随时把握事物发展进程和群众情绪的变化,围绕党的路线,不疲倦地宣传和动员群众,及时地引导群众前进。

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延安时期的民众政治动员工作经常化成为一项制度。军队每到一地,都要张贴标语,散发宣传品;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组织群众读书、看报;党、政、军的领导同志常常在群众

^① 转引自《时代精神支柱——延安精神概论》,第15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32页。

集会上解释政策,演讲时事。

政治动员必须普遍,这也是毛泽东十分强调的。

这是与他依靠广大的民众推动历史前进的基本信念相联系的。既然要依靠最广大的民众,政治动员就不能仅仅着眼于少数人,着眼于群众中的先进层,而要面向广大的民众,面向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他多次谈到:“共产党员在领导群众同敌人作斗争的时候,必须有照顾全局,照顾多数及和同盟者一道工作的观点……决不可脱离群众的多数,置多数人的情况于不顾,而率领少数先进队伍单独冒进。”^① 1941年中宣部发表的《关于宣传鼓动工作提纲》,也反映了毛泽东的这个思想,指出“必须使我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循着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道路来进行”。^②

政治动员要面向广大的民众,这无疑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因为在广大的民众中,若按阶级划分,除了含有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外,还有民族资产阶级,甚至有部分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中的开明人士;若按政治觉悟划分,则“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③ 面对如此复杂的对象,政治动员如何进行呢?

毛泽东提出了两对原则。

一对原则是团结和批评、教育、改造。

在这对原则中,首要的是团结。1944年,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谈到帮助、感化和改造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的时候,他明确提出:“为了改造,先要团结”。^④

所谓团结,就是政治工作者在对待不同对象的时候,要一视同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25—526页。

② 《思想政治工作七十年》第30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98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12页。

仁地采取满腔热忱的态度,要亲近他们,尊重他们,理解他们,而不是轻视他们,排斥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毛泽东曾清晰地表达了这一思想。他谈到对待党外先进分子、落后分子和犯过错误的人们的态度时说:“共产党员应和党外一切先进分子协同一致,为着团结全国人民克服各种不良现象而努力……那种以为只有自己好、别人都不行的想法,是完全不对的。共产党员对于落后的人们的态度,不是轻视他们,看不起他们,而是亲近他们,团结他们,说服他们,鼓励他们前进。共产党员对于在工作中犯过错误的人们,除了不可救药者外,不是采取排斥态度,而是采取规劝态度,使之翻然改进,弃旧图新。”^①

对不同对象都要讲团结,并不意味着只讲团结,不讲批评、教育和改造,也不意味着把他们不加区分地混为一谈。

毛泽东认为,要从政治上动员民众,固然要多从正面宣传鼓动,但批评、教育和改造也是不可缺少的。道理之一就是,要人民觉悟起来,团结起来,就必须努力“去掉人民脑子中的错误思想。”他说:“对于中国人民脑子中的落后的东西,我们要去扫除,就像用扫帚打扫房子一样。从来没有不经过打扫而自动去掉的灰尘。”^②道理之二是,共产党是要带领民众前进的,如果只讲团结,不讲批评、教育和改造,就可能意味着一味屈从民众中落后的,甚至有害的东西,意味着放弃原则,放弃党的先进性,结果将失去领导的资格。所以,团结与批评、教育、改造是相辅相成的,为了批评、教育改造,先要团结;而要加强团结,又必须进行批评、教育、改造。

毛泽东非常善于从阶级分析入手,把握不同对象的特点,确定批评、教育和改造的具体内容。对于工人阶级,他强调要克服由于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2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131页。

与农民有着天然联系而沾染的小生产习性,还要求努力提高文化水平。对于农民阶级,他要求拓宽视野和胸怀,加强纪律性,克服由小生产的经济地位造成的狭隘和散漫。对于知识分子,他要求他们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磨炼,去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倾向,增强革命的坚定性。对于城市中的小商人、小业主等小资产阶级,则指出他们的主要问题是抵制来自资产阶级的影响。而就资产阶级而论,关键是要防止他们在革命的紧要时刻妥协、动摇。总之,只有用诚挚的关心、理解去团结广大民众,用善意的具体的批评去帮助他们中的每一部分人克服自身弱点,普遍的政治动员才能实现。

再一对原则是领导群众前进一步和尊重群众意愿。

毛泽东认为,共产党人要普遍地动员民众,就不能脱离民众的多数,但这不等于做群众的尾巴,相反,共产党人必须站到群众的前头,引导他们前进。在《论联合政府》中,他提出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并批评了尾巴主义的错误做法。他说,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还不了解的东西,群众也一概不了解。许多时候,广大群众跑到我们的前头去了,迫切地需要前进一步了,我们的同志不能做广大群众的领导者,却反映了一部分落后分子的意见,并且将这种落后分子的意见误认为广大群众的意见,做了落后分子的尾巴”,^① 结果将失去动员民众的机会。

但同时,他亦反对命令主义的做法,强调要尊重群众意愿。还是在《论联合政府》中,他说,“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95—1096页。

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东西，广大群众也和自己一样都了解了。”^①他指出，“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②

如何才能既避免尾巴主义又避免命令主义，把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与尊重群众意愿的原则统一起来呢？毛泽东的回答是：“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③

由于确立了上述两对原则，我们党在动员民众的工作中，比较有效地防止了“左”的和右的两种倾向，无论是在根据地内，还是在国民党统治区，都使党的影响迅速扩大，不仅牢牢团结了工农基本群众，吸引了众多优秀青年，而且争取了大批中间力量，民建、民盟等民主党派，大都是我党在陕北这段时间站到革命阵营一边来的。当1948年3月党中央离开陕北时，国民党在全国人民中已处于孤立无援、四面楚歌的境地，这与我党实施的普遍政治动员是分不开的。

政治动员除了要经常、普遍以外，还必须深入。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讲：“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④

政治动员如何才能深入呢？

从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看，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党的工作者要摆正自己与民众的关系。

毛泽东认为，党的工作者与民众的关系是双重的，“他们每天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9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1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95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80页。

都是民众的教师,但又每天都是民众的学生。”^①

他还认为,党的工作者只有先做民众的学生,才能做民众的先生。他一再地要求他们,要“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要“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要“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②他讲了许多道理,来说明先做学生的重要。

首先,政治动员离不开动员者与对象之间的感情沟通。毛泽东所强调的感情,即含有阶级感情,又含有人与人之间的友情。1941年,他曾谈到在兴国、长冈、才溪调查时的亲身感受,他说,调查时,找的是乡里的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我必须恭谨地向他们学习,虚心地向他们请教,“否则他们就不理我。”^③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他说:“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要使我们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不然,彼此之间就会格格不入,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就不赏识,“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帐。”^④他提出,做宣传工作的人,要和自己的对象做朋友,要“懂得彼此的心。”^⑤

其次,政治动员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做到言之有物,有的放矢,而这也需要党的工作者先做民众的学生。他引用斯大林的话——“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来强调向群众学习、向下做调查研究的必要。他告诫做宣传工作的同志,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2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89、790、109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90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51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36页。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那些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的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因为这种议论或批评，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①他要求大家向列宁学习。他说，列宁在彼得堡领导“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时，非常熟悉和了解工人，虚心向他们求教，从而掌握了各企业中的情况。当某一个工厂爆发罢工时，“协会”立刻印发传单来响应。传单把厂主虐待工人，工人生活穷困，每日从事十二至十四小时过度沉重的劳动，而又毫无权利可言等等真情实况，都揭露无余，同时，载明工人群众的要求，说明工人应如何为自身的利益而斗争。每一个这样的传单，都大大鼓舞了工人的斗志。毛泽东说：“我们是赞成列宁的吗？如果是的话，就得依照列宁的精神去工作。不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不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也不是自以为是，夸夸其谈；而是要照着列宁那样地去做。”^②

再次，向群众学习是掌握群众语言的需要。毛泽东以为，在宣传鼓动工作中，语言问题绝不是一个小程序。如果我们没有学会说群众懂得的话，那末广大群众是不能领会我们的决议的。而我们远不是随时都善于简单地、具体地、用群众所熟悉和懂得的形象来讲话。此外，如果我们不会群众语言，就说不出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语言乏味，像个瘪三，群众就不喜欢听。为了让老百姓听懂并爱听我们的宣传鼓动，就得“实地跟老百姓去学”。

党的工作者还要做民众的先生。

如何才能当好民众的先生，使政治动员深入人心？

毛泽东对此做过许多论述，但他认为，做民众先生的首要条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9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42页。

件,就是要为人师表,既要“口讲”,更要“实做”。^①

他认为,政治动员不仅靠“口讲”,“实做”也可起到动员作用,而且“口讲”只有与“实做”结合起来,才易于为民众所接受。他以共产党的亲身体验来说明这一点。他说:“中国共产党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经历,以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在全民族几万万人民中间起到了伟大的教育作用”,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伟大的历史成就,使得它所说的话,“比其他任何政党说的话,都易于为人民所接受。”^②

毛泽东关于政治动员要以宣传党的路线、政策为中心任务,关于政治动员必须经常、普遍、深入的论述,揭示了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要求。

(三) 给群众以看得见的利益

毛泽东很注重人的精神世界,他的必须从政治上唤起民众的思想,就反映了他的这个性格特点。但是,他绝不是唯意志论者。相反,他笃信马克思主义的物质第一性原理,认为人的精神世界的变化离不开物质动因。因而,要从政治上动员民众,既要给民众灌注进步的政治精神,又要给他们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

在早期革命实践活动中,他就十分注意把政治宣传与解决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结合起来。他带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井冈山后,在要求红军肩负起宣传群众的任务的同时,反复教育干部和战士尊重群众利益,爱护群众利益,甚至提出爱惜老百姓的一根稻草,一个鸡蛋,一针一线。他还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并先后制订了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7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84—185页。

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县《土地法》以革命法律的形式，将贫苦农民的根本利益确定下来。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从事实中认识到红军是为他们的利益而奋斗的，便紧紧团结在党和红军周围，自觉自愿地支援革命和战争。当时中共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在给省委的报告中写道：“农民在打土豪后相信毛司令，在分田地后相信党相信苏维埃。”

1933年至1934年期间，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他连续作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报告，阐述发展经济、改善群众生活对根据地建设和革命战争的意义。他指出：“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但是，“如果我们单单动员人民进行战争，一点别的工作也不做，能不能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呢？当然不能。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①他说，这样做，是“要使广大群众认识到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国去，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②在这里，毛泽东不仅明确提出了要关心群众的物质利益的思想，阐述了关心群众物质利益的内容，而且揭示了关心群众物质利益与政治动员之间的内在联系。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6—13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8页。

到延安以后,毛泽东在领导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过程中,把上述思想在实践中充分展开了。

第一,保障民众的基本经济利益。

中国革命的主体是农民。在土地革命时期,为了发动农民,党实行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抗战开始后,为了动员全民族力量,包括抗日的地主绅士参加抗战,在毛泽东指导下,党修订了政策,由没收地主土地改行减租减息。这个政策虽不能根本解决土地问题,但仍在政治上动摇了封建统治,在经济上削弱了封建剥削。这是在民族战争条件下兼顾农民和地主两方面利益,把坚持抗战和解决农民问题恰当结合起来的政策。从1939年冬起,各根据地相继开始实行减租减息。减租的办法是“二五减租”,即把原租额减少25%。减息的办法是规定年利率,一般为一分,即1/10,最高不得超过一分半。此外的杂租、劳役和各种形式的高利贷一律取缔。农民从中得到了经济实惠,生产积极性和政治积极性大大提高。

抗战胜利后,阶级矛盾再度上升为主要矛盾。1946年5月,为了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适应解放战争发展的需要,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央发布了五四指示,由减租减息政策,改行耕者有其田政策。正如毛泽东所说:“这是最彻底地消灭封建制度的一种方法,这是完全适合于中国广大农民群众的要求的。”^①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农民群众组织起贫农团和农会,控诉地主,惩办恶霸,没收地主土地,在经济上翻了身,在政治上扬眉吐气,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在“参军保田”的口号下,大批青壮年农民潮水般涌入人民军队。各地农民不仅将粮食、被服等送上前线,而且组成运输队、担架队、破路队等随军组织,担负战地勤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50页。

务。他们还发扬抗日战争时期的优良传统,建立与加强民兵组织,配合正规军作战,保卫解放区。毛泽东曾总结道:“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①

毛泽东在时刻关注着解决农民基本经济利益问题的同时,还从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兼顾劳资双方利益等政策,以使工人阶级的利益受到保护,并给一切能够参加革命的阶级、阶层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调动广大民众的革命积极性。

第二,发展生产,改善民众的生活。

毛泽东一贯重视经济工作。早在1933年他就讲过,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他针对一些同志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过来,哪里还有闲工夫去搞经济建设的错误认识,耐心地进行教育,指出:“盐很贵,有时候买不到。谷子秋冬便宜,春夏又贵得厉害。这些情形,立即影响到工农的生活,使工农生活不能改良。这不是要影响到工农联盟这一基本路线吗?工农群众如果对于他们的生活发生不满意,这不是要影响到我们扩大红军、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工作吗?所以,这种以为革命战争的环境不应该进行经济建设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②

在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根据地的建设中,毛泽东贯穿了这个思想。他在为建设好边区提出的五项任务中,第三项就是:“发展生产”。他还亲自到生产动员大会上发表讲话,呼吁人们自己动手,建设边区。

1942年,他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背景是,

^① 转引自《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23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20页。

1940年冬，国民党断绝了对我抗日经费的接济，并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加上日军实行的野蛮的“三光”政策，边区经济遇到严重困难。经费停发了五个月，并不得已向农民加征公粮。征粮数由5万石，逐步增加到20万石，占边区总收获的13.85%，每人平均1.5斗强。这加重了人民的困难。毛泽东知道后指出，抗战是人民的战争，在困难的情况下，人民加重一定的负担是完全应该的，但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也是错误的。他一面指示有关部门将公粮任务减少，一面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发表了长达11万字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

后来，他曾谈到：“如果我们做地方工作的同志脱离了群众，不了解群众的情绪，不能够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生活，只知道向他们要救国公粮，而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的‘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末，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灰尘。国民党就是只问老百姓要东西，而不给老百姓以任何一点什么东西的。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也是这样，那末，这种党员的作风就是国民党的作风，这种党员的脸上就堆上了一层官僚主义的灰尘，就得用一盆热水好好洗干净。”^①这段话实际上指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方针提出的实质和意义。

在毛泽东的亲自发动和倡导下，延安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党政军民各界数万人投入了劳动热潮。毛泽东也在杨家岭办公窑洞对面的山沟里，开垦了一片土地用来种菜。经过辛勤的耕耘，延安的农业产量迅速增长，工商业也得到发展，人民负担大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933页。

大减轻,生活有了明显改善。到 1943 年,边区征收公粮已由 1941 年占总收获量的 13.58%,降至不足 9%。1945 年时,大部分农民已做到“耕三余一”,即耕种三年庄稼,除消耗外,可剩余一年口粮,部分农民做到了“耕一余一,”按当时的生活水平,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要求。广大农民的心情,由原来存在着一些不满,转变为欢天喜地,更加热爱自己的军队和政府。

第三,维护群众利益,关心群众生活。

毛泽东在实行给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原则时,既强调从大处着眼,又注意从点滴做起。他认为,共产党要给群众以利益,但首先要时时处处维护群众利益,不损害群众已有的利益;共产党既要在根本经济利益上为民众谋福利,又要在日常生活中对民众体贴入微,为他们排忧解难。

1927 年至 1928 年,他为红军规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其中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等若干具体细致、宜于遵守的纪律。他要求干部要帮助老百姓解决柴米油盐、穿衣走路等一切生活问题,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在江西瑞金的沙洲坝,至今在靠近村子的一口井台上仍竖着一块纪念碑,上面刻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两行大字,记述着 1933 年 4 月,毛泽东来到这里,帮助村民打井找水吃的故事。

到了延安以后,毛泽东仍然把维护群众利益,关心群众生活作为大事来抓。一次,他从一份文件中得知,一个农妇因为丈夫被雷电击死,骂了共产党,已被捕捉送来延安,思绪一夜未平静,第二天一早,就把农妇请来,喊她“妹子”,请她喝水,吃枣,告诉她政府不该给她判刑,相反,他还要批评有关部门。他说,老百姓有具体困难,政府不调查,不解决,就该挨骂。他详细询问了她的意见和困

难,指示有关部门认真加以解决。这仅是毛泽东把群众的冷暖记挂在心头的一个例子。他常常与庄稼汉攀谈,了解庄稼生长情况,嘱咐他们不误农时;他关心孩子们的教育问题,多次指示边区政府要发展教育,让孩子们有书读;他为边区人畜大批死亡,巫医又在其中作祟而深感忧虑,要求为人民训练新医生,帮助、感化和改造旧式医生,并组织群众与迷信和不卫生习惯作斗争;过年了,他去给老乡们拜年;枣园有几位六、七十岁的老人,一辈子未过过生日,他知道了,亲自设宴为他们敬酒贺寿;他还向群众提议,村里死了人,开个追悼会,以寄托人们的哀思……。

在党和毛泽东的教导下,根据地的政府和军队养成了维护群众利益,关心群众生活的良好作风。

1947年9至10月间,毛泽东吸取各方面意见,亲自修改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此后,在他修改谭政同志的报告时又深刻地指出:“我们只能保护人民利益,不能侵犯人民利益,人民解放军宣言中,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特别的规定,就是这个道理。现在军队打到蒋管区,老百姓第一个看你的纪律,然后才听你的宣传。”

第四,给民众以政治利益。

只要翻一遍毛泽东在延安地区13年的历史卷册,就不难看出,毛泽东除要求给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外,还要求给群众以看得见的各种实际利益,包括政治利益。

毛泽东认为,给民众以选举、言论、集会、结社等项政治权利,并在此基础上,使民众广泛地参政议政,建立一个民主的、廉洁的、为民众办实事的政府,是从政治上动员民众不可缺少的条件。他初到延安,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抗战需要人民的动

员,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进行动员。”^①

为什么没有民主自由,就无从动员呢?根据毛泽东这个时期的论述,主要因为:其一,民众除具有物质利益方面的需求以外,还有政治利益方面的需求。对这方面实际需求满足得如何,同样影响着政治动员的效果。他这样表达过这个思想:“人民要求政府满足自己的政治经济要求,同时给政府以一切可能的利于抗日的援助。其二,政治动员旨在使广大民众以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的姿态投入到斗争行列中去,与之相适应,就要在政治上给民众以相应地位和权利,就要建立代表民意的政府;如其不然,政治仍为少数人所私有,政治动员就会成为欺骗和空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指出,“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他还说:“我们现在虽有中华民国之名,尚无中华民国之实,循名责实,这就是今天的工作”。^②其三,民众的物质利益的取得,离不开政治利益。早在写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时候,毛泽东就揭示了农民取得政治权力与取得物质利益的关系。他说:“农民有了组织之后,第一个行动,便是从政治上……,即是从农村的社会地位上把地主权力打下去,把农民权力长上来。这是一个极严重极紧要的斗争。……这个斗争不胜利,一切减租减息,要求土地及其他生产手段等等的经济斗争,决无胜利之可能。”^③在土地革命时期,他把建立政权与进行土地革命看作根据地的两大任务。到了延安以后,他曾用通俗的语言讲解两者的关系:“既然有饭大家吃,就不能由一党一派一阶级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5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7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3页。

来专政。”^①反过来也是如此。他多次谴责蒋介石政府搞独裁专制，假公济私，贪污腐败，横征暴敛，使人民饥寒交迫，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呼吁实行民主政治，以保障一切革命政策的实施，其中包括使大家都有事做，有饭吃。

正是基于上述理由，毛泽东在提出政治动员民众的任务的时候，总是把给群众以实际的政治利益与给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的问题一起提出来。

为了动员全国民众抗战，1937年8月，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起草了一份宣传鼓动提纲，其中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十大纲领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明确全国总动员的目的和任务。目的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肃清汉奸卖国贼，任务是动员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结成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第二部分就是实行民主政治，包括实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释放爱国的政治犯，开放党禁，建立民选的廉洁政府，铲除贪官污吏，采取民主集中制。第三部分则是实行符合民众利益的经济政策和教育政策，如发展经济，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救济失业，赈济灾荒，开设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课程。此后，无论是为了动员民众参加抗日战争，还是为了动员民众参加解放战争，毛泽东设计的宣传鼓动提纲，都保持了这样的思路，只是在具体内容上根据当时形势的特点作出调整。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是时刻地把民众的政治利益与物质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作为从政治上动员民众的基本条件的。

在陕甘宁边区的各根据地，毛泽东的这个思想不仅表现在口头上和书面上，而且被切切实实地付诸于实际。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33页。

陕甘宁边区和各根据地的政府，都是根据“政治民主、选举第一”的原则，自下而上选举产生的。在政权结构上，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民主党派占三分之一，非党人士占三分之一。这就可以充分反映各阶层人民的利益。为了保证政府工作人员勤政、廉政，边区政府还制订了《边区政纪总纲》、《政务人员公约》，详细地规定了工作人员的职权和必须遵守的纪律，并号召群众监督政府。

正是由于实行了民主政治，广大民众的基本政治权利有了保障，才使他们的心情舒畅，并确实感觉到自己是当家作主的。在边区的选民中流传着这样一首小调：“民主权利要实行，选举为咱老百姓，咱们选举什么人？办事又好又公平，还不要私情。”边区政府中有的参议员，曾把“三三制”形象地比喻为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士在尽救国之责中“同舟共济”。这些都表现了边区民众从获得的政治权利中认识了自身的价值和作用。而这种认识不正是推动民众更加自觉、主动地接受党的政治动员，投身于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斗争的思想基础吗！

也正是由于实行了民主政治，政府确实成为代表民意的政府，广大民众的物质利益才有了可靠的政治保障。在土地政策中实行“二五减租”，在劳动政策中实行照顾劳资双方利益的政策，在税收政策中实行统一累进税，在经济政策上实行发展生产和商品流通，这一系列给民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的政策，都是民主政府实行的。

同样，正是由于实行了民主政治，才有了不谋私利，不搞特权，廉洁奉公的政府，也才在民众中树立起党和政府的威信，使党和政府具有了巨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边区政府就曾以民主、廉洁、一心为人民的作风，赢得了包括普通老百姓、党外人士、甚至到边区

考察的外国人士的心。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认真实践着他贴在床头的座右铭：“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被边区人民誉为“人民的老黄牛，”一位70岁的老人为了感谢使他过上幸福生活的边区主席，带上年糕和大红公鸡，徒步数里给林主席拜年。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给政府提出了“精兵简政”的建议。毛泽东说，我们的党和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论谁提出意见，只要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办。精兵简政的意见被政府采纳和实施后，不仅解决了“鱼大水小”的矛盾，减轻了人民负担，而且赢得了李鼎铭等党外人士对党所领导的抗日事业的真诚拥护，他不仅把全部家产献给了当地政府，叫在国民党统治区当差的大儿子弃暗投明，而且下功夫学习马列和毛泽东著作。一位美国人1945年来到延安，他不相信这里的政府是廉洁奉公的。一天傍晚，他在延河边散步，看见一个青年挑着一担马草从小路上走来，后边跟着一个戴旧草帽的老头，也背着一大捆马草，走到跟前，他愣住了，“这不是林主席吗？”他对着林伯渠喊出了发自肺腑的声音：“主席先生！我在这块土地上，从你们的行动里，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

陕甘宁边区及各根据地的民主实践，深深印证了毛泽东的政治动员离不开给民众以政治利益，即民主自由权利的理论观点。

总结毛泽东关于给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的全部理论及其全部实践，不难得出这样两点结论：第一，给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原则的含义，完全不同于向群众施舍小恩小惠，也不等同于一事一报的物质鼓励。它首先是指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党和政府通过制订和实施各项实际政策，使群众抓住自己的根本经济、政治利益，去为之奋斗，并从中获得好处。其次是指党和政府要尽可能地帮助群众解决实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排忧解难。正是因为给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含有这样深广的含义，它的实践才在民众中

产生了万众追从，不惧流血牺牲地跟着共产党走的强大效力。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单纯的物质鼓励不可能产生这样的效力；而当时，无论在陕甘宁边区还是在各根据地，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即使在生产有了发展，生活得到改善的情况下，群众的物质生活仍是十分菲薄的，党和政府亦财政拮据，没有，也不可能直接拿出财物给群众以帮助。第二，中国广大的民众不仅听其言，而且观其行，才相信了共产党的政治动员，确认共产党领导的事业便是他们自己的事业，从而心甘情愿地跟着党闹革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党的民众政治动员工作是由宣传鼓动工作和党的政策实践两部分组成的。要成功地从政治上动员民众，不可不追求宣传鼓动内容和形式的科学、完美，同时，更要使党的实际政策真正反映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并落到实处。

三、把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

毛泽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理论,是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甚至是最重要的方面。他在延安时期的13年中,对军队政治工作理论有许多新的建树,特别是从把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出发,提出了用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等重要思想,总结推广了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政治工作的新经验,使我军政治工作的理论和实践都获得了很大发展。

(一) 用进步的政治工作培育新型军队

在毛泽东看来,新型的军队必须有新型的政治,因而必须把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而这就需要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需要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制度去保证这种贯注。

毛泽东很早就开始摸索在军队中建立新型的政治工作制度。秋收起义失败后,他在总结教训时,指出要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创造性地提出“党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他认为,连队是军队的基层战斗单位,应当把党支部建在连上,使它成为团结战斗的核心。在三湾改编时,红军第一次在班、排建立了党小组,连队建立了党支部,营、团建立了党委会,连、营、团三级任命委派了党代表,并明确规定党代表的主要职责是负责领导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在《古

田会议决议》中,他进一步提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建设一支无产阶级新型军队的首要条件的思想。指出,必须健全党的各级组织,实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从制度上确立纠正各种错误思想的保证。

在延安的 13 年,毛泽东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伴随战争实践和军队政治工作实践的深入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上深化了上述思想。

到达延安的初期,正是抗日战争爆发之际。为了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我党同国民党再次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将红军主力和南方游击队分别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新的形势下,军队政治工作怎么办?蒋介石为控制和吞并改编后的红军,在谈判中,提出取消红军的政治委员制度,改政治部为政训处,并派人担任我军政训处主任的要职。我军内部在认识上也发生了分歧。有人认为红军接受改编就是向国民党投降,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就与国民党军队没有本质区别了,说什么“昨日敌,今日友”,“红军帽,国军帽,不知将来戴什么帽?”南方游击队中,有人不愿停止土地革命,拒绝下山改编。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毛泽东一方面运用强有力的政治工作领导完成了红军的改编,另一方面又继承和发展了我军的政治工作传统,把党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在红军改编中,为能达到建立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之目的,我党一方面坚决反对国民党妄图吞并我军的野心,同时也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同意取消政治委员制度,政治部改为政训处,以拒绝国民党派人来我军任职的要求。这就顺利地完成了军队改编,实现了全国抗战。

但是,取消这些制度并不是我们的本意而只是权宜之计。毛泽

东在寻找合适的时机,重新恢复这些制度。1937年10月17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致电中央,建议部队恢复党代表制,他们指出:部队改编,政治工作人员降低职权,因而影响到政治工作人员积极性,政治工作已开始受到若干损失。而在各级指挥员方面,多数单一首长感到自己能力不够,致使军队建设上也受到某些损失。因此,建议恢复党代表制度和政治部。提出,党代表的职权一般与过去政委相同,应是负责保证党的路线与上级命令之执行,领导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对党的政治工作有最后的决定权力。团以上或独立营执行党代表制度,师政治处改为政治部,连仍为指导员。10月22日,洛甫(张闻天)、毛泽东复电,同意他们的建议,指出,“惟党代表名不妥,仍应为政治委员”。10月28日,我军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部的名称,并决定聂荣臻为115师政委,关向应为120师政委,张浩为129师政委。在此期间,中央军委成立了军委总政治部,由任弼时任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后由王稼祥任主任,傅钟、谭政为副主任),对外则以八路军政治部的名义出现。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非常高兴地宣布:“在八路军中……因受国民党干涉而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因受国民党干涉而改为政训处的政治部的名称,现在已经恢复了。”^①

经历了这段时期之后,在毛泽东领导下,我军的政治工作更加大踏步地前进了,政治工作制度也进一步完善了。

1938年5月,毛泽东提出了把“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的新的重要思想,并对此作了系统的阐述。他认为,军队要战胜敌人,需要增强技术装备,需要灵活的战略战术,没有这些当然不能胜利。“然而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93页。

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①这一思想为我军政治工作制度的建设提供了新的动力。

1938年底,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共中央军委批准颁布了《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进一步明确了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一是巩固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保证战斗的胜利;二是保障军队与居民的亲密关系并发动民众,积极参加抗战;三是进行瓦解敌军的工作,争取敌军士兵共同反对侵略战争。并制订了包括政治委员、政治指导员、团政治处、旅政治部、师政治部、集团军政治部、政治战士、随营学校、政治机关、兵站政治机关、医院政治机关、战士通讯处、俱乐部救亡室、青年队等在内的14个政治工作暂行条例。在《政治委员暂行工作条例》中规定:“在团、旅、师、独立支队及相等机关设立的政治委员,必须由最有政治觉悟、最坚强、最勇敢,并有很高军事知识及教育经验的共产党员担任。政治委员是中国共产党在军队中的全权代表,有参加一切军事行动与军事、行政之最后决定权;政治委员负责本部队中的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并经过党的政治的指导作用,保证一切军事行政人员顺利完成其工作和吸收他们积极参加政治工作与提高他们在工作中的威望。”这些规定大大丰富了红军时期政治工作制度,保证了新型军队的新型政治工作的开展。

1944年4月,谭政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这一报告完整地体现了毛泽东对军队政治工作的理论思想,也是我军政治工作制度建设史上的重要文献。写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11页

这样一部报告,是毛泽东多年的夙愿。早在1936年12月,他在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时,就准备写一节军队政治工作问题,但因忙于解决西安事变而搁笔。在以后的文章、报告、谈话、讲演中,他都阐述过一些重要思想。这份报告是他委托谭政起草的。在起草前,毛泽东召集了贺龙、徐向前、肖劲光、谭政等人,一起细谈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情况。初稿写成后,谭政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作了修改,并写信指示谭政将修改稿送给周恩来审阅,同时送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领导干部,征求他们的意见。周恩来亲自召集了在党校学习的领导干部、留守兵团领导以及来延安参加七大的旅以上干部,讨论了修改稿。在经过多方面的多次讨论的基础上,毛泽东作了几次重要修改。其中有12段,大约3000多字是毛泽东亲笔写的。对一些在讨论中被删去的内容,毛泽东都认真审阅和修改。毛泽东在审阅修改这一报告时,主要阐述了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军队必须完全地绝对地无条件地服从党和党的领导机关的政治指导,不允许有独立性。二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三是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基本原则以及基本方向。四是要纠正政治工作中爱好空谈、脱离实际、重形式、轻内容、团结少数、脱离多数的倾向。毛泽东的这些重要思想,完整地总结了我党我军创建以来,主要是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民族战争两个时期的历史经验,提出和回答了我军政治工作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原则问题和组织制度问题,成为我军政治工作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二) 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对军队政治工作理论的又一重大建树,就

是完整地提出了我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他指出：“八路军更有一种极其重要和极其显著的东西，这就是它的政治工作。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有三个，即：第一、官兵一致的原则，这就是在军队中肃清封建主义，废除打骂制度，建立自觉纪律，实行同甘共苦的生活，因此全军是团结一致的。第二、军民一致的原则，这就是秋毫无犯的民众纪律，宣传、组织和武装民众，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打击危害军民的汉奸卖国贼，因此军民团结一致，到处得到人民的欢迎。第三、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①如此完整而又明确的提出我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既是对我军政治工作经验的科学总结，又是对我军政治工作理论的重大发展。

关于官兵一致的原则。

毛泽东在三湾改编中，开始为我军确立新型的官兵关系。他把实现官兵政治上的平等，扫除旧军队的一切不良制度和习气，视为提高红军战斗力的重要方面。一是规定军官不许打骂士兵，废除肉型和烦琐的礼节，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二是规定官兵待遇平等，实行经济公开，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三是为保证士兵的政治地位和民主权利，建立新的带兵方法，确定在连队以上各级建立士兵委员会。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讲到：“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然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零用，名曰‘伙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79页。

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象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①这种“民主主义”的实质内容，就是在军队的内部建立新型的官兵关系。

1929年12月28日，毛泽东在他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深刻地阐述了官兵一致的思想。指出：“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分别，没有阶级的分别，官长不是剥削阶级，士兵也不是被剥削阶级。”^②在政治上都是平等的，都是阶级兄弟。官长要爱护士兵，关心他们的政治进步和生活状况，尊重他们的民主权利和人格，坚决废止肉刑，纠正打骂士兵等旧军队的管教方法。士兵也要服从官长的领导，自觉遵守纪律，纠正极端民主化、平均主义和雇佣思想。为使红四军全体官兵真正认识官兵一致对军队建设的重大意义，毛泽东还着重分析了肉刑的来源并提出了废止肉刑的理由。指出：“封建阶级为了维护它的封建的剥削，不得不用最残酷的刑罚做工具，以镇压被剥削者的反抗和叛乱，这是肉刑所以为封建时代的产物的理由。”^③“苏维埃政权，是最进步阶级的政权，它的下面，不应有一切封建制度的残余存在。”^④这种封建残余是与红军的斗争任务完全背驰的现象，如不赶快纠正，危险不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65页。

②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教学研究资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114页。

③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教学研究资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116页。

④ 同上

可胜言。他还提出“红军废止肉刑的法律程序：(一)修改红军惩罚条例；(二)由最高军政机关会衔发布废止肉刑的通令，并颁布新的红军惩罚条例；(三)通令发布后，一方面由军政机关召集官长会议，详细说明废止肉刑的理由，使全体官长拥护这个通令的重大改革，良好地努力地在部队中执行起来；(四)一面由士兵会召集士兵代表会议，除拥护这个改革，以后要自觉的遵守纪律外，并要森严群众的纪律制裁，以达到肉刑废止后的良好的收获。”^① 上述这些重要思想，为克服封建制度残余在军队中的影响，达到官兵一致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使我军新型的官兵关系大大地发展起来。

官兵一致的原由正是在这种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多次论述了这个原则。

1937年9月，毛泽东指出：“现在国民党军队的制度还是老制度，要用这种制度的军队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的。……必须加以改变，……改变的原则就是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中心任务是改变军队的政治精神和政治工作。模范的前例，就是在北伐战争时代的国民革命军，那是大体上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军队，恢复那时的精神是完全必要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今天，对于整个抗日战争，还只能起先锋队的作用，还不能在全国范围内起决定的作用，但是它的一些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优点是足供全国友军采择的。这个军队也不是一开始就像现在的情形，它也曾经过许多的改造工作，主要地是肃清了军队内部的封建主义，实行了官兵一致和军民一致的原则。”^②

1938年5月，毛泽东指出：“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教学研究资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11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70—371页。

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军队应该实行一定限度的民主化,主要地是废除封建主义的打骂制度和官兵生活同甘苦。这样一来,官兵一致的目的就达到了,军队就增加了绝大的战斗力,长期的残酷的战争就不患不能支持。”^①

1944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所作《1945年的任务》的讲演中,强调指出:“军队内部的团结,非常之重要。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历来依靠官兵一致,获得了光荣的胜利。但是,中国军队的军阀主义习气在我们军队里的影响,仍然是存在的。1945年,应该进行广大的工作,将军队官兵关系中的一切不良现象,例如:打人,骂人,不关心士兵的给养、疾病及其他的困难,对于士兵的错误缺点不耐烦说服教育,轻易处罚,以及侮辱或枪毙逃兵等等恶劣习惯及错误方针,从根本上去掉。许多部队,现在还未重视这工作,由于不明白这工作是军队战斗力的极其重要的政治基础。”^②

关于军民一致的原则。

毛泽东一贯坚持军民一致的原则。早在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时,他看到:“红军每到一处,群众冷冷清清,”就开始思索军队和人民的关系问题了。他认为,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与民众的利益是一致的。我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斗争,就是要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打碎,把土地分给没有土地的农民。在这个前提下,发动群众参加革命也就成为可能。他还从军队本身的行为着眼,作为根本改变旧军队与民众那种关系的重要途径。三湾改编以后,他就经常教育部队要尊重群众的利益,爱护他们的一草一木,一个鸡蛋,一针一线。他还亲自制定了红军《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改为八项注意),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11页。

^② 《解放日报》,1944年12月16日。

将革命军队如何对待群众的根本态度,用最具体、最简明的语言固定下来,规范每一个指战员的行动。红军的严明纪律和为群众服务的革命精神,深得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形成了军民之间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鱼水关系。1934年,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讲话中,又进一步强调党、军队和地方政权要解决群众生活中一切实际问题,就能真正成为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

军民一致的原则,就是依据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和实践活动逐步确立的。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关于军民一致的思想得到丰富和发展。

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进一步阐述了我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并深刻地论述了军民一致问题,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理论。他指出:“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①毛泽东把动员民众参战,作为抗日战争时期军民一致原则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我军每到一处,都要向民众进行抗战宣传。告诉人们没有八路军和抗日军队的浴血奋战,民众就只能是生为亡国奴,死为亡国鬼;而没有动员民众的广泛参战,没有民众的支持,战争也是不能胜利的。这就构成了在民族危亡中军民之间那种生死相依的血肉关系。

抗日战争的防御阶段,这是我党我军兴灭存亡的关头。一是日本帝国主义采取“总体战”,集中力量,妄图消灭我党我军,疯狂进攻抗日根据地。二是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反共、投降的罪恶活动,对我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三是华北地区持续几年的严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12页。

重的自然灾害,加重了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困难。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的方针、原则和方法,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战胜一切困难的决心,并为军民一致的原则充实了新的内容。减租减息运动,稳定了战士的抗战情绪,也调动了广大农民的发展生产支援战争的热情和积极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一改自古延续的军队征粮制,对减轻人民负担、共渡难关起了重大作用;开展拥政爱民、拥军优属运动更是极大地增强了军政军民之间的团结。

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我们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团结,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在这个宗旨下面,这个军队有一个很好的内部和外部团结。在内部——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之间;在外部——军民之间,军政之间,我友之间,都是团结一致的。”^①正是靠了这种军民团结,在抗日战场和以后的解放战争的战场上,我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解放军的各部队,获得人民的真诚的拥护和无私的援助,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关于瓦解敌军的原则。

这一原则的形成也有一个发展过程。1928年1月,红军俘虏了大量敌军官兵。如何对待他们,既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又是一个事关重大的问题。对此,毛泽东制订了对待俘虏的四条政策:一是不打、不骂、不杀、不虐待;二是不准搜腰包;三是受伤的给治疗;四是去留自愿。这是我军最早的对待俘虏的政策。这个政策宣布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39页。

之后，多数人拥护，但也有人感到“新鲜”，不理解。认为俘虏兵是敌人，是“阶下囚”，不能当成“座上宾”，还有的人总想对俘虏兵出出气，报报仇。毛泽东针对这种情绪，给部队专门讲了一次话，他说，出气、报仇，你们找错了对象。白军士兵绝大多数是工农子弟，你们杀了他，地主豪绅连眉头都不皱，马上去抓新的，结果还是穷苦老百姓倒霉。红军不是解放劳苦大众吗？有些同志脑子一热就忘了。做什么事都得有耐心，白军士兵越是不了解我们，越要多往回放，让他们回去替我们宣传。一回不行两回，两回不行三回。总有一天他们会觉醒过来的。在井冈山时，我军除了严格执行这四条政策外，还广泛发动红军官兵对俘虏进行抚慰和宣传。对于要回家的俘虏，都要举行“欢送新兄弟大会”，发给路费，敲锣打鼓送出阵地。还开展了写标语、散传单和对敌军阵地喊话等宣传活动，并将经过教育表现好的俘虏兵提拔当干部。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优待俘虏兵，医治敌方伤兵，是对敌军宣传极有效的方法。规定不准没收俘虏身上的财物，要以极大的热情欢迎俘虏兵。使他们感觉到精神的欢乐；反对给俘虏兵以任何言语上的或行动上的侮辱；要给他们和老兵一样的待遇。通过这些工作，对揭穿敌人对我军的欺骗宣传，动摇敌军士兵的军心，起到了重大作用。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瓦解敌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发展成为我军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原则。

到了延安以后，我军继续贯彻毛泽东瓦解敌军的原则。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后，我军总是将俘虏的官兵和缴获的物资，如数送还。他们回去后，变成了我军的义务宣传员。往往是我军还没有到达，那里的敌军就已经了解到我军是真正抗日的“仁义”之师。我军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在国外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37年英国记者贝特兰在同毛泽东谈话中，特别问道：宽待俘虏的政策对日军是

否有效？毛泽东回答：对日军俘虏仍然采取宽待政策。“我们宽待俘虏的政策仍然不变。我们仍然把被俘的日本士兵和某些被迫作战的下级干部给以宽大待遇，不加侮辱，不施责骂，向他们说明两国人民利益的一致，释放他们回去。有些不愿回去的，可在八路军服务。”^①并且第一次把“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作为我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基本原则之一提了出来。而且指出：“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办法虽然目前收效尚未显著，但在将来必定会有成效的”。^②1940年，毛泽东在《论政策》中，再次指出：“对敌军、伪军、反共军的俘虏，除为群众所痛恶、非杀不可而又经过上级批准的人以外，应一律采取释放的政策。其中被迫参加、多少带有革命性的分子，应大批的争取为我军服务，其他一律释放；如其再来，则再捉再放；不加侮辱，不搜财物，不要自首，一律以诚恳和气的态度对待之。不论他们如何反动，均取这种态度。这对于孤立反动营垒，是非常有效的。”^③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多次发出指示，要求各级政治机关把严格战场纪律，严格执行俘虏政策，作为部队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教育全体指战员充分认识正确执行战场纪律和俘虏政策，对于粉碎敌伪军的欺骗宣传，瓦解敌军的重要意义。特别是朱德、任弼时亲自接见的军伤兵，聂荣臻亲自关怀和照顾从战场上救出的两个日本女孩的行动，更是提高了全体指战员严格执行党的俘虏政策的自觉性。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我军开展了有计划、有领导、有目的的对日伪军的政治工作一是培训了对日军工作的干部。为了解决对日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8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7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67页。

军问题瓦解“收效尚未显著”的问题，在延安成立了敌工干部学校，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也都开办了敌工训练队或训练班，组织指战员学习简易的日语，使一般战士普遍能喊出三、四句日语口号。二是提高日军俘虏的觉悟，建立“反战同盟”促进日军内部的反战运动。我军各部队在提高日军俘虏的政治觉悟的基础上，把他们组织起来，建立“反战同盟组织”。1939年，在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成立了“日军士兵觉醒联盟”；1940年8月，在延安成立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1942年8月，在延安举行了华北日本士兵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发出的《告华北各部队战友们》的信中写道：现在我们在八路军内，非但没有被当作敌人，反而受到国际朋友般的待遇，过着自由快乐的日子。由于“反战同盟”的宣传真正适合日本国情，了解日本士兵的心理，又能根据日本的风俗习惯，使日军反响强烈，收到明显效果，有力地揭穿了敌人的欺骗宣传，减轻了日军对我军的敌对情绪。还有许多日本“反战同盟”成员，毅然参加我八路军、新四军，有的还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在我军俘虏政策的感召下，日伪军内部的反战、厌战情况日益高涨，自杀、逃跑事件日益增多。在抗战期间，日军有756人自愿向我军投降，伪军有18万余人反正。这与毛泽东为我军制订的正确的俘虏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是瓦解敌军的原则在实践上的胜利。

我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说到底还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这一根本观点在军队政治工作中的运用。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敌军。这些原则要实行有效，都须从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这种根本态度出发。那些认为不是根本态度问题而是技术问题的人，

实在是想错了,应该加以改正才对。”^① 毛泽东这里把这个问题提到根本态度的高度来认识,正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尊重人民群众的根本观点作为基础的。尊重士兵,尊重老百姓,尊重俘虏的人格,也就是尊重人民群众,尊重历史的创造者。这不但是军队政治工作的大原则,而且也是党的全部政治工作的大原则。上述三大原则构成了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重要内容。

(三) 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政治工作

毛泽东在延安的 13 年中,对我军政治工作有重大丰富和发展,创造了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政治工作。择其要者列举如下。

对军队中知识分子的教育工作。

从抗战开始到 1939 年,我军已吸收知识分子约 1 万人。呈现出我军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吸收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军队的大好形势。如何使这部分人尽快成为我军各方面的人才,提高军队的素质,完成抗日大业? 这是我党我军面临的一个新问题。

毛泽东首先肯定了知识分子在人民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设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② 规定今后一切战区的党和一切党的军队,应该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军队,并按照具体情况将具备了入党条件的知识分子吸收入党。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 512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 618 页。

毛泽东特别重视对知识分子进行教育,以便“在长期斗争中逐渐克服他们的弱点,使他们革命化和群众化。”^①从1940年到1942年,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多次发出指示,从各方面对开展知识分子思想工作做了规定。根据这些指示精神,我军广泛开展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1941年10月,总政治部颁发了《关于技术部门技术兵种技术专家的政治工作训令》,以解决对知识分子政治工作的方针和训练使用问题。文件强调必须纠正把政治工作与技术工作对立起来的倾向,要求政治工作必须保证技术工作,要从专家与技术人员中抽调政治上进步的党员给予政治工作的训练,并可兼任政治工作,对不懂技术的政治工作者必须训练成为技术人员或逐渐调离;要不惜重金,训练出一大批懂技术又善于做政治工作的干部,提高全军的军事和政治工作的水平。

1942年9月,总政治部把军队对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经验,归纳为“容”“化”“用”三个方面。“容,”为争取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军队,并使之成为优秀的革命军人。“化”,为转变他们思想上的小资产阶级意识,使之无产阶级化、革命化。“用”,为正确地使用他们,为之创造在政治上进步、技术上得以提高的发展条件并提拔和重用他们。这三字经验是军队知识分子政治工作的创造,也为其他方面知识分子的政治工作提供了指导。

全军各部队,由于很好的贯彻了毛泽东、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精神,解决好了革命军队如何对待和使用知识分子的问题,使部队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生机、使全体指战员在政治上军事上大大地提高了一步,适合了人民战争的需要。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19页。

在军队中倡导革命英雄主义教育运动。

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发扬革命英雄主义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在全军中广泛深入的开展这一教育运动,是在毛泽东倡导下进行的。

抗战以前,我军虽有“革命英雄主义”的传统,但还没有明确提出“革命英雄主义”的概念。抗战初期,1939年3月,毛泽东、王稼祥等联名发出《关于注意收集各部队民族英雄事迹的通知》,指出:“在抗战中,从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与战士中涌现出许多民族英雄,表扬这些英雄及其英勇行为,对外宣传与对内教育均有重大意义。”以后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它成为军队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首先,对这项教育的含义作了科学阐明。1944年7月,朱德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一文,指出:“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不是为了个人利益打算、为反动势力服务的旧英雄主义,而是新英雄主义,革命的英雄主义,群众的英雄主义。”深刻地阐述了新旧英雄主义在本质上的区别,使革命英雄主义运动有了正确的方向。

其次,使这项教育工作成为制度。1944年12月,毛泽东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讲话中指出:“从军队中、农村中、工厂中及政府等机关中,用民主选举的方法,选出优秀分子,充当战斗英雄、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给予奖励与教育。经过他们去鼓励与团结广大的群众。这种制度,对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数年来的经验已经证明是极有效果的,各地应该普遍地推广这一运动。”^① 我军各部队及政治机关,坚决贯彻了毛泽东的指示,先后制订出评选英雄

^① 《解放日报》,1944年12月16日。

模范的条件及奖励办法。其中有：总政治部《关于八路军奖励问题的指示》、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关于“八一奖章”的指示》、太行军区《关于召开部队参加杀敌及劳动英雄大会的命令》等等。这些指示、命令详细、具体，对革命英雄主义运动的开展起到了很好的规范作用。比如太行军区的《命令》规定杀敌英雄的条件有：一是一贯作战勇敢，有显著特殊之战绩者；二是在危险情况下，顽强不屈，沉着镇定，机智勇敢，坚决打击敌人，完成任务者；三是为群众利益着想，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处处打击敌人，有特殊表现者；四是虚心学习，不骄傲自满，能接受并发挥战斗中的教训和经验，为杀敌而不断提高自己的技能，并能帮助同志训练技能者。根据这些条件，各部队经过由下而上的群众评选和一定领导机关的审批，推举出大批的英雄人物。在此基础上，各部队逐级召开群英大会，举行隆重的授奖仪式，组织英雄报告会，编辑了《八路军的英雄们》等书籍，向全军进行广泛的宣传。

毛泽东还非常关心革命英雄主义教育运动的健康发展。1945年1月，他在陕甘宁边区英模会议上讲：“你们有许多的长处，有很大的功劳，但是你们切记不可以骄傲。你们被大家尊敬，是应当的，但是也容易因此引起骄傲。如果你们骄傲起来，不虚心，不再努力，不尊重人家，不尊重干部，不尊重群众，你们就会当不成英雄和模范了。过去已有一些这样的人，希望你们不要学他们。”^①

革命英雄主义教育运动是我军创造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种极好方法，在军队建设中起了重要作用，在夺取抗战乃至夺取全国胜利的斗争中都发挥了巨大作用。

新式整军运动。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14页。

在解放战争中,俘虏兵大量加入我军。如何运用政治工作使他们迅速地成为人民战士,这是当时我军遇到的一大问题。

1947年9月,毛泽东发现了辽东三纵队开展诉苦运动教育解放战士的经验报告,十分重视并亲自对报告作了修改和批示。1948年1月,他同周恩来等人亲自听取部队诉苦三查的汇报。他高兴地说,我们从中央苏区起,就想找到一个教育俘虏兵的好形式,这次诉苦三查的办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从那以后,全军各部队广泛开展了以诉苦三查为中心的阶级教育。它的主要内容是:诉旧社会和反动派所给予劳苦大众之苦,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解放战士诉说如何在家受苦,如何被抓,在国民党军队中又如何被压迫;新战士诉说怎样受苦怎样翻身,怎样光荣参加解放军;老战士既诉参军以前怎样受苦,又述说到部队打了哪些胜仗,指战员怎样团结互助,怎样爱戴老百姓,老百姓怎样拥护军队等等。这就大大提高了新老战士的阶级觉悟,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1948年3月,毛泽东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中,对新式整军这样一种教育形式的意义作了总结。指出这种教育形式把握了对象的特点,从个人亲身体会感受中启发阶级觉悟,较之于讲道理更有说服力,而且是群众自我教育极好的方法。正因为如此,它的正确进行,“大大提高了全军指战员为解放被剥削的劳苦大众,为全国的土地改革,为消灭人民公敌蒋介石匪帮而战的觉悟性;同时就大大加强了全体指战员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坚强团结。在这个基础上,部队的纯洁性提高了,纪律整顿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开展了,完全有领导地有秩序地在部队中进行政治、经济、军事三方面的民主发扬了。这样就使部队万众一心,大家想办法,大家出力量,不怕牺牲,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群威群

胆,英勇杀敌。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①

以诉苦三查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是在毛泽东指导下,我军创造出的为人民战争所需要的极为有效的政治工作的方式和方法。它从战争实际中来,从连队经验中来,为毛泽东所发现,所提高,因此有实效,有深度,成为军队政治工作史上的光辉一页。毛泽东就是这样善于在新形势下发现、总结、倡导、推广政治工作的新思路、新经验。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94页。

四、把非无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国革命走着特殊的道路,有着特殊的风格。作为领导这场伟大革命斗争的核心力量的中国共产党,除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特别伟大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外,还领导了一场特别伟大的思想斗争,即把革命队伍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轨道的斗争。正是在这种斗争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即用无产阶级思想反对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个思想早在我党建立之初就已萌芽,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古田会议决议》为标志初步形成,在延安时期达到成熟。这个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创造性发展,也构成了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一个鲜明特色。

(一) 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非无产阶级思想大量存在的根源

在中国革命过程中,革命队伍中存在过大量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对这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曾这样说过:“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其中有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甚至地主阶级

的思想,而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矛盾,即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①就是说,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队伍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虽然包括了资产阶级甚至地主阶级的思想,但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毛泽东的其他著作中,这个观点也屡见不鲜。例如,无论是在《古田会议决议》中,还是在《反对自由主义》中,以及后来的《反对党八股》中,在探究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根源的时候,他在多数情况下总是指出,这些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

而这种以小资产阶级思想为主体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在革命队伍内的大量存在,不是没有原因的。对此,在毛泽东 1945 年主持制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曾有过中肯的分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小资产阶级相当广大的国家。我们党不但从党外说是处于这个广大阶层的包围之中;而且在党内,由于十月革命以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世界的伟大胜利,由于中国现时的社会政治情况,特别是国共两党的历史发展,决定了中国不能有强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因此就有大批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分子向无产阶级寻求出路,使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也占了多数。此外,即使工人群众和工人党员,在中国的经济条件下,也容易染有小资产阶级的色彩。因此,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党内常常有各色各样的反映,这是必然的,不足为怪的。”^②

具体说来,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中国小资产阶级的极其广大,是非无产阶级思想大量存在的首要原因。中国广大的小资产阶级虽然具有小私有者的一面,但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具有很强的革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 1108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 991 页。

命性，“是革命的动力之一，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①而数量较少的无产阶级要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不能不依靠包括广大农民在内的小资产阶级。因此，一方面是无产阶级要团结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一方面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分子要到无产阶级队伍中来寻找出路。这样一来，在革命队伍中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大量存在就是不可避免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大量存在也就是不足为怪的了。

第二，中国无产阶级本身的特殊性，也是非无产阶级思想大量存在的一个原因。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有着突出的优点，他们身受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最具有革命的彻底性；他们在走上革命舞台的一开始，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为最有觉悟的阶级；他们大多出身于破了产的农民，与广大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便于与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同时，中国无产阶级也有着不可避免的弱点：他们年龄较轻，几乎是刚刚从农民脱胎而来；他们人数较少，不能不处于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般的包围之中；他们文化水平较低，革命的理论准备不足，学习马克思主义还有着文化上的障碍；加之他们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这样一个复杂污浊的社会环境之中。这种种情况使得中国的无产阶级不能不受到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不少人不能不染有小资产阶级的色彩。

第三，广泛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不够，也是非无产阶级思想大量存在的一个原因。早在1929年，毛泽东就指出，党对于不正确的思想缺乏斗争和教育，也是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到延安以后，他又多次指出，党发展了，革命队伍扩大了，但是还没有来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41页。

得及给予必要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不少人还摇着旧社会不良思想的尾巴、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尾巴。之所以教育不够也是有其原因的。“左”倾路线统治时期不可能领导全党进行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教育;在农村中长期分散的游击环境也不利于进行政治教育;而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政治干部的缺乏和广大党员、群众的文化水准不高,也使得普遍深入的政治教育难于展开。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的存在,使得革命队伍中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大量存在成为必然。

2. 非无产阶级思想对革命的危害

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大量存在,对于中国革命具有极大的危害。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分析过非无产阶级思想对革命的危害,他讲:“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①到延安以后,他又多次讲过这个问题。综合起来,毛泽东对革命队伍中非无产阶级思想危害的分析主要集中在下述方面。

第一,它在思想上妨碍着党和革命队伍的统一。我们党和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的指导思想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即马克思主义。但是,革命队伍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冲突的”。^②由于它们的存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③主观主义无从克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难以确立,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观点就不可能为全党普遍接受。更为严重的是,那些坚持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人,总是通过种种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8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6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33页。

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①而这当然是十分危险的事情。

第二,它在组织上妨碍着党和革命队伍的团结。党的组织统一,革命队伍的团结一致,是无产阶级战胜敌人的根本武器。但是,革命队伍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恰恰是党与革命队伍团结的“腐蚀剂”。它“使团结涣散,关系松懈,工作消极,意见分歧,它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②更为严重的是,它有“可能发展到小组活动与派别斗争,一直到公开反党,”^③从而最终有可能把革命队伍搞垮。

第三,它在政治上妨碍着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从而妨碍着党的政治任务的完成。关于非无产阶级思想妨碍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这一点,毛泽东到延安以后也屡有提及。党的正确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而非无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一不懂马列,二不懂中国国情,不可能真正懂得党的正确路线,而他们的所做所为,又无一不起着破坏、干扰党的正确路线执行的作用。这样一来,党的政治任务的完成,夺取革命的胜利,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左”倾路线使红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损失百分之百的历史便是明证。

正是由于上述种种危害,毛泽东严肃指出,包括主观主义在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7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60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

革命才会胜利。”^①这也就是告诉了全党,在广泛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革命队伍中,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把非无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的问题,也即在革命队伍中坚持“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②

(二) 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1. 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

关于非无产阶级思想在革命队伍中的表现,毛泽东做过多次集中的分析。第一次是1929年,在《古田会议决议》中,他列举了红军第四军中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念、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八种表现。第二次是1937年,在《反对自由主义》中,他列举了在政治、组织、思想上的自由主义的十一种表现。第三次是在1942年前后的整风之中,他列举了主观主义(包括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宗派主义(包括在局部与全体的关系、个人与党的关系上等七个方面),党八股(包括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等八个方面)三大表现,以及非无产阶级思想在革命文艺队伍中的若干表现。这些论述,把非无产阶级思想在革命队伍中的形形色色的表现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十分详尽而精彩。

这里我们再看看《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如何从更高层次上概括以小资产阶级思想为主体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的。鉴于至今我们仍然不能比这些经典性的概括做得更好,也为了大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0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77页。

家见到这一概括的全貌,我们将有关段落照摘如下。

“首先,在思想方法方面。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基本上表现为观察问题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即不从阶级力量对比之客观的全面的情况出发,而把自己主观的愿望、感想和空谈当做实际,把片面当成全面,局部当成全体,树木当做森林。脱离实际生产过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只有书本知识而缺乏感性知识,他们的思想方法就比较容易表现为我们前面所说的教条主义。联系生产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虽具有一定的感性知识,但是受着小生产的狭隘性、散漫性、孤立性和保守性的限制,他们的思想方法就比较容易表现为我们前面所说的经验主义。”

“第二,在政治倾向方面。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由此而来的思想方法上的主观片面性,一般地容易表现为左右摇摆。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许多代表人物希望革命马上胜利,以求根本改变他们今天所处的地位;因而他们对于革命的长期努力缺乏忍耐心,他们对于‘左’的革命词句和口号有很大的兴趣,他们容易发生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情绪和行动。”“但是,这些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在另外一种情况下,或是另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也可以表现悲观失望,表现追随于资产阶级之后的右倾情绪和右倾观点。”“一般地说,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裂的时期,比较容易发生‘左’倾错误(例如土地革命时期‘左’倾路线统治党的领导机关至三次之多),而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联合的时期,则比较容易发生右倾错误(例如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后期和抗日战争初期)。而无论是‘左’倾或右倾,都是不利于革命而仅仅利于反革命的。由于各种情况的变化而产生的左右摇摆、好走极端、华而不实、投机取巧,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坏的一面的特点。这是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所处的不稳定地位在思想上的反

映。”

“第三，在组织生活方面。由于一般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的限制，特别由于中国的落后的分散的宗法社会和帮口行会的社会环境，小资产阶级在组织生活上的倾向，容易表现为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这种情况反映到党内，就造成我们前面所说的‘左’倾路线的错误的组织路线。党长期地处在分散的乡村游击战争中的情况，更有利于这种倾向的发展。这种倾向，不是自我牺牲地为党和人民工作，而是利用党和人民的力量并破坏党和人民的利益来达到个人和宗派的目的，因此它是同党的联系群众的原则、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不相容的。这种倾向，常常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如官僚主义、家长制度、惩办主义、命令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半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极端民主主义、闹独立性、行会主义、山头主义、同乡同学观念、派别纠纷、耍流氓手腕等，破坏着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和党内的团结。”

“这些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三个方面。我们党内历次发生的思想上的主观主义、政治上的‘左’、右倾，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等现象，无论其是否形成了路线，掌握了领导，显然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之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无产阶级的表现。”^①

《决议》中的这些分析是毛泽东和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小资产阶级理论的重大发展，也为我们开展无产阶级思想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提供了科学的武器。

2. 展开无产阶级思想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

从建党建军以来，毛泽东没有停止过无产阶级思想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1929年写的《古田会议决议》就是这种斗争的一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93—996页。

次集中表现。到延安以后，毛泽东所领导的这种斗争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上展开了。这一斗争主要是在如下三个方面进行的。

第一，加强对革命队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

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既不能草率从事，也不能操切从事，而必须深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① 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转变到无产阶级革命轨道上来，从而建立起无产阶级思想对革命队伍的绝对领导。对此，毛泽东做过很多论述。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他就把“加紧政治训练”，使党员的思想“政治化、科学化”作为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延安时期，又多次论述了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为掌握思想教育，是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

毛泽东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亲自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首先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这次整风学习以毛泽东 1941 年 5 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正式开始，直到 1945 年 4 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历时四年之久，范围遍及全党。对这次整风学习，毛泽东亲自计划，亲自动员，亲自编辑学习文件，亲自做报告，亲自主持起草决议，亲自总结，投入了极大的精力，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从下面这份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和审定的整风学习考题就可以看到毛泽东对这次学习态度是何等重视，做法又是何等细致了：“（一）什么是党的学风中的教条主义？你所见到的最严重的教条主义表现是哪些？你自己在学习和工作中曾否犯过教条主义的错误？如果犯过，表现在哪些方面？已经改正了多少？今后将如何改正和预防？（二）什么是党的学风中的经验主义？你所见到的最严重的经验主义表现是哪些？你自己在学习和工作中曾否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 996 页。

犯过经验主义的错误？如果犯过，表现在哪些方面？已经改正了多少？今后将如何改正和预防？（三）你听了或读了毛泽东同志《改造我们学习的报告》和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以后，对于过去党内的教育和学习，反省的结果如何？你如何改造自己的学习和工作？（四）你接到中央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以后，怎么根据检查并改造或准备改造你的工作？”^①延安整风学习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许多亲身经历这次学习的老同志至今回忆起来，都把那一段经历视为人生征途中的一次真正的革命洗礼。正如李维汉说的那样，整风学习教育了我们党的中青两代人。

不但如此，毛泽东还抓住一切时机对革命队伍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他利用到各种学校、训练班、集会去讲演、与新到延安来的青年和作家谈话、给干部写信、在行军中同战士拉家常、题词、写挽联等机会，随时随地地进行教育。抗大三期学员牛克伦回忆，毛泽东曾用唐僧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受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的故事来鼓励同学们要有坚定的政治方向。警卫战士闫长林回忆，跟着毛主席行军，就是受教育的课堂。毛主席边走边和警卫员们聊天，问这问那，在轻松的气氛中讲出很多革命的大道理，而且大家爱听易懂，记得牢靠。

第二，拿起积极的思想斗争的武器。

毛泽东认为，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另一个有效途径就是拿起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1937年，他指出：“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

^① 转引自《弘扬延安精神》，第47页。

起这个武器”，“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①毛泽东为汲取“左”倾路线对人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教训，还制定了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的一系列方针。这个方针的基本点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就是说，对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而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同时，好象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在这个方针指引下，我们党形成了解决革命队伍内部无产阶级思想同非无产阶级思想之间的矛盾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即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这个方法至今仍是我们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法。

应当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在全党范围内，拿起积极思想斗争的武器，实行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在延安整风中开始的。许多老同志回忆起那时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情景，至今激动不已，心驰神往。他们回忆道，那时最大的特点就是无论批评别人还是检查自己，都非常严肃认真，坦诚无私。一些在土地革命时期犯过“左”的错误的领导同志、一方面虚心听取别人的批评，一方面对自己的错误做深刻的自我批评，受到了极大的教育，也得到了同志的谅解，以后重新为人民作出了贡献。许多有不少毛病的同志，在思想交锋中，受到了极大震动，“照出了自己的原型，”感到“第一次认识了自己，找到了病根及改正的途径”。^②在这种积极的思想斗争面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就难以藏身了。

第三，严格组织生活，加强革命纪律。

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要靠思想教育和思想斗争，同时还必须有严格的组织生活和革命纪律，才能有效地节制各种非无产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59、361页。

② 《中国共产党历次整党整风》，第68页。

阶级思想的滋生。这也是毛泽东对非无产阶级思想开展斗争的又一重要方面。用法规、纪律手段作为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组织保证,这个思想早在红军建立之初就提出来了。例如,毛泽东为了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包括思想领导),在进军井冈山的途中,就实行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为了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在《古田会议决议》中,还提出了“编制红军法规”、“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等措施。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一方面多次重申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一方面采取了很多实际措施加强党和革命队伍的组织纪律和制度建设,以保证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地位。1937年,毛泽东提出,“思想的统一性”和“纪律的严格性”是保证党实现政治领导的基本条件。同年又提出,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对小资产阶级领导权的过程中,要依靠无产阶级政党本身和对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觉悟和组织程度的提高。^① 1938年,毛泽东重申党的“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要求“制定一种比较详细的党内法规”,强调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使党员懂得什么是民主集中制,如何实行民主集中制,以有利于党的思想和行动的统一。^② 在延安整风前后,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指示、文件,以加强党的思想建设。1941年7月,毛泽东领导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强调在党组织的监督下,克服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独立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不断解决思想入党问题。1942年9月,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毛泽东、王稼祥起草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的关系的决定》,强调全国全军党组织的高度统一,克服各种形式的山头主义、分散主义、本位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63、27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28—529页。

主义等错误思想。到1948年1月,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每两个月就军事、政治、经济、党务、宣传、文化等各方面的动态和发生的问题、倾向向中央作一次综合报告;要求各野战军和军区首长每两个月就作战方针、军队纪律、生活、情绪、发生的偏向及政治工作情况、政策执行情况向中央作一综合报告,以便中央及时了解全党全军的行动和思想状况,采取相应对策。这些指示和文件从组织上促进了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保证了无产阶级思想领导这一非常重要之问题的解决。

(三) 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1. 必经的途径,唯一的标准

毛泽东在提出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过程中,历来重视关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延安时期,毛泽东根据几十年革命历史经验的总结,作出了中国的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是革命队伍中一个重要方面军的结论。同时,他强调,青年要成为真正的革命者。起到应有的作用,必须抛弃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必须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所谓政治方向“正确”,就是要把思想和行动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作为自己自觉的选择;所谓政治方向“坚定”,就是在为人民事业奋斗的过程中,要百折不挠,始终如一,毫不动摇。

怎样才能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倾向,成为政治方向坚定正确的革命战士?毛泽东指出,只有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是青年知识分子成长和发展的必经途径。毛泽东在《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一系列文章中,在对中

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动力,以及对旧民主主义革命经验分析和总结的基础上,指出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必要性。

必要性的首要之点是,知识青年只有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才能找到自己的政治归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是最有革命觉悟的阶级和最坚固的革命同盟军。他们是革命运动的最积极最坚决的参加者,是革命的主力军,“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①知识青年要想成为革命的参加者,并真正发挥先锋和桥梁作用,就只有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脱离了工农群众,实际上就是脱离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运动,无论有多么伟大的抱负,也将一事无成,只能做一场伟大社会变革的旁观者和局外人。

必要性还在于,知识青年只有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才能改变自己的立场,坚定自己的革命意志,成为一个坚强的革命者,毛泽东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由于他们的家庭出身、生活条件和社会经历所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②因而,他们虽有很大的革命性,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人,到了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观望的态度,其中少数人甚至会变成革命的敌人。那些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浴血奋战于第一线的工农群众,出于阶级的自觉意志,最富革命的坚定性,在必要的时候往往能献出自己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65—56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41—642页。

一切。毛泽东由衷地敬佩他们。他曾带着很深的感情写下了纪念张思德和刘胡兰这样普通的工农革命战士的文章和题词,号召全体军民向他们学习。他所尊敬的革命老人徐特立早在参加湖南农民运动时就发出很深的感慨:“下乡一个星期,使我从18岁到50岁以来的旧思想整个革命!我过去崇拜的康、梁、孙中山,比之有组织的农民对于中国人的革命,渺乎小也!”

必要性的第三点是,与工农相结合,不仅是知识青年树立坚定正确政治方向的必经途径,同时也是判断他们政治倾向的唯一标准。毛泽东多次强调这个观点:“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这是“唯一的标准”,^①是“最后的分界”。^②把这一点作为唯一的标准,是因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五四运动后不久已经越过了舆论准备阶段而发展为蓬勃的实践运动,工农群众斗争实践已成为革命的主要方式。实践正是检验人们政治属性的试金石。看一个青年是否真革命,不是看他在口头上怎样讲,而是看他行动中如何做,如果青年不与这场革命运动的主体——工农群众相结合,甚至根本反对工农,就是在实践中把自己置于旁流或逆流中,即使在口头上大谈马克思主义,大唱革命高调,也不能作为衡量其政治态度的真正标志。愿意革命的知识青年,只有用与工农斗争相结合的标准要求自己,才能在实践中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2. 深入群众斗争实际,才能获得真知

1938年4月,毛泽东在接见抗大第三期毕业生时说到:你们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6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99页。

到抗大来学习,有三个阶段,要上三课:从西安到延安,八百里,这是第一课;在学校里住窑洞,吃小米,出操上课,这算第二课;现在第二课上完了,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第三课,这便是到斗争中去学习,向实际学习。^①这段话体现了毛泽东历来强调的观点:实践出真知。在他看来,这个观点对于青年知识分子来说显得特别重要。这是因为:

第一,革命青年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否则就缺少精神支柱;革命青年需要钻研各种理论知识,否则就不能胜任工作,但这一切都必须与实际结合才有意义。读过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并不一定就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了解几门理论知识,并不一定就能在实际中通晓一切。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真理,就因为它是从大量客观事物中抽象出普遍的规律,并且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的理论。毛泽东认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同时还要从实际中学,而后者往往是更好的方法。青年毛泽东,在读书时,就常和志同道合者“游学”,了解中国农村的具体情况,他把这叫做“读无字之书”。他曾说:“读过马克思主义‘本本’的许多人,成了革命的叛徒,那些不识字的工人常常能够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②这原因就是工农群众是在革命斗争实际中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他们往往比在书斋中研究“革命学问”的人理解得更具体、更生动、更扎实。

第二,把书本知识看作至高无上的学问,是知识分子的通病,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涉世不深,经验不足,容易产生对理论的迷信,这就更加需要强调深入到群众斗争的实际中去,向实践学习。

① 《回忆毛主席》,第24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11页。

延安时期,王明以党内“理论权威”自居,推行教条主义。他每逢演讲,总要抱一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放在讲台上,引经据典,大段背诵,还要详细地指出所引的话出自哪一章,哪一页,哪一行;他举的例子,不是法兰西、英格兰,就是希腊、罗马,貌似高深,但就是缺少有关中国革命的实际知识。王明的这一套脱离实际而又头头是道的长篇大论,迷惑了不少天真幼稚的青年,他们把他当成水平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针对这类情况,毛泽东谆谆教育青年要搞懂什么样的人才算得上真正的理论家,怎样做才称得上有知识。他说,如果一个人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烂熟,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算不算理论家呢?不能这样说。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根据革命实践创造出来的理论。一个人如果仅仅读了他们的著作,但没有企图在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就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只有既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又能在实践中加以应用的,“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理论家。”^①怎样做才称得上有知识?他讲,“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②用这个标准衡量同社会实际活动完全脱离关系的学校里面出身的学生,他们有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还没有参加任何实际活动,还没有把自己学得的知识应用到生活的任何部门里去,因而他们的知识还不完全,还很难算得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有什么办法使这种仅有书本知识的人变为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这样就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1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15页。

可以达到目的。”^①

3. 与工农相结合是一个长期的痛苦的磨炼过程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摩擦,但是只要大家有决心,这些要求是能够达到的。”^②在这里,毛泽东一方面揭示了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长期性、艰巨性,一方面对知识分子的锻炼成长提出了要求,并给以鼓励。

在毛泽东看来,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过程,之所以是一个长期的痛苦的过程,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原因。

首先,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过程,是改造思想,克服自身弱点的过程。

毛泽东指出,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投向革命队伍,走出了奔向光明的第一步,但“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③还没有树立起无产阶级世界观,他们身上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自我中心,患得患失,感情冲动,粗暴浮躁,自由散漫,怕苦怕累等非无产阶级的东西。知识分子要克服这些弱点,就要在与工农相结合的过程中,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④而这无疑是一个长期的痛苦的过程。

毛泽东曾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来教育青年自觉地改造思想、转变感情。他说,“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了。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1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7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57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96页。

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①

毛泽东要求青年自觉地甚至强制地改造自己，即使花十年八年，或是更长的时间，也要坚持下去。青年作家萧军在延安的时候，为文艺工作的开展做了许多工作，提了很多的批评建议，但他脾气急躁，且有时带有偏激情绪，与某些同志产生了矛盾和意见分歧，觉得不顺心，便想离开延安。毛泽东知道后，一方面肯定他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恳切要求他留下来帮助工作，一方面坦率地指出：“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② 这“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不仅为萧军，而且为所有青年指出了能够安定革命之心，确立为工农大众服务之使命的“出路”。后来，周恩来发挥了毛泽东关于自我改造的思想，提出“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其次，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过程，又是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

毛泽东认为，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是不可分的，它们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在《实践论》中，他讲过：“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③ 知识分子在与工农结合的过程中，如果不注意改造主观世界，即使生活在工农群众中，也会始终与他们格格不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51页。

② 《毛泽东交往录》第18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96页。

入,但是主观世界的改造是一种精神活动,它需要以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为基础和动力,若离开后者,前者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过程,首先是他们与工农群众一起投入改造客观世界活动的过程。

毛泽东要求青年和知识分子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中,艰苦奋斗,锻炼成长。任何一项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都需要经过长期、艰苦的奋斗,就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这项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而言,更是如此。没有脚踏实地、吃苦耐劳,不避艰险,不屈不挠的艰苦奋斗的决心、意志,不可能真正投入到革命实践中去,亦不可能获得改造,锻炼成长。当然,艰苦奋斗的意志不会凭空产生,而需要在艰苦的实践活动中磨炼、培养。正因为艰苦奋斗是青年和知识分子在实践中成长的重要条件和标准,所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第二期开学典礼的讲话中说:“今天陕北公学开学,我应当送点礼物,但是,我没有什么东西,只能送你们两件礼物,第一件,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第二件,是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①此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就与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一同成为延安各所学校的校训,激励着一批又一批青年积极投身于革命实践。

延安时期,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的主要内容,是进行生产劳动和革命战争。因此,毛泽东总是鼓励、引导青年和知识分子参加生产劳动,参军参战。一些知识青年初到延安的时候,不愿意从事生产劳动,认为我们投奔延安是来打日本鬼子的,不是扛锄头的。毛泽东风趣地对他们说,我也不愿意搞生产,但是有一位同志不答应,他就是“肚同志”。一句话,把青年们都说笑了。他们心悦诚服地投入了大生产。毛泽东还对抗大的青年们说过,你们不要小看打

^① 《中国青年运动六十年》,第257页。

窑洞，打窑洞是接近工农的第一步，打窑洞就是打通和工农群众隔开的墙。毛泽东曾把从苏联留学回国的毛岸英送到陕北的一位老农那里，让他拜老农为师，上“农业大学”。在毛岸英“毕业”之后，毛泽东还强调这种学习是没有止境的，“学到老，学不了。”^① 在延安还流传着毛泽东送丁玲当红军的佳话。1936年秋季，著名女作家丁玲来到陕北，毛泽东问她打算干什么，她回答“当红军”，毛泽东就让她随红军到了前线。在丁玲到前线后，毛泽东特地为她写了一首：“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词，以示鼓励和关心。后来丁玲从前线回到延安，毛泽东又任命她为中央红军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开始，一些干部战士不敢接近她，甚至对她的某些作风看不惯，她便主动接近他们，与他们谈心、拉家常，甚至放弃吃小灶白面的待遇，吃她不习惯的小米杂粮。渐渐地，隔阂消除了，她与干部战士建立起了亲密感情。事后，她深有体会地说：“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若不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在革命战争中就会一事无成。我非常感谢红军干部战士对我的支持、帮助和爱护。他们是我的老师。”^②

当年，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象毛泽东一样，鼓励、教导青年在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实践中锻炼成长。1941年，朱德总司令代表党中央，向来到延安的青年赠送了三件宝贝：镢头、枪和笔。他勉励青年们：拿起镢头开荒种地，在劳动中锻炼自己，建设好边区；拿起枪来打击敌人，学会武装斗争，保卫好边区；拿起笔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文化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他还说，温室里长大的花草经不住风霜吹打，不进火热的炼钢炉就炼不出顶好的钢来，青年应该投身到抗日民族解放斗争中去锻炼成长。^③

① 《回忆毛主席》，第308—309页。

② 《毛泽东生平实录》第561—564页。

③ 《中国青年运动六十年》第258页。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教导下,原来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城市青年,“脱下学生装,穿上粗布衣”,他们在延安一边学习一边生产,用自己的双手开出了一眼眼窑洞,建起了一座座校舍,用辛勤的汗水浇灌了千亩万亩荒地;他们一边学习一边军训,行军宿营、侦察警戒、实弹射击……。在学校时,他们以“学好本领上前线”,“青年的位置在前线”这样的口号互相勉励,毕业之后,他们打起背包,从抗日军政大学、延安大学、陕北公学、鲁艺、安吴青训班……,一批批奔赴敌后,奔赴战区,在血与火的斗争中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成长为会劳动能打仗的坚强革命战士。

毛泽东充分肯定了延安青年的道路,他说:“延安的青年运动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模范。延安青年运动的方向,就是全国青年运动的方向。”^① 延安青年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因为他们实行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延安青年的政治方向是坚定的,因为他们既学到了革命理论,又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炼了思想、砥砺了意志,他们是中国革命的先锋。

大批青年坚定地、源源不断地投身于人民革命的运动中去,在群众中锻炼,在群众中成长,然后又作为革命的种子在群众中开花结果,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最终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延安时代已成为历史,但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仍然需要大批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发扬延安时期的精神,坚定地投入中国人民改革、建设的洪流中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② 为振兴中华而建功立业。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6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77页。

五、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

“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的一个伟大思想，是他对思想政治工作的杰出贡献之一。他率先提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强调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革命工作要极端负责，要艰苦奋斗和不怕牺牲。毛泽东的这个宝贵思想，早在我党建立之初就得到了初步阐述，到延安时期，随着《为人民服务》等一系列光辉著作的发表而逐步趋于成熟。

（一） 光辉的榜样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写下的三篇著名文章《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为徐特立六十岁生日写的贺信》，是每个共产党员和每个革命者的必读书。毛泽东在文中，通过赞扬白求恩、张思德、徐特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人格，提出了做人的高标准，为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树立了三座不朽的丰碑。

白求恩、张思德、徐特立的一生，是平凡而又伟大的一生。他们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尽心尽职地为党工作，严格用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时时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以自己的光辉业绩，实践了自己的人生理想，谱写了一曲壮丽的人生赞歌。

诺尔曼·白求恩(1890—1939)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世界著名

的胸外科专家,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他曾任蒙特利尔皇家维多利亚医院胸外科医师和圣心医院胸外科主任。1936年德意法西斯侵犯西班牙时,他毅然放弃优越的职位,亲赴前线为进行反法西斯战斗的西班牙人民服务。1937年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率领加拿大——美国医疗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解放区,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他于1938年3月底到达延安,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会见,不久转赴晋察冀边区工作,仍与毛泽东有通信往来。在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里,他和八路军的干部战士同甘苦、共患难,多次冒着生命危险,亲临前线战场,抢救和治疗抗日军民伤病员,并培养了大批医务干部。他的牺牲精神、工作热忱和工作责任心,均为楷模。1939年,他在一次为伤病员施行急救手术时受感染,不幸于11月12日在河北省唐县逝世。听到这一噩耗,毛泽东十分震惊和悲痛。为了悼念这位国际主义战士,并用他的精神教育全体党员和人民,毛泽东在延安各界为白求恩举行的追悼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纪念白求恩》一文。毛泽东在文中首先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白求恩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的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并提倡用这种精神来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狭隘的爱国主义。接着赞扬了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指出这种精神表现在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极端的热忱。他说:“从前线回来的人说到白求恩,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晋察冀边区的军民,凡亲身受过白求恩医生的治疗和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的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①最后,他要求大家学习白求恩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并语重心长地说:“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6页。

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①

张思德(1915—1944)是四川仪陇县人，中共中央警备团战士。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春，他被调往陕西泾阳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警卫连任班长。1940年夏，调中央军委警卫营任通讯班长。1942年10月，中央成立警备团，负责党中央的保卫工作，张思德被调到警卫队工作。他沉默寡言、吃苦耐劳，项项工作都很出色，毛泽东很喜欢他。1944年，中央决定次年在延安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为解决与会代表的取暖问题，中央的邓捷负责调人去安塞烧炭。因缺乏会烧炭、打窑的人，就请警备团去人做技术指导。张思德会打窑洞和烟道，于是被派前往。9月5日，天下着雨，张思德和战士小白一起挖一个新的炭窑时，因土质松软，上面雨水渗透，造成塌方。张思德把小白推出窑外，自己被压在窑内，不幸牺牲。张思德是毛泽东等主要领导同志的警卫员，警卫队队长古远兴把这一消息直接报告了毛泽东。听完张思德牺牲的简要经过，毛泽东沉痛地说：“前方打仗死人是没办法的，后方生产劳动死人不应该！”^②当他听说张思德的遗体还被压在炭窑里时，生气地批评古远兴说：“怎么能这样呢？要尽快挖出来。放哨看好。山里狼多，不要被狼吃了。要是被狼吃了，你的队长不要当了。”^③接着他给古远兴作了明确指示：“第一，给张思德身上洗干净，换上新衣服；第二，打口好棺材；第三，要开个追悼会，我要去讲话。”^④9月8日，中央警备团、中央新会部和中央办公厅的一千多人在延安枣园操场举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6页。

② 转引自《太原日报》，1992年9月19日。

③ 转引自《太原日报》，1992年9月19日。

④ 转引自《太原日报》，1992年9月19日。

行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亲笔题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并作了《为人民服务》的重要讲演。毛泽东在讲演中开门见山地指出，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革命队伍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要求一切共产党员和革命战士都要像张思德那样，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完全彻底为人民利益而工作。他高度赞扬了张思德为人民利益而生和为人民利益而死的共产主义精神，论述了两种根本对立的生死观。他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①毛泽东在讲演中也就怎样为人民服务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

徐特立(1877—1968)是湖南长沙人，杰出的无产阶级教育家，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他19岁开始教书，从事平民教育，亲手创办了梨江高小、五美高小、长沙师范和长沙女子师范学校，并长期任教于周南女校、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和高等师范学校，教育和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他在第一师范任教期间，毛泽东正在那里求学和进行革命活动。徐特立同志的道德文章，嘉言懿行以及他那生活俭朴、治学严谨、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对年轻的毛泽东产生了很大影响。毛泽东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我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最敬佩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杨怀中先生，一位是徐老。”^②徐特立在晚年谈到他和毛泽东这段师生关系时则说：“毛主席当年听过我的课，但这只是一日之师，而毛主席则是我的终身之师。”^③徐特立和毛泽东的师生友谊，一直在党内传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04页。

② 转引自王云凤：《徐特立在延安》，第95页。

③ 转引自王云凤：《徐特立在延安》，第95页。

为佳话。1927年如火如荼的工农运动,使徐特立抛弃了教育救国的幻想,并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投身于大革命的洪流之中。大革命失败后的一个月,正值白色恐怖笼罩城乡、革命受到严峻考验的时候,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伟大的南昌起义。1928年,他到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不久又受党派遣,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底,进入中央苏区,任教育部副部长、部长。1934年,他以58岁的高龄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表现了一位老革命家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到达陕北后,他继续从事宣传教育工作,历任边区教育厅厅长、延安自然科学学院院长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他和毛泽东的关系十分融洽密切,他们经常在一起商讨工作。对于徐特立在延安的出色工作,毛泽东曾多次给予赞扬。毛泽东说,您为陕甘宁边区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培养了很多青年干部。您确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是全党学习的榜样。1937年1月31日是徐特立的60岁寿辰。党中央和毛泽东发起为徐老祝寿,延安各界举行集会表示祝贺。寿辰前夕,毛泽东写下了《为徐特立六十岁生日写的贺信》一文。贺信洋溢着真切的革命情谊,表达了学生对老师的深深敬意。毛泽东说:“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①毛泽东用12个大字“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概括了徐特立的革命精神和道德情操,并从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密切联系群众,模范遵守纪律,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拣难事做,从不躲避责任等方面,对徐特立的可贵品质作了高度评价。最后,毛泽东衷心地祝愿徐老健康长寿,成为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

^①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18页。

毛泽东的上述三篇著名文章发表后,在党内引起了强烈反响,一股学先进、赶先进、争当先进的热潮在革命队伍中蓬勃兴起,一大批模范人物脱颖而出。白求恩、张思德、徐特立,这些响亮的名字,在人们中间传扬;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人们心头播撒,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和先进青年前赴后继,献身于人民。

(二) 完全彻底为人民

毛泽东不仅善于从火热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发现典型,发展为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行为准则,并从无产阶级人生观的高度,对它的丰富内涵作了深刻的阐发,科学地回答了人生目的、人生态度、人生价值、人生责任等诸方面的问题。

第一,崇高的人生目的。人生目的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的问题,是每一个人都不能回避的问题。毛泽东把无产阶级的人生目的精辟地概括为“为人民服务”。这就通俗易懂地表达了无产阶级人生观的精神实质。简单几个字,包蕴着深刻的内涵:首先,它为我们解决了一个根本的政治方向和立脚点问题:我们为谁而工作?“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①是为占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的广大人民服务,还是替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一小撮反动派卖命?是为满足个人的私欲而活着,还是完全彻底为人民利益而工作?那种笼统地抽象地提出要为一切人服务的观点,无疑是不适当的。毛泽东说的好:“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②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04页。

其次,为人民服务,树立生动、形象、有血有肉的学习典范,更注重从理论的高度对这些典型人物的人格品质进行概括、总结和提炼,从而使他独具特色的伦理思想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完善。纵观毛泽东延安时期一系列文章中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命题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是将为为人民服务作为我党我军的根本宗旨、共产党人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的具体行动。在共产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以最广大人民的最高利益为工作出发点和归宿,这就把共产主义理想同实现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行动纲领的实践统一起来,从而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更加符合人民的利益。最后,为人民服务,强调了共产党人以全心全意为为人民服务作为唯一宗旨,而不图一党一己的私利。

关于怎样具体把握为人民服务这一人生目的,毛泽东还有许多论述,他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①“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②“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③“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④这样,毛泽东就从军队、党员、干部等各个不同角度提出了大家都应该把全心全意为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人生目的和行为宗旨。毛泽东自己也正是这样,把自己当作革命队伍中的普通一员,不以领袖自居。1937年秋,延安野战医院的一位重伤员,因伤势过重,危在旦夕。垂危之际,他想见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0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3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95页。

④ 《一九四五年的任务》,《解放日报》1944年12月16日。

一见毛主席。医护人员深知毛主席工作忙，便试着给毛主席打了电话。毛泽东立即骑马赶了三四十里路，来到伤员的身边，握着他的手深情地说，“你是党的好战士，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你。”这位伤员感激地流下了眼泪，幸福地合上了双眼。毛泽东还亲自参加了这位烈士的追悼会和安葬工作。又看望了住院的每一个伤病员。在延安，从战士到总司令，从一般干部到党的领袖，一律住窑洞，吃小米饭，穿土布衣裳。共产党人以其特有的勤勉，献身精神谱写着一曲曲爱的篇章。延安，这座陕北黄土高原上的小城，之所以能吸引那么多青年和爱国志士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封锁线，不远千里来此，就是因为他们从延安看到了旧中国其它地方看不到的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一片忠心，从延安的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就连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斯蒂尔也说，在延安访问中最使我感动的“是我体味到共产党常常说的‘为人民服务’，在延安所亲见的各种具体事实，我认为这是货真价实的。”“真的，我要在延安住上十天，那我一定也将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者！”

把为人民服务作为人生目的，并不是毛泽东的主观臆造，更不是纯粹的道德说教，它的提出，具有客观的必然性。其一，它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从事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人民群众的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社会财富、推动社会变革的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主人。在一切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里，统治阶级与人民群众是根本对立的，他们不承认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人地位，所以也就不可能把“为人民服务”作为人生目的，这就注定了他们必然走向灭亡的命运。毛泽东充分认识到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由此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无产阶级的人生目的，这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其二，它建立在对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正确认识的基础之上。无产

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人类历史上最革命、最进步的阶级。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决定了它只能把彻底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剥削,消灭阶级,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作为自己的崇高历史使命。这种为全人类解放而斗争的思想,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质体现。毛泽东正是基于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人生目的。其三,它是对共产党人和革命战士人生实践的科学总结。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党。它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把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为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而斗争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正是在这面旗帜下,我们无数的共产党人和革命战士,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为人民利益而献出自己的一切。白求恩、张思德、徐特立就是他们中间的典型代表。他们的人生实践为毛泽东“为人民服务”人生目的的形成,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实践依据。其四,它是对历史上形形色色人生观的一个根本变革,是对马克思主义人生观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并作出了要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斗争的论断。列宁也提出过“锻炼严整的革命人生观”^①的任务。但他们都没能对革命人生观的内涵进行明确而系统的概括。毛泽东以马克思列宁的上述思想为依据,并从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出发,把无产阶级人生目的用简洁明了、蕴意深刻的“为人民服务”几个字表述出来,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理论。

第二,进取的人生态度。人生态度是实现人生目的由理论到实践的转化环节,是指导人生活活动的一种心理定向和行为表现。一般情况下,有什么样的人生目的,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态度。毛泽东

^① 《列宁全集》第六卷,第463页。

将“为人民服务”确立为无产阶级的人生目的，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对待人生要采取乐观、进取的态度，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不为金钱、名利所诱惑，不为挫折、逆境所动摇，勇于开拓，勇往直前。毛泽东对生态度的论述，除了见于上述三篇文章之中外，也散见于他的其它一些文章中。在这些文章里，他对生与死、顺境与逆境、苦与乐、荣与辱等一系列问题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回答与阐述。

在对待生与死的问题上，毛泽东首先从辩证法的高度指出，人总是要死的。接着，他提出了一个为谁而死和怎样看待死的问题。他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①“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②他指出：“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因此，他们“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③“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④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要尽量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的思想，号召大家不仅要敢于斗争，而且要善于斗争，要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

在对待顺境与逆境的问题上，毛泽东历来抱革命的乐观主义态度。他强调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困难和挫折。他说：“我们的同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0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0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96—1097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98页。

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①“谁要是只看见光明的一面,不看见困难的一面,谁就会不能很好地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②“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③

在对待苦与乐的问题上,毛泽东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以人民之苦为苦,以人民之乐为乐。一九三六年九月,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继续发动内战的严重局势,他的忧虑之情溢于言表:“全国人民水深火热又如故。瞻念前途,殷忧何极!”^④毛泽东还提倡以为人民吃苦为乐。他说:“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⑤一切革命同志要“吃苦在别人前头,享受在别人后头,”^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在对待荣与辱的问题上,毛泽东把有益于人民利益的行为视为荣,把有损于人民利益的行为视为辱。他说:“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⑦他还提出了革命者应如何保持荣誉的问题。他指出:最根本的是要“始终为革命奋斗,无论如何不变其革命节操。”^⑧要“几十年如一日”,“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0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9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101页。

④ 《毛泽东书信》第73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61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62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22页。

⑧ 《吴玉章同志六十寿辰祝词》,见《新中华报》1940年1月24日。

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①

第三，奉献的人生价值观。人生价值，从个人同社会的关系上看，包括两个方面，即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它是一个社会的、历史的范畴。不同的社会、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人生价值观。即便是同一社会、同一阶级的人们，由于对人生目的与意义的认识和实践表现不同，他们的价值观也有差异。毛泽东的人生价值观，是以为人民服务的人生目的为基础和主导的，所以，他在坚持二者的统一，不忽视社会对个人尊重和满足的同时，重点强调个人对人民、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

毛泽东从两个方面对人生价值问题表述了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通过将张思德、白求恩、徐特立等树立为人格楷模，赞扬只有象他们那样的人生才最有价值，从而表明他所提倡、推崇的是无私奉献的人生价值观。另一方面，他又明确指出了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他强调要以集体主义为人生价值观的核心，以奉献为人生价值标准，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小集团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在这里，集体利益指的是革命利益、人民利益和民族的利益。他说：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②他要求共产党员的一切言行都要以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最高标准”，“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③此外，他还提出了要尊重个性发展的问题。他说：“有些人怀疑中国共产党人不赞成发展个性，……其实是不对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

① 《吴玉章同志六十寿辰祝词》，见《新中华报》1940年1月24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6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58页。

性发展,……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些束缚……,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①他号召要为“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②而奋斗。

第四,向人民负责的人生责任感。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在一定的社会中生活,都要对他人、集体和社会承担一定的责任。责任范畴是同人的规定、职责、使命和任务紧密相联的。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人生目的体现在人生责任上,就是他提出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思想,并以此为基点,具体论述了如何制定政策,如何为群众谋利益,什么才是对待工作、技术、批评的正确态度等问题。

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生目的的具体体现。毛泽东说,“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③“群众的意见与经验一定要作为我们政策的基础。因为人民能教给我们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的任务就是听从他们,学习并了解他们的经验,愿望、批评,确定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的总和,再作为政策交还给他们。”^④这就是说,要为人民服务,就必须对人民负责。而对人民负责,首先要求我们在考虑问题、制定政策时,必须实事求是,从群众的实际出发,反映群众的利益,适合群众的需要。对于这一点,毛泽东非常重视,他亲自为中央党校题写校训:“实事求是,不尚空谈。”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党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为人民做了大量好事,从而赢得了民心。1947年胡宗南进犯延安时,几名普通劳动群众把刻在中央党校礼堂山墙上毛泽东写的“实事求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5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5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96页。

④ 毛泽东:《与斯坦因的谈话》

是”的山石取下来,埋起来,保护好,充分说明了老百姓对我党对人民负责的实事求是态度的无比拥护。

其次,对人民负责要求我们切实为群众谋利益,使人民群众因我们的服务而获得益处。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特别强调为群众谋利益,他说:“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①在延安,毛泽东把这个问题概括为一个著名原则,那就是“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②毛泽东还不止一次地告诫大家,要以90%的精力去给人民以东西,然后才以10%的精力去从人民取得东西。只有在给人民以东西上“用了苦工”,^③切切实实地解决了群众的问题,人民才会懂得我们的要东西是正当的,才懂得如果不这样做,他们的生活就不会更好。从1942年起,延安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使人民群众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1945年春节,枣园乡干部和群众代表,拿着写有“为民谋利”四个大字的锦旗,带着年糕、米酒、油馍馍,去给党中央祝贺新年。显示了广大劳动群众对我党为人民谋利的感激之情。

再次,对人民负责要求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力求不犯或少犯错误。毛泽东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6—137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第56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11页。

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①“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②“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③毛泽东自己也正是这样做的。1945年,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对整风审干中的扩大化问题公开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我们各个地区在肃反运动中都走过弯路,我也走过弯路,这次整风审干,使一些同志受了委屈。说到这句话时,他举起右手,沉痛地说,我向你们道歉!

最后,对人民负责要求我们把为人民服务的口号落实在本职岗位上和具体行动中,否则,为人民服务就成了一句空话。毛泽东把为人民服务的具体要求表述为:对工作的极端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满腔热忱,对技术的精益求精。他以赞扬白求恩对技术的精益求精,要求大家做好本职工作。他说:“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这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④毛泽东在高度评价白求恩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同时,批评了那些对工作不负责任的人。他说:“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0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9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97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60页。

共产党员。”^①毛泽东还号召大家立足本职，虚心好学，不断进取。他赞誉徐特立是“你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批评了有些人“本来只有‘半桶水’，却偏要‘淌得很’”。^②他指出，只有学习，才能正确地前进；只有学习，才能使我们的本职工作做得更好。此外，毛泽东一再强调，为人民服务贵在坚持。他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呵。”^③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命题及其所含的丰富内容，实质上是对无产阶级人生观问题的全面概括。它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的极大丰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处于改革开放条件下的一切共产党员和党的各级干部如何走好自己的人生道路，真正做到完全彻底为人民，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因而它又具有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

（三）巨大的威力

毛泽东关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生观的阐述，不仅说明了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为什么应当追求这样一种人生观以及这种人生观的深刻含义和价值，而且为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中切实地培育起这种人生观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这就是：树立榜样，典型示范。

树立榜样，典型示范，对于培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有着巨大的威力。这—是因为宣传榜样，赞颂典型，可以把抽象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60页。

② 《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118页。

③ 《在祝贺吴玉章六十寿辰大会上的祝词》，转引自《新中华报》1940年11月24日。

说教变成具体的形象示范,把崇高的精神境界范畴的东西变成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样板,从而激起人们思想情感的共鸣,引导人们对照、学习和仿效,达到“点燃一盏灯,照亮一大片”的效果。二是因为树立的榜样或典型,既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既能代表一般、具有共性,又比一般突出、具有个性。象白求恩、张思德、徐特立,他们都不是“圣人”、“完人”,而是革命队伍中的普通一兵,他们的所做所为,代表着一般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行为价值取向,是每一个人经过一番努力都能做到的。而他们所以能脱颖而出,被树为典型,是由于他们又具有超出一般的个性,他们把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与个人的事业追求、生活目标融为一体,达到了思想上、道德上、行动上的升华。这样的榜样使人们觉得不是“空中楼阁”,可望而不可及,而是可信,可学,从而自觉做到与之看齐,“见贤思齐”。当然,毛泽东为我们树立的榜样,远远不止他们三人,而是以他们为代表的—个榜样群。譬如,他曾赞扬刘胡兰“生得伟大,死得光荣。”他还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①他要求大家要像吴玉章那样,“几十年如一日”,为人民做好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又发出了向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同志学习的号召。正是在这些榜样的鼓舞下,人们逐步接受共产主义理想的教育,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养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

毛泽东认为,树立榜样,典型示范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每个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都要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教育和激励群众,也就是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共产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77页。

党员要在各个方面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始终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以召唤亿万群众同我们党战斗在一起，形成无坚不摧的巨大力量。

毛泽东在要求共产党员都这样做的时候，自己率先作出了榜样。他之所以能领导一支小米加步枪的队伍由弱到强，逐步发展壮大，最后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不仅在于他能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找到了一条正确的、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形成了一套丰富的理论；不仅在于他具有远见卓识，深邃的洞察力，很强的组织力和号召力，还在于他具有巨大的人格力量。他一家就有六位亲人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最钟爱的大儿子毛岸英就是他亲自派赴朝鲜战场而光荣牺牲的。他一贯严格要求自己，从不以领袖自居，从不搞特殊化，从不谋个人私利。无论是在井冈山打游击，还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他总是和战士群众同甘苦、共患难，身先士卒，以身示范，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他所倡导的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如1942年，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期，毛泽东亲自带领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带头参加大生产运动。毛泽东在自己住的窑洞前，开了一块地种上蔬菜，亲自栽种、浇水、施肥，周恩来虽然手臂有伤，但仍然艰苦、细致地学习纺线，他纺出的线又细又长，被大家誉为“纺线英雄”。又如1945年8月，当玩弄和平阴谋的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时，毛泽东为了表明共产党对和平的诚意，教育和争取群众，置个人生死于度外，毅然飞往重庆，受到了重庆各界和全国人民的赞誉和拥护。1947年春，当挑起内战的蒋介石纠集23万兵马，向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发起重点进攻的时候，毛泽东决定暂时放弃延安。就在延安的机关、学校、工厂、医院及市民、老乡开始有组织地撤退、疏散时，毛泽

东却不顾个人安危，坚持要等老百姓全部撤离之后再走。敌人的炮弹落在了他住的院子里，可他却对前来催他起程的警卫战士和周副主席说：“延安的老百姓还没有走完，老百姓走完了我再走！”朱德是深受人民爱戴的总司令，他非常关心人民群众疾苦。一次，他从外面工作回来，途中看到一个老乡背着粮食吃力地走着，朱德从马上跳下来说，“老乡，你这么大年纪还背东西，来，放在我的马上。”不等老乡回答，就帮助把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跟着行。后来这位老乡知道他就是朱德总司令时，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伟大人格，感召着每一位战士和群众，在革命队伍中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凝聚力，在整个中华民族中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向心力。这股强大的力量，使得我们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和挫折，从胜利走向胜利。

毛泽东所倡导的树立榜样，典型示范的方法，在延安时期得到了普遍运用，并产生了巨大的威力。当时，在革命军队和解放区中，掀起了前方战士争当杀敌英雄，后方群众争当支前勇士，大生产运动中人人争当劳动模范的热潮，各种类型的先进人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例如，在大生产运动中，王震领导的三五九旅，以开垦南泥湾而闻名，他们把昔日杂草丛生、荒芜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稻谷飘香、遍地牛羊的“陕北江南”，不仅实现了吃用全部自给，而且每年向政府交公粮一万石，成为全军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1942年，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亲自推广了这个典型，高度赞扬了三五九旅的生产自给工作，并为22位劳动英雄题词。给王震的题词是“有创造精神”，给晏福生的题词是“坚决执行屯田政策。”在他们的带动下，边区农民也踊跃投入了争取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农民们组织了变工队、扎工队、互助组、合作社等劳动互助组织，开展劳动竞赛，涌现了许多劳动模范。为了推广这些劳动模范的先进事

迹,边区政府于1943年11月至1945年元月间先后召开了两届“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大会”,表彰了数百名劳动模范。毛泽东两次都出席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在文艺战线,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思想的指引下,在延安革命风气的推动下,遵照毛泽东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中去,长期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的号召,纷纷深入部队、农村和工厂,创作了一大批反映火热斗争的作品。在抗战前线,涌现了象“狼牙山五壮士”这样的英雄集体。为了弘扬五壮士的牺牲精神,晋察冀军区在狼牙山主峰竖立了“五烈士纪念塔,”并向全区部队发布了向五壮士学习的训令。五壮士的英勇壮举,表现了中华民族与侵略者血战到底、宁死不屈的崇高品质,激励着抗日前线的全体将士。在自卫战争开始后,山东和华中等地又开展了广泛的群众性立功运动,号召“每人立一件功”,以鼓励广大指战员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为人民作贡献。在立功运动的影响下,后方群众焕发出了极大的支前热情,人人奋勇争先,勇当支前模范。仅1947年3月到1948年2月,陕甘宁边区就发动支前担架队民夫近20万人次,运输队民夫120多万人次,还为军队磨面、炒干粮、做军鞋65万多人次,参加修筑和破坏工事2.2万多人次,为部队带路1.1万多人次,押送俘虏1万多人次,共折合民工800余万个,畜工440余万头。这就为加速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战士、群众表现出来的高涨的革命热情,你追我赶争当英雄、模范的精神,为革命胜利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气概,都充分地证明,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典型示范有巨大的威力。

毛泽东的树立榜样、典型示范方法,在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新时期,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是因为,榜样的力量,完善的人

格,作为一种高尚的精神需求,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物质生活的充裕,必将愈益成为人们的普遍追求目标。这里,既需要我们树立起新时期的新典型,又需要以我们自身人格的力量去教育人。邓小平指出:“政治干部更要强调以身作则,我们过去在战争年代就是这样。那时,你打仗不勇敢,怕死,你不同战士心连心,不联系实际,不联系群众做政治工作就没有人听。政治干部不能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成为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化身。他们的感人事迹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发生了多么巨大和深远的影响!不仅影响到我们这一代,而且影响到子孙后代。”^① 这话说的是何等的好啊!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119—120页。

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扩大共产主义宣传

早在大革命时期和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十分重视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研究。提出要对人们开展民主思想教育,革命理想教育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来到延安以后,在内忧外患、极端艰苦的情况下,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艰苦奋斗教育,从而使毛泽东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论述更加系统化,并培育了一代延安新风,创造了闻名中外的延安精神。

(一) 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在延安,我党领导了伟大的抗日战争。毛泽东看到,爱国主义精神,是全民族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精神支柱,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能够形成全民族的凝聚力,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这是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根本性条件。因此,毛泽东强调,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是进行思想教育的首要任务。

1. 什么是“我们的爱国主义”

毛泽东在当时撰写的文章、发表的谈话等言论中,回答了什么是爱国主义的问题。

首先,爱国主义是人们对祖国的深厚感情。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以深情的笔调,历述中华民族辽阔的大

好河山,悠久的文明历史,灿烂的古代文化: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
大国家之一,……在这个广大的领土之上,有广大的肥田沃地,给
我们以衣食之源;有纵横全国的大小山脉,给我们生长了广大的森
林,贮藏了丰富的矿产;有很多的江河湖泽,给我们以舟楫和灌溉
之利;有很长的海岸线,给我们以交通海外各民族的便利。从很早
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
土地之上。“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
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
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
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① 这些文字,
字里行间都充溢着作者对自己祖国的深深依恋之情,眷眷挚爱之
意,毛泽东是在启发人们对祖国生死相依、血脉相连的民族情感,
告诉人们爱国主义首先是这样一种感情。

其次,爱国主义是崇高的民族精神。毛泽东指出,中华民族就
是富于民族精神的民族。“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
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
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
成平等和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
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②

最后,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是爱国主义的集中表现。毛泽
东指出,中华民族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中华民
族是不可侮辱的,我们要保护自己民族的尊严。面对日寇入侵,“我
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同时毛泽东还看
到,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仅要有民族自尊心,还要树立民族自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21页、第622页、第62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23页。

信心,要自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自信“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自信能够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抗战前夕,毛泽东在和斯诺的谈话中就指出,我们几万万的人民,一旦获得真正的解放,把他们巨大的潜在生产力用在各方面创造性的活动上,能够帮助改变全世界经济和提高全世界文化的水准。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又指出,“中国人民不但在抗日战争中起了极大的作用,而且在保障战后世界和平上将起极大的作用,在保障东方和平上则将起决定的作用。”^①

毛泽东还阐述了无产阶级爱国主义的特点,从而在更深一层意义上说明了什么是“我们的爱国主义”。

首先,无产阶级爱国主义是以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人地位作为思想基础的。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崇高的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是民族意识、民族觉悟的集中表现。以往的爱国主义认为,只有少数英雄人物才具有这种高尚的民族觉悟,他们勇赴困难,慷慨悲歌。人民群众则麻木无知,民族觉悟低,是被拯救的对象,是工具。而毛泽东则一直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国难当头的时候,人民群众是拯救民族危亡的主体,是依靠对象。毛泽东认为,人民中蕴藏着深远的伟力,这种伟力足以将一切民族的压迫者和阶级的压迫者摧毁。然而,这种伟力需要挖掘,人民群众的极大积极性需要调动,通过广泛、深入的爱国主义教育,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是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只有激发了全民族的爱国主义热情,巨大的精神力量才能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无论是民族的敌人还是阶级的敌人,都将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坚信:“只要我们依靠人民,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33页。

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能被我们所压倒。”^①

其次,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是以共产主义为终极目标的。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以深沉的感情写道:“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赴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②毛泽东指出,在现阶段,一切爱国主义者都以推翻三座大山为目的,而要彻底推翻这三座大山,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中国革命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③一切爱国理想,只有在这个“终极的前途”上才能得到完全的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但是中国革命的必然结局,而且是人民解放的根本出路,祖国独立、富强的根本途径。由此,毛泽东指出,很多人正是认清了这一社会发展规律,从爱国主义者成长为共产主义者的。“五四”以来的爱国者,大多数走上了这条发展道路。毛泽东青少年时期,身无分文,心怀天下,16岁时,他曾给自己起过一个“子任”的名字,意思是以救国救民为自己的崇高责任。他还参加了辛亥革命后的新军,领导了湖南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周恩来中学时代就立下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宏愿。朱德曾放弃滇军、川军的高位和优裕的生活条件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徐特立面对戊戌变法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9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9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50页。

挫折,《辛丑条约》的签订,愤然断指,血书“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些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者,在救国道路的摸索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成为共产主义战士。还有很多杰出的爱国者,历经磨难,最终都走到共产主义旗帜下。爱国将领续范亭、吉鸿昌,人民音乐家冼星海,是在抗日战争的烈火硝烟中,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宋庆龄在长时期里是中国共产党最亲密的朋友,她在生命的弥留之际,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所以,毛泽东强调,一个彻底的爱国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和共产主义前途结合起来的爱国主义,再也不是以往的爱国志士抱恨终生的历史悲剧,而是遵循历史发展规律的、必胜的人民大革命。

最后,无产阶级爱国主义是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毛泽东认为,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相统一,这是无产阶级爱国主义的显著特征。他在当时的有关论述中,谈到过什么是国际主义。他说,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民族联合起来,互相支持,互相援助,打倒帝国主义,“解放世界的民族和人民”,“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同时,他还说明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辩证关系,他指出,我们是爱国主义者,决不容忍中国的民族尊严和民族利益受到任何侵犯,同时我们又是国际主义者,深深懂得中华民族利益的充分实现离不开全人类的总体利益。对于这个辩证统一关系,他归纳说,一方面,国际主义是爱国主义的进一步推广。他以抗日战争为例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代表了全人类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共同利益,必然赢得全世界人民的支持。全世界人民都站在中国抗战方面,各国共产党组织罢工、示威、捐助活动,援助中国抗日。著名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印度的

柯棣华大夫、爱德华大夫，带领医疗队奔赴中国解放区工作。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活动在中国东北长白山地区和松花江流域。苏联志愿航空队曾来华对日作战。这些都表现了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另一方面，爱国主义则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因为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人民。所以我们“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①毛泽东一贯坚持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的原则。1950年，中央领导讨论是否出兵抗美援朝。面对一些疑虑，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彭德怀同志把毛泽东这些话“反复念了几十遍”，体会到这是“一个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指示，”^②因此挂帅出征，既支援了朝鲜人民，也保卫了中国。

2. 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人的积极性

如何使“我们的爱国主义”深入人心？毛泽东认为，只有通过在全国各阶层人民中广泛深入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首先，毛泽东强调，必须在党员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共产党员首先应当是坚决彻底的爱国者。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毛泽东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要走在爱国斗争的第一线，负起更大的救国责任。抗日战争一开始，毛泽东就庄严地宣告：“中华民族的兴亡，是一切抗日党派的责任，是全国人民的责任，但在我们共产党员看来，我们的责任是更大的。”^③共产党人如何负起民族解放斗争的责任呢？毛泽东指出主要是两点：一是共产党员要高举民族解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20—521页。

② 《彭德怀自述》，第25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59页。

放、爱国主义的大旗，号召和组织人民群众进行斗争。他说，“在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国家，无产阶级政党要把民族旗帜拿在自己手里，必须有民族团结的纲领，团结除帝国主义走狗以外的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让全国人民看到，共产党多么爱国，多么爱好和平，多么要民族团结，这样做，有利于孤立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孤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①为此，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细致地、具体地分析各个阶级的状况，把反帝爱国斗争放在第一位，制定新的斗争纲领和斗争策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承担起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领导责任，带领全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二是共产党员要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毛泽东向我们的党员讲明：我们的战争，是在困难环境之中进行的。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觉悟，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不足，大多数民众的组织，军力的不坚强，经济的落后，政治的不民主，腐败现象和悲观情绪的存在，统一战线内部的不团结、不巩固等，形成了这种困难环境。因此，共产党员不能不自觉地担负起团结全国人民克服各种不良现象的重大的责任。”^②毛泽东具体要求共产党员：“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求私欲、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共产党员应该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还应成为学习的模范”^③等等。在毛泽东的教导下，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中正是表现了最勇敢的作战行动，最大的牺牲精神。共产党员杨靖宇率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驰骋在南满大地，英勇地抗击着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1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21页—52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22页—523页。

几倍、几十倍日伪军。当他作战牺牲后,日本侵略者难以理解这位抗日将领拖着他们在冰天雪地中周旋转战了几年的钢铁意志,他们解剖了他的尸体,在他的胃里发现,除了尚未消化的树皮、草根、棉絮外,竟然没有一粒粮食!“狼牙山五壮士”为了掩护部队和群众安全转移,同 3500 多日军进行殊死斗争,他们将敌人引到了悬崖绝路,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最后宁死不屈,怀着对祖国的深情眷恋,纵身跳下悬崖。方志敏烈士在狱中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怀着对祖国的无限深情,写下了《可爱的中国》,坚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抗战八年,中国共产党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仅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就同敌人作战 125665 次,消灭日军 527422 人,消灭伪军 1186995 人,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做出了巨大贡献。

其次,毛泽东认为,还要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广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培养硬骨头的民族精神和自尊自强的民族意识。毛泽东看到,抗日战争对于中国人民是一场严峻考验。决定的因素不是武器的优劣,而是全国民众的决心,勇气和信心,是同仇敌忾、决战决胜的民族精神。所以,在人民群众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强化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就成为至关重要的了。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都始终关注民族的精神状态问题。他一再强调,中国人民是有志气的!中国人民要有骨气。他特别赞赏鲁迅的硬骨头精神,他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①为什么说鲁迅的硬骨头精神是最可宝贵的性格呢?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极端地轻视、鄙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千方百计地摧毁其民族精神,压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 698 页。

抑其民族意识。而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就有那么一些人自觉不如洋人,特别怕帝国主义的恐吓,在外国人面前总是直不起腰来,毛泽东称之为有“贾桂思想的人”。所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中出现鲁迅这样的硬骨头,就特别可贵,特别值得提倡。毛泽东说,帝国主义者就会吓人的那一套,而殖民地有许多人也就是怕吓,帝国主义者以为所有殖民地的人都怕吓,但是不知道中国有这么一些人是不怕那一套的,非但不怕,还敢于起来和他们作坚决的斗争,直到把他们彻底打倒。毛泽东号召全中国人民要彻底破除“贾桂”思想,摆脱百多年来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带给人民的精神枷索,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毛泽东的上述思想代表了中国人民不屈的民族意志,激发了多少人不当亡国奴,和共产党同心同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精神。在敌后游击区,普通老百姓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武装起来,组成抗日游击队,以少胜多打击敌人,多少好儿女为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在敌占区,又有多少有骨气的中国人保持着民族气节,宁愿站着死,不肯跪着生,有的人奔赴了延安,以实现自己的救国理想。如人民音乐家冼星海,1935年从巴黎学有成回到上海。在他指挥由外国人组成的乐队的演奏时,受到外国人的蔑视。冼星海威严地抗议说,“我和我的国家决不能容忍这种卑劣的侮辱!”不久,他就奔赴延安,“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还有著名的文学家朱自清教授,当贫病交加身体极度虚弱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签了自己的名字。临终前,他还告诫家人,“我是在抗拒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我们家以后决不要买美国配给的面粉。”他以自己崇高的人格维护祖国的国格,“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毛泽东语)

最后,毛泽东指出,要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推动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形成。在抗日战争的严重关头，以毛泽东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了“为着保卫祖国而战”的响亮口号。为着全民族的解放大业，共产党主动提出“改变国内两个政权敌对的状态，团结一致，共同赴敌。”^①毛泽东在“七·七”事变前夕写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说道：“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及其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②因此，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多次真诚呼吁建立全民族的统一战线。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受到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采取军事行动扣留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救国主张。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挑起内战，南京政府中以汪精卫、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进攻西安，借机扩大事态，夺取蒋介石的权力，进一步对日妥协。中国共产党正确分析了形势，从民族利益出发，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到西安谈判，促蒋抗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亲日派的扩大内战阴谋，实现了国共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建立后，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统一战线内一次次掀起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以大局为重，坚持又统一、又斗争，通过统一战线动员、团结了全国各阶层的抗日力量直到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内战以后，以毛泽东为领导的共产党继续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向全国人民提出是要光明的新中国还是要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258页。

^② 同上，第253页。

黑暗的旧中国的问题。毛泽东还尖锐指出,抗战胜利以后,“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代替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的地位,采取了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内战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①“蒋介石为着维持独裁,进行内战,不惜出卖国家权利于外国帝国主义,勾结美国军队留驻青岛等地,从美国招致顾问人员,参加内战的指挥和军队的训练,残杀自己的同胞。内战的飞机、坦克、枪炮、弹药大批从美国运来。内战的经费,大批从美国借来。蒋介石则以出卖军事基地、出卖空海航权、签订奴役性商约等项比袁世凯卖国行为还要严重多倍的条件,作为酬谢美国帝国主义的礼物。”^②毛泽东号召:“被蒋介石政府各项反动政策所压迫、处于团结自救地位的中国各阶层人民,包括了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主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建立“一个极其广泛的全民族的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这一爱国主义的伟大号召最终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并取得了伟大胜利。

(二) 把共产主义的宣传与当

前纲领的实践统一起来

延安时期,是我党从历次挫折走向步步胜利的转折时期。面对着人民武装力量的迅速壮大和新中国朝阳的曙光,为了把中国革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推进,毛泽东指出,要扩大共产主义的宣传。同时毛泽东强调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不能脱离当前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2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37页。

的斗争实际。特别是他明确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主题,使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当前纲领的实践更加紧密地联系了起来。

1. “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宣传”

毛泽东在延安撰写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重要著作中,一再强调这样一个观点:在共产党所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的任何一个阶段上,包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都要开展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这是“确定的”,“毫无疑义的”,天经地义的。“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① 归纳毛泽东这方面的大量论述,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说明了什么是共产主义,为什么要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和如何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这样一些基本问题。

首先,什么是共产主义呢?毛泽东在驳斥资产阶级顽固派关于收起共产主义的“狂妄叫嚣”时阐述道:“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接着他分析说,作为“社会制度的主张,共产党是有现在的纲领和将来的纲领,或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两部分的。在现在,新民主主义,在将来,社会主义,这是有机构成的两部分,而为整个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所指导的。”^② 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弄清:其一,共产主义是一种美好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是划分为若干发展阶段的运动过程;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其二,在向共产主义美好制度前进的各个发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0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86页。

展阶段上要有不同的实践纲领,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则要在各个发展阶段上起指导作用。

其次,在现阶段为什么要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呢?毛泽东认为:

第一,实现共产主义是我党的政治主张。“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① 既然目标确定了,而第一阶段是第二阶段的必要准备,第二阶段是第一阶段的必然趋势,那么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武装全党的头脑,教育人民群众,就是“异常清楚”“毫不含糊的”了。毛泽东曾多次回顾获得共产主义这一美好理想的艰苦历程,他说,“自从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当时,“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②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先后不同程度地信仰过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他们才把眼光转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从此中国革命有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所以,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就成为共产党的一项重要历史任务。

第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5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69页—1470页。

一部分。毛泽东指出,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就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①显然,这种革命已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那么,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就有了客观基础。

第三,只有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才能保证共产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共产主义思想是共产党的思想武装,是共产党区别于国民党及其他党派的思想特征。毛泽东指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带头领导并坚决执行有利于统一抗战的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共产党放弃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相反,针对国民党右派势力限共、融共、反共的阴谋,共产党必须针锋相对,坚持和加强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才能保持共产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地位,才能激发全体人民和各派政治势力为着民族的发展进步、光明前途而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最后,如何进行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呢?毛泽东认为:

第一,要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党员,要求党员以共产主义精神开展工作。毛泽东指出,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首先必须在共产党员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67、668页。

中展开。共产党员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先锋模范作用发挥,离不开广大的无私的共产主义觉悟,离不开具有远见卓识的彻底革命精神。为此,毛泽东一再要求共产党员要具有共产主义精神。他亲自向全党推荐白求恩这个先进典型,赞扬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就是共产主义的精神,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除了一般要求外,毛泽东还意识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在我党鼓励资本主义经济成份发展的过程中,共产党员必须经得住资本主义私有观念等思想腐蚀的考验。他说,“严肃的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和保护社会经济中的有益的资本主义成份,并使其有一个适当的发展,是我们在抗日和建设民主共和国时期不可缺一的任务。在这个时期内一部分共产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化,在党员中发生资本主义的思想,是可能的,我们必须和这种党内的腐化思想作斗争。”^①

第二,要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广大群众,使全体人民看到共产主义的远大前途。毛泽东认为,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是完全必要的。这种教育可以使普通劳动群众具有政治头脑,在政治上抬头看到民族发展的美好前景。他说:“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②这说明,只有“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才能看到“远大的前途”。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还可以在全体劳动人民中间形成良好的精神风貌。陕甘宁边区是我党用共产主义思想润泽着的土地,毛泽东自豪地说,“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9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04、686页。

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①

第三，要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坚持共产党的独立自主的原则，保持共产党思想上的独立性。毛泽东尖锐地指出，“在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并和无产阶级一道向共同敌人进行斗争的时候，它仍然是很反动的”，^②“大资产阶级在思想上企图‘融解’共产主义，在政治上、组织上企图取消共产党”，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要学会在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又同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严肃的‘和平’斗争”^③这就是要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决不丧失原则，决不做资产阶级的尾巴，“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④毛泽东在当时的大量论述中，反反复复向全党告诫这个问题，并亲自批驳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思想的种种攻击。当资产阶级顽固派叫嚷，既然共产党同意三民主义，就应收起共产主义，声称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时，毛泽东针锋相对地批驳道，“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共产主义不能收起，“一收起，中国就会亡国。现在的世界，依靠共产主义做救星；现在的中国也正是这样。”^⑤毛泽东还通过大量分析指出，现在的中国不是共产主义不适合国情，而恰恰是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当有些恶意的宣传家提倡所谓：“一次革命论”用以证明什么革命都包举在三民主义里面，共产主义没有存在的理由时，毛泽东严肃地指出，“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主义比较起来，有相同的部分，也有不同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1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0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13、608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59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86页。

部分”。“相同部分。这就是两个主义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上的基本政纲。……不同部分。则有：（一）民主革命阶段上一部分纲领的不相同。……（二）有无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不同。……（三）宇宙观的不同。……（四）革命彻底性的不同。”^①这样就使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划清的原则界限。毛泽东的有力驳斥，既教育了全党，也扩大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并有效地坚持了共产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

毛泽东不仅写文章抨击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攻击，而且领导全党和资产阶级顽固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当国民党反对八路军设总指挥部，要求八路军从师到连均由国民党配备副职，还荒唐地提出要“毛先生，朱先生出洋”时，我党坚决予以拒绝。当国民党提出要组织一个所谓联合的同盟时，周恩来回答说：“组织一个联合的同盟是可以的，你们是一份，我们也是一份，各有独立的组织。我们进到国民党里面去，要保持我们共产党的独立组织。”^②当国民党准备安插人员到八路军总指挥部任“联络参谋”时，我党“不许其踏入营门一步”，从而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1939年底，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我党采取“必须反击，决不能轻易让步”的坚决态度，给国民党的武装反共活动以有力回击。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共领导人纷纷发表谈话，揭露顽固派勾结日伪、联合剿共的阴谋；各抗日根据地通过刊物、报纸、会议，对国民党提出严正抗议；坚持原则，拒不出席国民参政会；发布重建新四军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并将新四军扩编为七个师；周恩来在国统区会见、造访各党各派人士等，揭露国民党的反共行为。通过这些行动打退了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87—688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97—198页。

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1943年,国民党趁共产国际解散之际,又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这次他们采取政治军事双管齐下的办法。在政治上,由陶希圣代笔,以蒋介石名义发表了《中国之命运》,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些人也叫嚷“马列主义已经破产,”要求“解散共产党,交出边区”。在这种情况下,我党坚决予以反击。《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罪行。周恩来、艾思奇、范文澜等人写文章,对以《中国之命运》为代表的法西斯理论体系进行有力批判。特别是周恩来的《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一文,全面系统地分析批判了蒋介石的法西斯主义思想。在我党“七大”的开幕式上,毛泽东还特以《两个中国之命运》为题致开幕词,针锋相对地阐明了我党的立场、态度和观点。在我党的强大政治攻势下,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被制止。

2. “把共产主义大目标与当前的斗争任务联系起来”

把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与当前的斗争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延安13年,以毛泽东为领导的党中央领导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治国方略。在每一战略决策中,都渗透着共产主义大目标和当前的实践纲领相统一的精神,从而保证了每一阶段斗争任务的顺利完成。

首先,把共产主义目标和抗日战争的斗争任务相结合。抗日战争是民族解放战争。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情况下,我党果断地提出: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抗日战争的利益。毛泽东以其深刻的辩证法思想向人们说明“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一致性”。^①他指出,实现民族解放就是向阶级解放——实现共产主义迈进了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38页。

一步。而只有以先进思想动员人民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在这个过程中,我党必须以正确的实践纲领吸引人民,扩大影响,借以赢得全体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前进。在这个指导思想下,我党提出了抗战时期的一系列实践纲领:一是联合资产阶级共同抗日组成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早在“7·7”事变爆发以前,我党就一再致电南京政府要求停战议和,一致抗日,并积极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又在1937年2月10日发表《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7·7”事变后,我党又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一系列积极姿态,推动了联合资产阶级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二是实行抗战期间的土地政策,调动农民的抗日积极性。毛泽东说,“必须向党员和农民说明,目前不是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的时期,过去土地革命时期的一套办法不能适用于现在。现在的政策,一方面,应该规定地主实行减租减息,……但也不要求减的太多。”^①三是充分调动全国军队的抗战积极性。毛泽东指出,在尽量扩大八路军、新四军的同时,“对于国民党军队,……尽量地发展交朋友的工作。……在我军中共产党员在数量上垄断一切的情况,现在也应有所改变。……只要军队的领导权掌握在我党手里……便不怕吸收大量同情分子来参加军事部门和技术部门的建设。”^②四是充分重视和发挥知识分子的抗日积极性。毛泽东说,“应吸收一切较有抗日积极性的知识分子进我们办的学校……令其参加军队工作、政府工作和社会工作;应该放手地吸收、放手地任用和放手地提拔他们。”^③五是按照“三三制”的原则实行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毛泽东要求“共产党员在政权机关中只占三分之一,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6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6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68页。

吸收广大的非党员参加政权。”^①“三三制”原则在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1941年,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选出的18名政府委员中,有共产党员7人,超出了1/3的规定,共产党员徐特立即声明退出,递补一名党外人士。著名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感动地说,“共产党方面限制自己的候选人,……外头哪得有这种情形?”除上述内容外,毛泽东还提出我党抗日时期的政策是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这一政策在实践中也得到成功的实施。我党在和顽固势力进行坚决斗争的同时,还做了大量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的工作。我党团结了冯玉祥、张治中、于佑任、陈布雷等国民党上层人士。冯玉祥60大寿时,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董必武等从延安发去贺电;张治中任湖南省主席时,徐特立与之过往甚密,周恩来、叶剑英也经常与之接触;周恩来帮助陈希雷找到了他的爱女陈莲。我党还团结并争取了国民党军队中的中下级军官及广大士兵。例如对39团军总司令、11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的工作。1938年11月,高部抵达冀鲁边区时,肖华为他举行了欢迎会。1939年7月,高部被日军包围时,八路军及时派兵救援。从此高树勋更加坚定抗日信念,最终起义投奔共产党。

其次,把共产主义目标和解放战争的斗争任务相结合。抗战胜利后,国内的阶级矛盾又上升为主要矛盾。毛泽东于1947年10月在陕北葭县神泉堡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说道:“日本投降后,人民渴望和平,蒋介石则破坏人民一切争取和平的努力,而以空前的内战灾难压在人民的头上。这样,就逼得全国各阶层人民,除了团结起来打倒蒋介石以外,再无出路。”^②在这个全国人民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最后决战的阶段上,毛泽东清醒地看到,如果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6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235页。

没有正确的实践纲领,就不能打败蒋介石,就没有独立富强的新中国。

七、宣传鼓动工作要丰富形式，讲究艺术

毛泽东在延安谈到文艺作品的标准时说过，我们要求的“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解释道：“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②

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在他的宣传鼓动工作的理论和实践中，同样得到了深刻体现。延安时期，正是毛泽东使宣传鼓动工作的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形式、艺术达到高度统一的时期。活跃在这个时期历史舞台上的毛泽东，是高瞻远瞩、胸怀大略、意志坚定的革命政治领袖，又是平易近人、诙谐潇洒、学识广博、技艺高超的宣传鼓动巨匠。在他的言传与身教下，延安时期成为我党历史上宣传鼓动工作开展得最为鲜明有力、生动活泼、健康向上、扎实有效的时期之一。

（一） 宣传鼓动工作要丰富形式

毛泽东非常强调宣传鼓动工作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他认为，宣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69—97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68页。

传鼓动工作若徒有好的形式,而没有好的内容,那是毫无意义的;但若有了好的、革命的政治内容,而没有好的形式,则内容不能传递到民众之中,那也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在确定了革命的政治内容的前提下,要努力创造和开掘各种有效的宣传鼓动形式,以真正达到宣传民众、组织民众参加革命、夺取胜利的目的。

毛泽东认为,宣传鼓动工作要达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在形式上,就要不拘一格,力求丰富,以各种可能的渠道、手段来传播、输送党的方针政策、革命理论、进步思想、模范人物和事迹……。他赋予宣传鼓动工作的形式以非常广泛的含义,甚至认为:一个人一旦与别人交谈,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1929年写作《古田会议决议》时,谈到红军宣传工作的形式,仅办报一项,毛泽东就列举了党报、政治简报、壁报、画报四种形式。除此类形式外,他所要求的宣传形式还有传单、布告、宣言、标语口号;办训练班,个别谈话,召开各种类型的会议,开展识字运动,讲革命故事;组织宣传队和俱乐部,进行化宣传,开展捉迷藏、踢足球、听音乐、唱歌、戏剧乃至武术等文体活动,总共十几项之多。1938年在作《论持久战》的报告时,毛泽东谈到在全民族中进行抗日的政治动员,“怎样去动员?”他发问,进而答道:“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①总而言之,要利用一切有效的形式。

延安时期,在毛泽东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加上党中央获得了较长时期稳定的立脚点,物质条件也有所改善,宣传鼓动工作的形式配合着内容,获得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81页。

1. 利用标语口号、传单宣言

标语口号、传单宣言等宣传鼓动形式,具有简便易行,鼓动性强等特点,是我党早期活动中最普遍运用的一种形式。1922年安源煤矿工人大罢工时,根据当时任党的湘区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的指示,李立三等同志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激起了工人群众的斗争热情。1923年,京汉铁路总工会发动“二七”大罢工时,提出了“为争自由而战”、“为争人格而战”、“为争我们的切身利益而战”的口号,并散发《敬告旅客》、《敬告本路司员》的传单,动员、鼓舞、激励广大铁路员工、广大旅客联合起来进行斗争。1925年,毛泽东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为了让农民更加容易理解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他把它解释为“打倒洋财东”,使农民一听就懂。1929年,毛泽东又总结了红军宣传工作中运用标语口号、传单宣言等形式的经验教训,具体指示:传单、布告、宣言等宣传文件,“陈旧不新鲜”,旧的应加以审查,新的应从速起草,内容“要切合群众的斗争情绪,除一般的发布暴动口号外,还要有适合群众斗争情绪尚低地方的日常生活口号,以发动日常斗争,去联系着那些暴动口号”,还应“依照不同的时间(如秋收与年关,蒋桂战争时期与汪蒋战争时期)制出不同的宣传和鼓动口号”。^①同时还指出,宣传品的散发和邮寄都不得法,需加以改变,“除有计划的在敌人经过道路两旁多写切合某现实部队的标语外,还要将传单存储于沿路党部及群众机关手中,候敌军经过时,巧妙地传达给他们”。^②

延安时期,报纸书册,通讯广播等宣传形式有了很大发展,但毛泽东对于标语口号、传单宣言这些传统的、初级的宣传形式,仍

^① 《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文选》,第364—365页。

^② 《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文选》,第367—368页。

十分重视,认为不仅需要,而且应当发展和提高。

当时发生了这样两件事。

一件事是 1938 年,在延安鲁艺美术系学习的 17 岁的钟灵,被派在延安城墙上写标语。当写到“工人农民联合起来争取抗日胜利”这条标语时,因“工人”两字与整条标语的笔划从美术角度看协调,钟灵便把“工人”写成隶书的“工人”。一次毛泽东从延安城墙边走过,看到了这条标语。1942 年整风时他对此提出了批评,他说,“这个同志是古代文人学士的学生是无疑的了,可是他却要写在抗日时期延安这地方的城墙上,就有些莫明其妙了。大概他的意思是发誓不要老百姓看,否则就很难得到解释。”^①后来,毛泽东说到这件事时,说“我批评的不是那两个字,而是批评宣传工作不看对象。把那种字写在延安的城墙上总不对吧?”

另一件事是 1942 年延安整风中毛泽东要求学列宁写传单,他引用《联共(布)党史》中的材料说,列宁每写一个传单,都要和熟悉情况的同志商量揭露厂主虐待工人的事实,载明工人群众的要求,每一个这样的传单,都大大提高了工人们的精神,他指出,“我们是赞成列宁的吗?如果是的话,就得依照列宁的精神去工作。”^②

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用标语口号、传单宣言开展宣传鼓动工作,有着很高的要求,倾注了很多心血。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无论是党组织,军队,还是边区和根据地的政府,几乎都把标语口号、传单宣言作为开展对内对外宣传的最基本手段。只要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党政工作人员出现在哪里,标语口号、传单宣言也就会出现在哪里。“枪口对外,一致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等待就是

^① 转引自《文摘报》,1992 年 2 月 23 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 842 页。

死亡”，“延迟意味着死亡”，“参军保田”；“拥政爱民”，“兵民是胜利之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从这些至今读起来仍会激起心灵震撼的极富感召力的标语口号中，我们可以窥见当年标语口号、传单宣言所起的重要宣传鼓动作用。

2. 办好报纸书刊

报纸书刊，特别是报刊，是毛泽东延安时期倡导的最主要的宣传鼓动形式。

毛泽东的办报活动可以追溯到党的创建时期。1929年7月14日，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它是一张四开四版小型报纸，以评论为主。计有《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湘江大事述评》、《世界杂评》、《放言》、《新文艺》、《特载》、《甚么话》等栏目。报上的文章大部分为毛泽东亲笔所写，内容极富战斗性，形式丰富多采，在当时四百多种革命报刊中它出类拔萃，引人注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毛泽东曾代理国民党宣传部长，并任国民党机关刊物《政治周报》前期的主编。在毛泽东任职期间，这份报纸在打破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宣传、保卫国共合作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方面，起了杰出的作用。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时期，毛泽东曾亲自编辑新闻简讯，向红军进行时事教育。古田会议以后，便统一规定在红军中出版《时事简报》。它的内容主要是报导国际国内的政治消息，游击地区群众斗争情形和红军工作情形。一般每周一张，手抄壁报形式，也有邮印小报。1931年12月11日《红色中华》创刊。它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联合机关报。毛泽东亲自为该报撰写文章，《必须注意经济工作》、《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这些著名文章和调查报告都是由该报发表的。红军长征后，办报活动才被迫停止。

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关怀下,办报活动立即恢复。1936年1月《红色中华》复刊,同时期还发行了《解放》周刊。

1939年至1940年,延安的报刊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主要是创办了许多中央一级的报刊。例如,1939年2月7日原《新中华报》改组为党中央的机关报,同时仍是边区政府的机关报;10月20日党中央出版的以党的建设为中心内容的《共产党人》创刊;1940年2月7日由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办的《中国工人》创刊;2月15日边区文化协会的机关刊物《中国文化》创刊。除此之外,还有八路军总政治部出版的《八路军军政杂志》、全国青年联合会延安办事处主办的《中国青年》等。报刊这一繁荣局面的出现,与毛泽东的亲自指导是分不开的。他为其中多数报刊题辞,或撰写了发刊词,及其他文章。他给《新中华报》的题辞是:“把新中华造成抗战的一支生力军”。^①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深刻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三条根本经验,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他在为《中国工人》写的发刊词中,对办好报刊作了重要指示:“一个报纸既已办起来,就要当作一件事办,一定要把它办好。这不但是办的人的责任,也是看的人的责任。看的人提出意见,写短信短文寄去,表示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这是很重要的,这样才能使这个报办得好。”^②

毛泽东不仅指导和关心着报刊的创办,而且把报刊能否健康成长,即能否真正起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当作一件大事,记挂在心头。

《解放日报》是于1941年5月16日创刊的、革命根据地出版

^① 《中国新闻事业简史》,第193页。

^②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48页。

的第一个大型的、每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影响最大的报纸之一。毛泽东常常过问报社的工作。1942年《解放日报》改版前夕,毛泽东亲自召开改版座谈会。会上,他深刻阐述了关于整风和利用党报的问题,并征求各方代表人士对报纸改革的意见。会后,他亲自为改版后的《解放日报》第四版拟订征稿办法,向一些知名人物或部门负责人征稿,其中开列出范文澜、彭真、艾思奇、蔡畅等十六位的姓名及稿件字数。

《抗战日报》是晋绥边区报。1944年12月,毛泽东在给《抗战日报》的指示中,谈了怎样办好地方报。他说:“本地消息,至少占两版多至三版。排新闻的时候,应以本地为主,国内次之,国际又次之。对于外地与国际消息,应加以改造,有些应印成小册子。不是给新华社办报,而是给晋绥边区人民办报,应根据当地人民的需要(联系群众,为群众服务),否则便是脱离群众,失掉地方性的指导意义。”^①

毛泽东在办好报刊方面还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如办报要走群众路线,“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②报刊要增强党性,使“宣传服从于党的政策”,“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倾向”;^③宣传一定要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要多载些生动的文字,切忌死板、老套……。

毛泽东之所以以极大的注意力关心和指导报刊工作,用1942年中宣部有关文件的话说,就是“报纸是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有力的工具,每天与数十万的群众联络并影响他们”;^④用毛泽东本人

①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20页。

② 《毛泽东新闻理论研究》,第345页。

③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96—97页。

④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第126页。

的话说,报纸是“指导政治、军事、经济的一个武器,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一个武器”。^①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下,报刊事业确实“一年比一年进步”。^② 抗战初期,据不完全统计,在华北、华中两个主要敌后解放区,就有小型报刊七百余种。在全党办报的思想指导下,到1944年11月,仅边区的通讯员就有近2000人,其中工农通讯员达1100百多人。在乡村、工厂和部队,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黑板报运动和读报运动也开展起来。1944年秋天,陕甘宁边区就有大众黑板报六百多块。一万多群众参加了读报组。在华中解放区,1945年5月,有三分之二的乡成立了读报组。报刊成为指导工作、教育群众的一件有力武器。

书籍的出版,在延安时期也是展开宣传鼓动的一种有效形式。在党中央和毛泽东指导下,当时除了出版了马恩列斯的原著,还出版了大量中级读物、补充辅助读物、各级教科书以及各种革命的书籍、小册子,起到了教育人民的作用。

3. 建立人民通讯和广播事业

毛泽东对于建立人民通讯和广播事业,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早在1931年初,中央红军就建立了自己的无线电通信队伍。毛泽东敏锐地认识到这种新技术对于革命事业是很重要的。一天下午,在一个用来做红军总司令部的祠堂里,当时任红军总政治委员的毛泽东与朱德总司令,一同接见了无线电通信队队长王诤等同志。毛泽东亲切地对他们说,“无线电还是个新技术,你们学了这一门很有用,也很难得。现在你们参加了红军,就要把你们的这些技术用来为工人、农民服务。希望你们好好地红军建立无线电通

^①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13页。

^②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13页。

信努力工作。”^① 经过极其艰苦的创建工作,到 1931 年底,苏区召开党代表大会和中国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时候,红军电台已开始以它的特殊功能发挥宣传鼓动的作用。它不仅为大会抄收国内外新闻,向大会代表提供内容广泛的信息,而且首次向外界播发了苏区新闻,使我党第一次越出了敌人的“铜墙铁壁”,向全国人民传播了革命的声音。

我党正式组建新华通讯社就在 1937 年 1 月党中央由保安迁至延安之时。社长是博古,工作人员只有三人。当时没有印刷厂,没有铅字,只能刻蜡版。每天晚上十一点至十二点的时候,毛泽东一定来看当天的第一手消息,看国民党的消息、国际消息、解放区的消息,在通讯社办公的小小破庙里,一坐就是一两个钟头。^② 到了 1939 年,新华社不仅有翻译部门,而且有了自己的编辑采访部门,有自己的通讯记者网和分社组织,也有能保证需要的印刷机构。它的业务,除收集和发布人民所需要的新闻,还起着党中央的喉舌作用,成为党中央指导全国人民抗日斗争的重要工具。

1940 年 3 月,周恩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带回一部广播发射机,中央立即发出了建立延安广播电台的指示。毛泽东对于我党宣传鼓动事业面临的这一新的发展关怀备至。当他得知延安台只有唱机,没有唱片,常常是由播音员唱革命歌曲给听众听,便马上把自己收藏的二十多张唱片送给延安台。他知道我们建立广播事业

① 《新华社回忆录》,第 2 页。

② 《新华社回忆录》,第 30—31 页。

的一个极大困难就是缺少通信材料,便给通讯材料厂题词:“发展创造力,任何困难可以克服,通讯材料的自制,就是证明”,^①鼓励他们自力更生。他亲自撰写瓦解敌军的广播稿,利用广播适时揭露敌人,并把一些重要消息及时登发予以广播;他指示各地应注意接收延安的广播。为此,党中央也作出指示:“各地应经常接收延安新华社的广播,没有收音机的应不惜代价设立之”,^②并要求“各地报纸应经常发表新华社广播”。^③

1947年,解放战争形势十分严峻,党中央毛泽东转战陕北。新华社的部分人员也跟随在毛泽东身边。毛泽东关注着他们的工作,随时给予鼓励,并亲自撰写社论等文章。在转战陕北的一年中,他和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为新华社撰写的社论、评论等有七十多篇,实际上成为新华社工作的具体领导者和参与者。新华社的工作人员通过广播,随时向人民群众传递着战争的胜利消息和党中央、毛泽东的声音。例如,1947年5月15日,新华社播发了陕北军民在安塞真武洞举行祝捷大会,周恩来宣布“党中央毛主席还在陕北”的新闻;5月30日播发了毛泽东写的社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7月2日播发了刘邓大军渡过黄河,挺进中原,揭开我军战略反攻的序幕的新闻;9月12日发表了《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的社论,号召人民“把解放的旗帜插到全中国!”10月10日又播出了毛泽东撰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响亮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一位当年的新华社工作者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曾说,这个历史性号召播出后,如惊天巨雷,顺应民意,极大地振奋了人心。“新华社的陕北电讯,真是维系着全国几亿

① 《毛泽东新闻理论研究》,第346页。

②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第99页。

③ 《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第99页。

人的心啊!”^①

4. 开会、办班、谈心

开会、办班、谈心是我党早期宣传鼓动工作实践中,采用的最基本、最主要的形式之一。毛泽东对此类形式极为重视。在《古田会议决议》中,他以相当多的篇幅来研究、讨论怎样改进这类形式,提高宣传鼓动效果。关于开会,他提出要充分利用会议形式,召开各种类型的会议,以把官兵层层组织起来。要有小组会,支部大会,纵队及全军一级的会议;要有召开批评的生活会,要有读书谈报会,政治讨论会;还应有计划有组织地召集各种群众大会;要预先规定开会秩序、演说人、演说题目及时间。^②关于办训练班,他提出要分层次,分对象地办三种类型的班,即为一般兵士讲授初步政治常识的普通班;造成较高一级政治常识人才的特别班;提高下级干部的政治水平线,以备将来能充当中级干部的干部班。他还为训练班的政治课规定了要搞启发式、讨论式等教授方法。关于谈心,他也作了非常详尽的论述,指出谈心的重点对象,要求谈话等前调查谈话对象的心理及环境”,“须站在同志的地位,用诚恳的态度”与对象谈话。^③毛泽东的这些论述,都是对我党早期此类宣传鼓动实践的宝贵总结。

到了延安,毛泽东对于开会、办班、谈心这类宣传鼓动形式仍给以充分的肯定,并认为这类形式的潜力和作用是极大的。

对于开会,1944年在一次文化教育座谈会上,他曾明确说过:“过去我们学会了一种工作方式,就是开会。这个方式各处盛行,多年以来我们就没有放弃过这种工作方式。……外国也开会,日本帝

① 《新华社回忆录》,第183页。

② 《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文选》,第367页。

③ 《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文选》,第371页。

国主义东条也开内阁会,美国邱吉尔也开内阁会,美国还开国会。古时也开会,叫做宫廷会议,……现在我们边区,开会是最重要的工作方式。”^①整个延安时期,开会确是最重要、最普及的思想和宣传鼓动形式之一。当时党内的各种会议很多,报告会,学习会,讨论会,整风会……,特别是整风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非常严肃认真,能够使与会的党员干部受到深刻的教育。1942年年底的高干整风会就是如此,通过充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许多未曾暴露的问题暴露出来了,有些很难搞通的思想问题被搞通了。在军队工作和群众工作中也广泛利用了会议形式。在军队中,有前线动员会,有教育俘虏兵的诉苦会,有协调官兵关系的民主会;在根据地群众中,有生产动员会,有宣讲形势的报告会,有声讨敌人的集会,也有悼念为民族、为革命光荣阵亡的将士,使人民更加团结起来的悼念会。在国民党统治区,通过召开茶话会、酒会、聚会、报告会、招待会等多种灵活的会议形式,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办训练班的方式,在延安时期也有很大发展。由于处于相对和平的环境,这个时期,我们党有条件把办训练班扩大为办各级各类学校,学校里又可以分设长期班和短期班。毛泽东对于办校开班、培养教育干部和各级各类革命所需人才是非常重视的。他为许多学校题词、演讲,亲临指导,给予这项工作以极大的推动。就拿培养干部的“重工业”基地——抗日军政大学来说,毛泽东曾亲任政治委员;亲自为抗大制定教育方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亲自书写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并亲自授课,他授课时绝不搞“满堂灌”,每

^①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13—114页。

天除讲两三小时外,主要让学员自己阅读、讨论、研究、整理切身经验。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抗大以其崭新的教育方针、教育方式向学员传输着先进思想,为我党我军干部队伍建设做出了伟大贡献。

谈心是最细致入微的宣传鼓动形式,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最为普及的宣传鼓动形式。延安时期的毛泽东,不仅是这个形式的积极倡导者,而且是最为优秀的实践者。有这样一件事:1937年,我军高级将领徐向前作战失利,一些人埋怨他把人马都搞光了,一个光杆司令还回延安干什么。毛泽东在这时接见了徐向前,并爽朗地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了鸡何愁没蛋呢?”他还鼓励说,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将来决不只是率领2万人马,而是要率领20万人马、上百万人马。只要有革命骨干,部队还会发展起来的。毛泽东这番充满着关怀、理解、信赖、激励的话语,一下子卸掉了徐向前心头的重负,他振作起精神,再度走上前线。半年之后从前线发来了电报,徐向前指挥的太行山区部队由几千人壮大到几万人。这仅仅是毛泽东运用谈心形式成功地做人的思想工作的一个例子。类似这样的事例,在毛泽东延安时期的工作实践中是举不胜举的。他的谈话对象涉及各种各样的人,有普通的农民、村妇,有红小鬼、勤务兵、将军,有知名的民主人士、孤傲的文人作家,也有高鼻子、兰眼睛的外国人。无论与何种人交谈,他都善于把握对象特点,用丰富的知识,亲切的话语,开通思想交流的渠道,并最终革命的道理和充满艺术魅力的谈心技巧使对方心悦诚服地折服。在党和毛泽东的倡导下,谈心活动,在党内、在官兵之间、在干部群众之间、在军民之间蔚然成风地开展着,起着传播正确思想,密切人际关系,教育和凝聚人民的作用。

5. 利用各种群众组织开展活动

我党早在1929年通过的《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宣传工作决议

案》中就曾提出：党应当参加或帮助建立各种公开书店、学校、社会科学研究会、文学研究会、剧团、演说会、辩论会等工作，并给予正确的指导。毛泽东对此是十分赞同的。他认为，适应群众对于政治与社会科学兴趣的需要，尽量利用各种群众组织开展活动，是宣传鼓动工作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形式。在《古田会议决议》中，他曾提出利用各种组织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在延安时期，这仍是毛泽东积极倡导和大力支持的一种宣传鼓动形式。在抗战初期，他就讲过，要利用一切群众组织，把不同觉悟程度的群众组织起来，根据他们的觉悟水平去启发和教育他们。

毛泽东很重视利用经济组织开展生产活动，以达到既组织群众发展生产、支援革命，又能进行自我教育的目的。1943年，在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他讲，我们有了合作社这种经济组织形式，“就可以把群众的力量组织成为一支劳动大军。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①合作社生产活动的实践表明，这确实是群众自我教育的一条路子，人们更加懂得团结互助的意义，增强了勤奋劳动、艰苦奋斗的精神，有的二流子也在生产运动中被改造过来。

通过党所领导的各种群众组织，根据自己对象的特点，开展活动，是毛泽东所主张的又一种群众自我教育形式。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他指出，号召一切抗日人民组织在工人的、农民的、青年的、妇女的、文化的和其他职业及工作的团体之中，热烈地从事抗日的各种工作：参军、运粮、除奸、爆破及救护伤员的各项军事工作；政治、经济、文化、卫生各项建设工作；灭蝗、治水、救灾各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32页。

种克服困难的工作，“这就是真正的人民战争”。^① 他说过，战争教育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延安时期，党所领导的工会、农会、妇女会、青年团、儿童团、民兵等群众团体，确实起到了组织人民，教育人民，支援革命的作用。举例来说，许多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优秀妇女，如刘胡兰等，大多数都是经过妇女组织的帮助、引导，通过参加它所组织的支援抗敌等各种活动成长起来的。

举办学会、研究会一类的群众团体，开展学习、研究活动，是这个时期利用群众组织达到宣传教育群众目的的一个特点。对此，毛泽东是积极倡导和大力支持的。比如，毛泽东为使广大干部真正做到在用无产阶级宇宙观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使哲学从书本上解放出来，率先提出成立“新哲学会”的倡议，并组织召开了学会年会。在首届年会上，毛泽东邀请了艾思奇、何思敬等大约二百位各方人士，并请其中几位就哲学的若干问题作报告或讲演。为庆祝新哲学年会举办成功，毛泽东用自己的稿酬在西山饭店里摆了几桌酒菜，他走到每一桌去敬酒，并和每个人碰杯。毛泽东这样大力支持研究会的活动，极大地鼓舞了同志们深入研究哲学问题的热情。当时，除了有“新哲学会”外，还有“中央研究院”、“时事问题研究会”、“历史研究会”等，这些研究会推动了学习理论、研究问题的浓厚空气在延安的形成，也起到了很好的自我教育作用。

建立各种文学艺术团体，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文艺活动，以达到教育人民之目的的宣传鼓动特点，在延安时期更为突出。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母女相约，夫妻相约，姐妹相约、兄弟相约、亲友相约、师生相约、成群结队地投奔革命圣地延安。毛泽东充分肯定了他们的作用，指出大批的文化人、文学家、艺术家以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41页。

及一般的文艺工作者,在为着共同的事业努力工作着,同时要求他们使自己的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①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各种文学艺术团体竞相成立,最著名的有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平剧院、战斗剧社等,与此同时合唱队、秧歌队、剧团等群众艺术团体也建立起来,给延安带来了文学、艺术的春天。形式丰富多彩、内容健康向上的文学和艺术活动在民众中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就拿歌曲来说,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一批优秀歌曲,如冼星海创作的《生产大合唱》:“开荒,开荒,前方的战士要军粮。织布,织布,前方的战士要衣服”;陕北民歌《二月里来》唱道:“加紧生产,加紧生产,努力苦干,努力苦干。年老的年少的在后方,多打些粮食也是抗战”;秧歌剧《夫妻识字》唱道:“大囤小囤都装满,丰衣足食支援前线”。这些歌曲既反映了广大军民的心声,同时又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从事大生产运动是神圣的革命事业的需要,他们唱着歌,心里充满着无比的光荣感和自豪感,热火朝天地投入了劳动。

总之,毛泽东用心血和智慧浇灌着宣传鼓动工作形式之花,使它开得更加绚丽,增加了革命宣传鼓动工作的吸引力、号召力。

(二) 宣传鼓动工作要讲究艺术

毛泽东不但非常重视宣传鼓动工作的形式问题,而且讲究宣传鼓动的艺术。他是一位出色的宣传鼓动艺术大师。

从毛泽东开始其革命生涯之日起,这一特点便已显露出来。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所主编的《湘江评论》正式创刊,此后他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61页。

在第二期至第四期所发表的《论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以笔锋犀利,气势雄浑,通俗易懂,富于感染力而引起国内进步青年的极大注目。李大钊曾在刊物上发表文章予以赞同,并通过《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向全国读者介绍和推荐《湘江评论》,表示“能看到这份很好的兄弟期刊,令人非常高兴”。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毛泽东所撰写的一些文章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至今被视为战斗性与艺术性完美结合的典范。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对于如何提高宣传鼓动工作的艺术性,已做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表述,如宣传文字要简短,要精譬;由近及远,由浅入深;说话通俗化(新名词要释俗);说话要有趣味;以姿势助说话,等等。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的宣传鼓动实践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据粗略统计;《毛泽东选集》所收录的他在延安时期所撰写的93篇著作中,有38篇是在演讲、报告、讲话和讲课稿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占总数的41%。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对于宣传鼓动工作的重视。与此同时,毛泽东对于提高宣传鼓动工作的艺术性,特别是反对党八股、树立新文风以增强实效,进行了许多精辟的论述,明确提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①这段话首次出现在1938年我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在三年多之后的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发表的“反对党八股”的演讲中,再次引用了这段文字,可见对它的重视与喜爱。那么,在宣传鼓动工作中,什么是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怎样才能做到新鲜活泼,为中国老百姓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34页。

所喜闻乐见呢？通观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宣传鼓动实践及有关理论表述，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 观点鲜明

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向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对正面思想的阐述和对反面思想的驳斥。这两方面是紧密相连、不可分离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真理只有在同错误的不断斗争中才能发展。因此，宣传鼓动工作要想取得实效，必须观点鲜明，毫不掩饰地表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而不能含含糊糊，吞吞吐吐。

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在离开陕北开赴河北的路途上，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对此进行了专门论述。他首先要求保持晋绥日报过去的优点，要尖锐、泼辣、鲜明，要认真地办。接着明确提出：“我们必须坚持真理，而真理必须旗帜鲜明。我们共产党人从来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是可耻的。我们党所办的报纸，我们党所进行的一切宣传工作，都应当是生动的，鲜明的，尖锐的，毫不吞吞吐吐。这是我们革命无产阶级应有的战斗风格。我们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就需要这种战斗的风格。用钝刀子割肉，是半天也割不出血来的。”^①

观点鲜明是毛泽东在宣传鼓动实践中一以贯之的原则。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一开始就明确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②而第四卷的最后一篇文章中，毛泽东更是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为题，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所写的文章、所做的报告、所发表的谈话中，无不体现了观点鲜明的特点。从《毛泽东选集》中所收录的毛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32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页。

泽东这一时期著作的题目上,人们便可以感受到这一点。如《论反对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反对投降活动》,《必须制裁反动派》,《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反对党八股》,《为人民服务》,等等。在许多文章中,毛泽东所具有的那种开门见山、直抒胸臆的宣传鼓动特色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此仅举两例。一是在《反对投降活动》一文中,毛泽东一开始就写道:“中华民族在日本侵略者面前,历来存在的劈头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战不战的问题”。^①如此简洁鲜明的开篇之语,具有十分强烈的感染力,自然有助于提高宣传鼓动的效果。二是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在篇首部分中只有这样一段话:“我主张将我们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其理由如此:……”这看似简单的开头却十分鲜明地体现了作者的观点,成为引导听众(这篇文章原为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所做的报告)理解和接受报告内容所不可缺少的桥梁。

需要明确的是,观点鲜明是毛泽东在宣传鼓动工作中所提倡和贯彻的原则之一,但是毛泽东从来不是把它仅仅作为一种技巧,而是认为只有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科学分析和综合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才能在宣传鼓动工作中真正体现这一点。因此,毛泽东坚决反对那种单单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使用一大堆互相没有内部联系的概念,排列成一篇文章、一篇演说或一个报告的做法,并形象地把这种做法比喻为“开中药铺”,将其归纳为形式主义。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毛泽东指出:“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这样,就不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70页。

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能济事。因为这种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筋的形式主义的方法，在我们党内很流行，所以必须揭破它，才能使大家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们所办的事才能办好，我们的革命事业才能胜利。”^①

2. 言之有物

毛泽东的宣传鼓动工作一向具有明确的目的性，是为了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说明和解决革命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以鼓舞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认清形势，战胜困难，夺取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因此，他一贯反对宣传鼓动工作中那种“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教条主义的做法。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的讲演中，把这种做法列为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并明确提出：“战争时期固然需要短文章，但尤其需要有内容的文章。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演说也是一样，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演说，是必须停止的。”^②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许多场合都一再申明他的这一主张。例如，他在《鲁忠才长征记》一文的按语中写道：“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③再如，据萧三的回忆，1939年他初到延安，毛泽东与他交谈时说起文学创作。当萧三表示自己写东西很迟缓，难成，不能“下笔千言”时，毛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3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39页。

③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58页。

泽东说：“下笔千言的，有时离题万里。”^①不难看出，言之有物是毛泽东对宣传鼓动工作最基本的要求，同时也是毛泽东一贯提倡的文风。

在毛泽东宣传鼓动实践中，言之有物是贯穿其中的一条红线。在《毛泽东选集》所收录的他在延安时期的著作中，无不体现了这一特点。在他撰写的其他文章中，同样也体现了这一风格。例如，1941年5月16日，他在为延安《解放日报》所写的发刊词的第一段话便是：“本报之使命为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②短短二十几个字便把创办《解放日报》的宗旨充分表达出来，绝无叠床架屋、拖泥带水之感，没有一个是空话、废话。再如，他在1936年8月5日为出版《长征记》所写的征稿电报只有以下一段文字：“现有极好机会，在全国和外国举行扩大红军影响的宣传，募捐抗日经费，必须出版关于长征记载。为此，特发起编制一部集体作品。望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格、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断，于九月五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勿忽视。”^③在一百多字的篇幅之中，毛泽东把出版《长征记》的意义、作用、体裁、内容、交稿时间等全部包括在其中，可称内容充实、文字简洁的典范。

毛泽东主张宣传鼓动工作要言之有物，文字简洁，并把长而且空的文章比喻为懒婆娘的裹脚，要求将其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然而，他并不是为短而短，以长短作为评判文章的标准，而是提倡“到什么山唱什么歌”，“看菜吃饭，量体裁衣”，主张宣传鼓动的形式要适应内容的需要，以提高宣传鼓动工作的实效。

① 《毛泽东交往录》，第19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55页。

③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37页。

3. 通俗明了

刘少奇在《论党》中,曾提到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并用中国人民通俗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使之成为中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战斗武器。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宣传鼓动工作中,十分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色。他所写的文章、做的报告、发表的演讲,无论是涉及深奥的哲学问题,还是复杂的国家学说,都能做到简单明了,通俗易懂,深入浅出,普通群众读了不嫌深,高级干部读了不嫌浅。这种表现形式上的简单平实首先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同时也与他不忘宣传鼓动对象的接受能力,注意语言的群众化密切相关。他认为语言必须接近民众,群众不欢迎枯燥无味的宣传,革命斗争也不需要这样蹩脚的不中用的宣传家,并曾引用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表明自己的观点:“应当学会不用书本上的公式而用为群众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们的语言来和群众讲话,这些战士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都反映出千百万群众的思想 and 情绪。”^①

在毛泽东延安时期的宣传鼓动实践中,动用群众所熟悉的事实和语言,将宣传内容化深为浅,化繁为简的例证数不胜数。比如,他在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解《实践论》和《矛盾论》时,用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来说明要获得真知,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道理;用鸡蛋因得到适当温度而变化为小鸡,而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小鸡的生动事例,来说明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这一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据当年听过毛泽东讲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42页。

课的抗大学员回忆：主席讲哲学深入浅出，讲得非常生动，活泼有趣，许多听众不断发出笑声，有时则哄堂大笑。当他听同志们反映说爱听他讲的哲学课后，幽默地说：“我折本了。我花了四夜三天的时间，才准备好了讲课提纲，讲矛盾统一法则，哪知只半天就讲完了。岂不折本了吗？”^①从这段回忆中可以看出，毛泽东为了使宣传鼓动的内容为对象所理解和接受，是下了很大功夫的，因此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恩格斯曾经说过：“简单而意味深长的句子易为人理解，印在意识中，变成口号。”毛泽东就很善于把党的政策和工作任务及成功经验，概括在几个字或一两句话中，使人牢记不忘。例如，在延安时期，他曾用“放下包袱”告诫全党干部不要骄傲和自满，用“开动机器”动员大家多动脑子，用“洗脸扫地”来形容常做自我批评的必要性，用“有的放矢”来解释理论应当结合实际，等等。这种把党的方针政策给予通俗形象的解释以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所接受的做法，是毛泽东宣传鼓动工作的又一个突出特色。

4. 生动活泼

宣传鼓动工作要做到生动活泼，这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

早在1931年3月；毛泽东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写的“怎样办《时事简报》”的小册子中便指出：“地方的《时事简报》要完全用本地的土话。从别处报纸抄下的那些文字不通俗的新闻，要把全文完全改变。红军的《时事简报》，不会写本地的土话，也要用十分浅白的普通话。”^②抵达延安之后，毛泽东在“《中国工人》发刊词一文”中又明确提出：“我希望这个报纸好好地办下去，多载些生动的

^① 《回忆毛主席在延安》，第110页。

^②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9页。

文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没味道，不起劲。^①此后，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对这一问题更是进行了大量的系统的论述。他把“语言无味”列为党八股的罪状之一。并指出：“我们党内一部分（当然只是一部分）同志所中的党八股的毒，所犯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如果不除去，那末，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拿不正确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恶习就不能肃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而对于老八股和老教条在全国人民中间的影响，也就不能进行有力的斗争，也就达不到加以摧毁廓清的目的。”^②

从毛泽东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宣传鼓动工作能否做到生动活泼，首先不是形式和技巧问题，而是一个原则立场问题，即其内容是马克思主义还是教条主义。如果脱离内容单纯追求生动活泼，无异于舍本求末。当然，这并不是说，要使宣传鼓动工作做到生动活泼，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只要立场观点正确就可以了，而无需经历一个学习的过程。事实上，毛泽东一再强调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他说：“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深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③

如何使宣传鼓动工作做到生动活泼，毛泽东堪称杰出的典范。在延安时期他所发表的许多篇著作中，都能看到很多群众的口语，使文章增添了勃勃生气和很强的说服力、感染力。如“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有饭大家吃”，“挂羊头卖狗肉”，“不耻于人类的狗屎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2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3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37页。

堆”，“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对牛弹琴”，等等。毛泽东在宣传鼓动工作中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善于运用各种比喻，使文章、演说变得生动活泼，为群众喜闻乐见。例如，他用望远镜和显微镜来形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用闯进火阵的野牛描绘日本侵略者必然被人民战争所战胜的命运；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比喻为两座大山，号召全党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挖“山”不止，夺取革命的最后胜利。

在毛泽东的一些政论文章中，必要时甚至通篇采用夹喻夹议，寓理于喻的方法，使文章深入浅出，生动引人。1942年9月，他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①便是一个突出的例证。这篇社论主要是论述党在当时的一个重要的决策——精兵简政的，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因此而板起面孔讲大道理，而是通过各种形象向全党和人民讲清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在论述过程中，毛泽东一连用了六个比喻：黎明前的黑暗，航船和暗礁，大鱼小水的矛盾，气候和衣服的关系，孙行者和铁扇公主，小老虎和毛驴。通过这些比喻，毛泽东阐述了当时的形势，存在的问题，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及其所带来的必然结果等一系列观点，使文章生动活泼，脉络明晰，严肃性与生动性、逻辑性与形象性达到了高度统一。

5、博采众长

毛泽东十分讲究宣传鼓动的艺术，并多次提出应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对外国的优秀文化采取排斥态度，毛泽东十分强调要从中外文化两方面吸取营养，以使宣传鼓动的手段更加丰富，能够更好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争取革命的胜利。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80—883页。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曾明确提出，在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的同时，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不但要吸收外国的进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们的新鲜用语。另外，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对古人语言中死了的语汇和典故，要坚决反对去用，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该继承。在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宣传鼓动实践中，十分鲜明地体现了这些原则。他对外国的政治历史和中国的历史语言十分精通，并根据对象的不同，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鼓动工作。

1936年7月，美国记者斯诺冲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封锁来到陕北。为了让斯诺了解红军的情况，毛泽东与斯诺多次进行长谈。斯诺发现，毛泽东对于古今中外的历史典故十分熟悉，而且读过希腊哲学家、斯宾诺沙、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一次，毛泽东用西红柿炒辣椒招待斯诺，并问斯诺：“听说西红柿原来有个很可怕的名字，叫‘狼桃’，是吗？”斯诺对毛泽东知识这么丰富，感到很惊讶。毛泽东接着讲述了西红柿被人发现能够食用的经过，由于西红柿枝叶分泌出来的汁液气味难闻，一直被视为有毒之果。直到18世纪末，一位法国画家在给西红柿写生时，被它的艳丽色泽所吸引，决定冒死品尝一下，结果发现味道可口，根本无毒。从此西红柿成为风靡世界的蔬菜。这个名气不大的法国画家也因此成了传奇人物。斯诺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话，立即明白了他的用意，向毛泽东说：“主席，我准备到红区来的时候，也是下了和那个品尝西红柿的法国画家一样的决心！”毛泽东高兴地说：“你这个险冒得好！你将会和那个法国画家一样，成为世界上传奇式的人物。”果然，斯诺后来写成了《西行漫记》，成为世界上的传奇人物。而毛泽东善于利用斯诺熟悉的外国典故，巧妙地对他进行教育引导，也成

为宣传鼓动工作成功的典范。^①

毛泽东对外国的优秀思想和文化采取积极学习的态度,但是在宣传鼓动工作中却十分注意对象的接受程度,绝不卖弄。他对那种对外来东西不求甚解、只知生吞活剥的做法十分反感,并将其斥为洋八股、洋教条。他指出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又必须具有民族形式,“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结合起来。”^② 因此,他在宣传鼓动中十分注意运用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语句,来阐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道理。如用孙子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魏征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说明研究问题忌带片面性;用老子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论述事物之间的联系;用孟子的“心之官则思”佐证加强学习的重要性,等等。此外,毛泽东还十分注意挖掘中国古代语言中所包含的有价值的内容,来阐明革命的道理。例如,他在延安干部会上所做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对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这两个人们熟悉的成语赋予了新的内容,他说:“‘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③ 这两个一般人都明白的成语,经过毛泽东的解释,便成为宣传革命理论的形

① 《毛泽东生年实录》第545—546页,吉林人民出版社。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3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01页。

象工具,毛泽东高超的宣传鼓动艺术确实令人由衷的钦佩。

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毛泽东在提高宣传鼓动的艺术性方面做出了许多具有独创性的贡献。例如,他所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形象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原理,他在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中首次提出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观点,从本质上揭示了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最终都将失败的历史发展规律。而这些表述都是前人所没有过的。延安时期的实践充分证明,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宣传鼓动艺术大师。

八、把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到文化工作中去

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传统。延安时期,毛泽东总结了党在思想文化工作上的经验,站在更高的立足点上,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崭新的民族文化,把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结合起来,以实现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毛泽东非常重视文化工作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他把思想工作与文化工作的结合看作搞好革命队伍精神建设的重要途径,并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探索文化工作中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到群众性文化活动中的原则和方法,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拓了广阔的思路和前景。

(一) 文化战线是革命总战

线中一条重要的战线

1. 在思想政治上动员民众离不开文化工作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①这是对“五四”以来革命运动中思想文化的地位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08页。

和作用的总结。

文化工作是在思想上政治上启发和动员群众的重要手段。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它在思想文化上对中国以后几十年的社会变革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毛泽东对五四运动评价很高，认为它造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启发了社会各阶层的觉悟，团结了革命力量，“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①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就非常重视利用文化手段发动群众。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有六个条目，其中专门有一条讲“工人学校”。该《决议》在规定党的基本任务是组织产业工会的同时，指出为此必须在一切工业部门中成立工人补习学校，“学校的基本方针是提高工人的觉悟。”^②随后，包括工人学校、工人俱乐部、工人图书馆等各种工人文化组织在党的组织指导下大量成立起来，培养了一大批革命骨干。

可以说，通过文化教育工作启发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实践活动之一。

毛泽东是党内运用文化教育手段启发动员民众的早期实践者之一。他曾利用合法的教职身份，在长沙等地主办过工人夜校、文化书社、自修大学等。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兴起，他又主持过韶山农民夜校、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寓政治启蒙和训练于文化教育之中。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也非常重视文化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的结合，把它作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

到了延安以后，面对抗战爆发的形势，毛泽东又把抗战的文化动员看作发动群众去夺取民族战争胜利的重要手段。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指出，经济上军事上弱小的中国要战胜强大的侵略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00页。

^② 《中共党史导读》，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第163页。

者,唯一的出路是在政治上动员全国民众,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毛泽东强调,这种动员“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①为最大限度地动员民众,为夺取持久战争的胜利建立深厚的民众基础,就要普及抗日知识,增强民族自尊心,“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②因此,抗战的政治动员“离不开文化的动员。”^③

抗战的政治动员应包括一切文化形式的运用,这是毛泽东对文化动员提出的一个基本要求。为使抗战动员更广泛、更深入,文化宣传工作者应采用“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④等各种文化形式,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把达到此目的的步骤和政策普及于军队和人民。抗战的文化必须贯穿着鲜明的抗战政治精神,这是毛泽东对文化动员工作提出的又一个基本要求。他认为革命的文化团体应当成为宣传抗日和扩大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政治影响的播种机。因此他不主张与时代要求无关痛痒的文化作品,强调“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⑤要求“在旧戏中也要加上抗敌或民族英雄的故事,”以激发全体军民的斗争精神和必胜信心。毛泽东曾亲身实践自己的这一主张。1937年4月,毛泽东为举行黄帝陵民族扫墓典礼写了一篇祭黄帝文。他把这一传统民族文化形式当作对全体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政治主张的极好机会。这篇祭文贯注了深刻的民族情感和爱国激情,弘扬了民族自尊和自信,向人民大众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念,堪称寓思想政治内容于民族文化形式之中的杰作。

2. 社会大变革与文化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18页。

② 《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3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79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81页。

⑤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5页。

延安时期,毛泽东倾注大量精力总结党在革命中的经验教训,研究中国革命历史和现状,进一步思考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同时也开始从更深的层次、更广的范围探讨革命运动中的革命文化问题。他从社会与文化发展的规律上,从文化在革命的政治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角度上来研究文化问题,提出了破除旧文化、建设新文化的宏大构思,使文化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的结合有了更高的立足点和更深厚的基础。

三十年代末,有一位著名的改良主义人士在延安与毛泽东讨论中国文化问题。他认为中国的问题有自己的特殊性,不必搞激进的政治革命,应当走“改造文化,民族自救”的道路;这种改造主要是“精神陶冶、乡村自治、乡村自救、农业常识”等等;中国的事情不必借用“外来的思想”,纯靠中国固有文化的自我发展,就能达到民族自救的目的。这一观点与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化问题的观点有着重大分歧。两年以后,毛泽东在不倦探索中国社会实际,总结几十年中国革命的基础上,写出了《新民主主义论》,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解答中国社会大变革中的文化问题。

按照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观点,观念形态的文化属于社会意识范畴,它必然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一定时代政治、经济的本质决定那个时代文化的本质。但文化并不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消极伴生物,它对政治、经济有巨大的影响和反作用,这种反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维护和服务于它赖以产生的政治、经济;二是在一定条件下,能够促进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变革。^①

既然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关系,按照毛泽东的思考,一个落后的社会要求得新生,仅靠文化的自我发展是不可能的,旧的文化不可能摆脱旧的政治经济的本质而创造新的社会,必须进行彻底的革命,变革一切腐朽事物赖以生存的旧政治、旧经济;但另一方面,在这个变革过程中,忽视文化这个社会变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63—665页。

革的重要因素也是不对的。在社会大变革的时代,思想文化革命往往先行一步。要想变革旧社会,必须打碎为旧政治、旧经济服务的旧文化,建立革命的新文化,使之为实践的革命运动发挥巨大的助力。因此,革命文化运动也是革命实践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应纳入社会变革的总战略。

具体到中国的实际,毛泽东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为这种特定的社会形态服务的文化有: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在中国沦陷区非常露骨地大肆推广奴化教育,摧残中国的民族文化,培植汉奸文化还有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半封建文化;为了使文化维护中国的旧政治旧经济,国民党还大搞文化专制主义,推行“文化围剿”。因为惧怕新文化唤醒人民的巨大作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还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扼杀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企图使中国民众永远处在愚昧麻木的状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运动必须包括摧毁这些腐朽东西的文化革命,消灭“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并以新思想文化教育和影响广大人民,完成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广泛的社会大变革,实现中国社会的彻底解放。

3. 建设共产主义思想指导的民族新文化

毛泽东一生都在探索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课题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寻找一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革命道路,另一个是尝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结合起来,建设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的思想文化体系,并使之成为中国人民大众自己的文化。

早在1934年,毛泽东就把这个问题提到革命政府工作方针的高度。他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的报告中说:“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

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①到了延安时期,毛泽东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同时,也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相结合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毛泽东已不再把文化仅仅看作宣传手段,而是尝试构建一个崭新的文化体系,使之成为中华民族建立新社会的三大支柱之一。这种文化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同时又是以中国民族文化为主体的,吸收外国先进思想的民族新文化。

毛泽东明确地指出:“当作国民文化的方针来说,属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思想”,^②社会主义是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从任务上说,中国的新文化“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③但是,这种新文化在本质上还是属于新民主主义的,它在具体实践上不应超越历史阶段,不能脱离中国实际。由此决定,新的文化应当具有三个鲜明的特征。

第一,它是民族的文化。它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反映我们民族的特性。毛泽东把新文化的民族特性放在首要地位是有很深的含义的。民族共同文化是一个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民族团结凝聚的纽带,是民族生命力的体现。我们要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新文化形态,但这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新文化也要大量吸收外国进步文化,但外国文化与中国民族文化是流和源的关系,新文化的主体必须是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特性的民族文化,而不是“全盘西化”。毛泽东总结道:“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④

第二,它是科学的文化。它反对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反对唯

① 《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第1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0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06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07页。

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主张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相一致。新文化提倡科学、文明、进步,反对愚昧和落后,因此是和腐朽的旧文化格格不入的。“专制主义利于人民愚昧,我们则利于人民聪明,我们要使一切人民都能逐渐地离开愚昧的状态和不卫生的状态。”^①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建立民族新文化的基础,但是由于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使中国传统文化包含着许多腐朽落后的东西,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行检验和总结,以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创造真正科学的、进步的优秀文化。

第三,它是大众的文化,因而也是真正民主的文化。它反对文化为少数人所垄断,主张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大众服务,改变过去那种“只有地主有文化,而农民没有文化”的不合理状况。毛泽东主张文化普及于大众而又提高大众,使之逐渐成为真正是群众自己的文化,把文化由过去统治愚弄人民的工具,变成反映他们的实际生活和思想感情,为他们的各种需要服务的东西。

毛泽东在宏观上提出了新文化的框架,同时也非常重视具体的文化建设问题。新文化的真正建立要从扎扎实实的基础文化建设一步步做起。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说:“还有文化建设,要使边区老百姓每一个人至少识一千个字,……还要教会老百姓闹秧歌、唱歌,要达到每个区有一个秧歌队,家家有新内容的年画、春联。”^②有了毛泽东等人的倡导,革命文化工作者的努力和边区军民的积极性,延安时代成为中国现代史上革命文化发展最辉煌的时代。延安的文化建设创造了一种体现着崭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体现着崭新的精神境界和美好情操的文化环境。

① 《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第35页。

② 《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第39页。

（二） 开通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渠道

1. 为了提高革命队伍的政治素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中国革命，与旧式的农民造反有着根本的不同。中国历史上的农民造反没有先进的思想体系作指导，不试图从根本上摧毁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体系，这种造反不免仍落入旧时代的窠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用科学的思想体系为指南，灌注着新的政治精神的事业，这项事业要取得成功，不能仅靠少数先进分子，革命队伍应当在整体上提高精神文化素质，掌握先进的思想体系。

在革命的过程中，对于拥有强大经济、军事力量的反动势力，革命的力量开始总是相对弱小的。在延安时期，外有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军事压力，国民党顽固派的“限共”、“溶共”摩擦和军事进攻，内有根据地经济上的严重困难，为使相对弱小的革命队伍有效地组织起来，逐步由弱变强，必须发挥思想上精神上的优势。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多次强调革命队伍在思想上的巩固和提高。

但是革命队伍思想上的巩固和提高一定离不开文化水平的提高。毛泽东有一句名言：“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①对于革命队伍的决定因素——干部而言，没有文化，就不能掌握先进的思想体系，不能具备必要的知识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对于革命基本力量——广大工农兵群众而言，没有文化，就不能彻底摆脱旧思想的枷锁，从具有朴素阶级感情的反抗者上升为具有自觉性、能动性的革命战士。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11页。

提高革命队伍的思想文化素质问题在延安时代初期具有特别实际的意义。在此之前,中国革命刚刚经历了挫折,党损失了大批思想政治文化水平都很高的优秀干部,新补充的大批青年和工农干部在政治上、文化上都有待提高。特别是,由于过去多次“左”、右倾错误的困扰,相当一些同志在思想认识上仍然混乱、模糊不清;相当一些同志仍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只是懂得其中的一些词句,而没有掌握它的精髓——思想方法,对中国历史、社会的特点等基本知识也所知甚少……。总之,如同毛泽东在1939年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尖锐指出的那样:“大批新党员、新干部还没有足够的革命经验。他们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还不懂得或懂得不多。他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完全的统一的理解,还相距很远。”^①

从革命的基本力量方面看,也是如此。陕北是中国经济文化最落后的地区之一。在红军进入这块穷乡僻壤之前,大部分地区还很少为席卷中国东部和南部的革命思想文化所波及。广大农村仍然为落后的封建思想文化统治着。陕北根据地建立以后,劳苦大众在政治经济上翻了身,但还没有在思想文化上翻身,“解放区已有人民的新文化,但是还有广大的封建文化遗迹。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文盲,两千个巫神,封建思想还在影响广大的群众,这些都是群众脑子里的敌人。”^②正是这些敌人在群众思想上套上了枷锁,阻碍他们的思想政治觉悟和水平的提高。

为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和工农民众的思想政治觉悟,在毛泽东的倡导和党的领导下,根据地掀起了思想整风运动和延安文化运动、文艺运动。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华民族思想史上的大解放,它使全党掌握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化相结合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1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11页。

规律,为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思想上的条件。延安文化和文艺运动扫清了工农兵群众提高思想政治水平的文化障碍,全体军民在革命觉悟不断提高、思想更加统一的基础上加强了团结。经过整风运动和文化运动,整个革命队伍的思想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成为一支无坚不可摧的巨大力量。

2. 一条不可忽视的思想政治教育途经

毛泽东非常重视通过文化工作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这条重要途径,并且悉心研究文化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和方法。

从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有关论述来看,文化教育在思想政治上有很多重要的作用。

第一,作为“革命的思想准备”,革命文化能“解除反动统治阶级所加在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使他们“警醒”,它是动员民众、壮大革命力量的重要手段。

第二,“使那些被经济的、政治的、地域的、民族的原因而分散了的‘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能借文艺的传播而‘联合起来’”,^①能够加强革命队伍的团结,“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第三,是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人们的头脑,提高思想政治水平的前提条件。要学习革命理论,“必须首先学文化,没有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就学不进去。学好了文化,随时都可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②

第四,“人民也不是没有缺点的”,一些人虽然参加了革命,但头脑中还有旧思想的影响,还有小生产意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等等。这些缺点是他们在前进中背的沉重包袱。革命的文化可以“教育人民”,“改造群众的思想”,帮助人们卸掉包袱,轻装前进。

但是文化并不能等同于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工作有自身的内

^①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28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 818 页。

容、特点和价值。正因为如此,与直接的政治理论教育相比,文化性思想政治教育就有着不可替代的特点和长处。从毛泽东的有关实践经验和论述来看,通过文化形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和长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它具有直接的政治教育不能与之相比的广泛性。首先是接受者的范围广。“各种干部、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他们识了字,就要看书、看报,不识字的,也要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所以,对于这些人的教育工作,是有重大意义的。”各种文化形式包含的社会因素非常广泛,把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使用“文化”这一概念时提到的各种形式归纳起来,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教育、宗教、卫生、社会生活方式乃至传统习俗等等,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任何人可以躲避政治理论课,却不能不接触文化,不能不在接触文化时受到某种思想的熏陶和影响。

第二,在某种情况下,文化形式比起直接的政治理论课来说,是一种更能行得通的方式。中国共产党在白区工作中就曾大量采用文化教育形式对劳苦大众进行政治启蒙。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曾把这条经验归纳进白区的工作策略:“在敌人长期占领的反动的黑暗的城市和反动的黑暗的农村中进行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不能采用急性病的冒险主义的方针”,应“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公开合法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而不要“大唤大叫和横冲直撞”。^①即使在红色区域中,在一部分群众还不具备相应的政治觉悟和水平时,采用识字倡学、文化娱乐的方式教育群众,逐步改变他们对政治的疏远态度,也比直接的政治说教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第三,文化形式容易做到“鲜明、生动”、“形象化”、“典型化”,令老百姓“喜闻乐见”,具有与上政治课、讲大道理不同的特殊效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36页。

果,这就是潜移默化,使人们在学习文化知识和享受文化娱乐的同时不知不觉地受到教育。

第四,文化具有自身的社会功能,它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必要的精神条件,是人们从事各项事业必须具备的基础之一。文化性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优势就在于,它同时具有思想教育和社会服务多种功能。毛泽东非常强调文化工作要满足群众的需要,要教给群众急需的生产、生活知识,为群众创造必要的文教卫生条件。这样,一方面可以改进群众思想文化落后的状况,为提高他们的觉悟创造文化条件;另一方面也可以改进群众的生活,提高群众生活的文明程度。在与群众进行文化交流的同时,也联络了党、政府和群众之间的感情,加强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

3. 把两个过程有机统一起来

既然文化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和经济并为之服务,既然政治思想与各种文化思想有着诸多联系,既然文化活动具有思想教育的功能,既然运用文化形式改造人们的思想具有政治理论课不具备的特点和长处,因而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党的宣传教育部门把各项文化事业逐步纳入了自己的工作范围,根据地政府也把文化教育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上。

1937年8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了题为《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鼓动提纲,提出文化教育为抗日救国服务。随后,总政治部编写了《抗日紧急动员课本》、《新战士课本》等教材,下发部队。1940年10月中宣部在《关于充实和健全各级宣传部门的组织及工作的决定》中,把“指导和进行国民教育”,“指导和推进文化活动”,“影响和指导非党的文化、教育”等纳入各级党的宣传部门的工作范围,并要求各级党委宣传部要设“国民教育科”和“文化委员会”,做好群众文化活动中的思想政治宣传和教育工作。为改变边区民众思想文化落后的状况,1939年1月,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工作报告中强调普及教育的问题。1942年9月,在李维汉赴边区政府任职前,毛泽东找他谈话,交待了四项

主要任务,其中一项就是要抓好边区的文化教育,扫除旧思想文化遗迹,促进文明和进步。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革命政权在残酷激烈的政治军事斗争环境中,花费巨大的力量搞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把文化工作纳入革命总战略,自觉运用文化为战争和政治、为人民需要和社会的进步服务,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绝无仅有的,堪称一条十分独特的宝贵经验。

开通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途径,并不是用思想政治取代文化教育的内容,而是把文化活动过程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有机地统一起来,使人们在满足各种文化需求的同时,也提高了思想水平和精神境界。根据毛泽东对这项工作的指导和实践,文化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统一有两种主要方式。

一种方式是根据实际情况,把文化教育过程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合理地搭配和衔接起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体系吸收和改造了人类思想文化发展中的杰出成果,要想学懂它,就必须具备必要的文化知识基础。列宁曾经说过:“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以为,被整个现代社会置于愚昧无知和囿于偏见这种境地的千百万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只有通过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这条直路,才能摆脱愚昧状态,那就是最大的而且是最坏的错误。”^①毛泽东与列宁的思想是一致的,他在1940年2月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说:“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都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②在为延安《文化课本》写的序言中,毛泽东指出:“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和自然常识……。没有这个基础,就是说不识字,不能看,不能写,其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限于直接见闻的范围;……虽然也能学到某些革命道理,但要学得好也是不可能的。”^③

① 《列宁选集》第四卷,第635页。

② 《延安整风运动纪事》,求实出版社1982年版,第22页。

③ 《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第200页。

文字是思想内容的载体,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是理论学习必备的基础,毛泽东认为,要学好政治理论,必须先扫除文盲状态,提高文化水平。针对工农群众和部队战士的特点,毛泽东把识字倡学放在首要地位。1934年4月,他手书“为消灭文盲而斗争”,还抽出时间亲自审看《战士课本》。针对党的各级干部的特点,毛泽东提出“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①要求组织人材去研究近百年的中国革命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作为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知识。

1939年中共六中全会以后,中央发起全党干部的学习运动,毛泽东强调在学习中要解决好文化教育 with 理论教育的配合问题。他提出了“按其程度,文化与理论或并重或偏重”^②的指导方针。按照这一方针,不应把干部教育中的文化教育和政治理论教育当成互不相干的两个阶段,而是根据学员的程度,合理地配置文化学习和理论学习的内容和比重,使其相互配合,相互促进,使学习取得实际效果。后来,中宣部在执行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议》时,采纳了这个方法,注重解决文化教育 with 理论教育的配合与衔接问题,改变了过去在政治理论教育上急于求成和形式主义的现象。

另一种方式是把思想政治内容溶入文化活动之中,使文化活动的过程同时亦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

毛泽东认为由于观念文化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因而任何文化思想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着社会生活,其中当然包括社会政治生活,文化与政治教育的结合不仅可能,而且必须。革命宣传教育家应当学会主动自觉地运用文化形式对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毛泽东在建党初期就有过这样的实践。他在湖南工人夜校讲课时,曾尝试把文化启蒙与政治启蒙融合在一起。他在给工人讲“工”字时说,“工”字上一横代表天,下一横代表地,中间一竖代表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02页。

② 《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第116页。

工人顶天立地的形象。这种伴随识字运动,配以最平浅的革命道理启蒙的方法在延安的群众文化运动中得到大规模的推广。边区成千上万不识字的群众参加读报识字组、冬学、扫盲班。认字从“红军”、“红旗”、“抗日”、“革命”等等开始,到读懂反映时事政治的课文,在逐步掌握文化的同时,受到基本的革命教育。

利用现成的文化成果,从中阐发出深刻的道理来教育干部、战士和群众,是毛泽东特别擅长的方法。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用《水浒》三打祝家庄的故事来说明辩证法。1945年在中共七大闭幕会上用中国古代寓言《愚公移山》来教育全党艰苦奋斗,树立必胜信心。1944年,郭沫若写了《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把这篇历史著作当作党的整风文件印发给党内高级干部,让大家保持政治上清醒,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直到全国解放前夕,一些高级干部在进入大城市时,还牢牢记着毛泽东这番形象、生动的告诫。

(三) 在为群众服务中使群众受到教育

1. 文化教育工作的根本出发点是为群众服务

40年代初,在党的宣传部门和边区政府的推动指导下,延安地区群众文化活动大开展。边区老百姓不仅学到了一些文化知识,享受了文化娱乐,而且懂得了许多过去闻所未闻的新道理,政治精神面貌有了很大改变。但是,党的宣传部门和政府在组织指导群众文化活动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诸如脱离群众、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形式化和简单化等等。边区教育计划草案中曾有“边区老百姓落后,不强迫就不能普及”这样的话。在教育内容中也有许多脱离实际的地方。有些内容尽管在政治上立意是好的,但距边区和老百姓的实际生活太远,不吸引人,于是发生了群众“逃学”、“躲学”的现象。边区的中等学校在抓思想教育时,曾出现用“斗争会”、“反

省”、群众压力和组织手段等办法去解决细致复杂的思想问题的简单化现象,招致人们的反感。另外,也曾出现过急于求成,企图在短时间内让学生完全树立新政治观、人生观的现象。这些情况违背了毛泽东一贯的鲜明的观点:文化应当为群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自己的文化。

毛泽东在坚持文化工作的根本出发点是为群众服务的问题上,有两个重要思路值得引起注意。一个是强调根本态度,另一个是强调了解对象、适应对象。

毛泽东认为,文化工作可以用来“教育人民”、“团结人民”、“改造群众思想”,但教育者不要把自己放到群众的对立面,把文化工作中的思想教育看成是针对落后群众的武器。把群众当成麻木无知的“群氓”,是毛泽东最不能容忍的。他曾说过一段很带感情的话:“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的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地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斗争。”^①文化教育可以帮助群众改正思想上的缺点,提高认识水平,但这必须是善意的、真诚的、耐心的,是为了使群众在前进路上卸掉身上的包袱,采用的方法“主要的在于发动人民自己教育自己,而政府给以恰当的指导和调整”^②,不能搞强迫性的“改造”。

要想让思想文化教育在群众中收到效果,就要在对象上下一番功夫,不要搞成不顾听众的自弹自唱。在延安整风前,思想文化教育曾经出现过形式主义、教条主义的倾向,不考虑群众的心理和接受能力,搞“填鸭”式的硬灌。1942年3月,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在太行召开宣教工作会议时曾指出这样的现象:有些教员上课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61—862页。

② 《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第33页。

时满口都是生硬的概念、名词,使战士以上课为苦事,一些文化水平低的干部以上文化课为厌事;歌曲、戏剧中的政治口号,讲课中的“加强”、“坚决”等等机械的内容比比皆是,讲者不顾听众,眉飞色舞,自以为是,听者昏昏欲睡,极感痛苦。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上批评了这类错误做法:“为什么不看对象乱弹一顿呢?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倒可以不看读者不看听众吗?我们无论和什么人做朋友,如果不懂得彼此的心,不知道彼此心里面想些什么东西,能够做成知心朋友吗?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①毛泽东在这里强调,教育者一定要了解对象,在方法上要适应对象。具体地说,就是要了解并适应对象的文化、政治知识背景,教育不能超出他们所便于接受的范围;要掌握和适应对象的心理意识,思想感情,能够与对象在心灵上彼此沟通,产生共鸣,教育不能超越他们所乐于接受的范围。仅从主观上的良好愿望出发,急于求成,不考虑群众实际和群众需要,就会脱离群众,“欲速则不达”,这种教育必然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建党初期,毛泽东在利用文化形式做宣传鼓动工作时,就十分重视了解对象适应对象。在湖南办工人夜校时,他就把握了群众当时对“过激主义”宣传还比较戒惧的心理,针对他们文化水平很低的事实,就以传播文化知识为号召,动员工人参加学习,同时在最基本的识字课中融进通俗的政治启蒙。

延安时期,经他大力倡导,涌现出一批能够与群众在心灵上沟通,在思想感情上发生共鸣的文艺作品。对于这些作品,他亲自给以鼓励。1944年3月,毛泽东在关于边区文教问题的讲话中,举了一个他非常赞赏的例子:吴起镇演出名叫《赵富贵》(一说叫《赵富贵自新》)的新秧歌剧后,一个原想开小差的战士受到感动,跑到连长那里去自首并请求处罚。毛泽东反问,早几年那种大戏、小说为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36~837页。

什么不能发生这样的力量呢？因为他们脱离群众，不能感染、影响群众。还有《兄妹开荒》、《白毛女》等新戏，毛泽东看了之后都非常赞赏，因为这些作品非常接近群众的思想感情，成功地调动了他们心中的是非感、荣辱感和阶级感情，引起他们心灵上的强烈共鸣，使他们从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在1944年召开的边区文教大会上，毛泽东总结了几年来群众文化教育工作的经验和不足，再次强调了文化工作为群众服务的观点，并且提出“改造群众思想的文化教育工作”的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头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由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①会后，这两条原则在边区的群众教育中得到了贯彻。当时，边区人民最关心的实际问题是抗击日寇、保卫家园以及搞好生产和生活。脱离人们的斗争和生活去讲政治大道理是不会解决实际问题，也不会引起人们的兴趣、收到思想教育的效果的。边区政府紧密联系抗战形势和农村生产生活实际，改进了教学内容。例如配合反“扫荡”斗争，识字课本就安排了“不告诉敌人一句实话”、“坚壁清野”、“埋地雷”等课文，配合农村实际，安排了村名人名，开路条、开收条等教学内容，还有生产技术知识，边区时事政治等，既解决了边区人民的实际需要，提高了人们学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同时又取得了更有实际意义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2. 要让群众喜闻乐见

文学艺术具有满足人的精神生活需要的审美愉悦功能，它把内含的思想内容形象化、艺术化地表现出来，有巨大的感染力，“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②这是文化艺术的思想教育长处。这就要求革命的艺术家用善于发挥这一长处，提高革命文化艺术的审美价

①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1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861页。

值。但是,这种审美价值的最终评判者是艺术的接受对象——广大人民群众。

毛泽东要求革命的文化宣传应当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①曾有一件事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1938年7月,毛泽东参加边区工人大会晚会,会上演出了秦腔《升官图》、《二进宫》、《五典坡》等旧戏,远近的老百姓都来观看,盛况空前,人满为患。这给了毛泽东一个启发,他说:“老百姓来得这么多,老年人穿着新衣服,女青年擦粉戴花的,男女老少把剧场挤得满满的,老百姓非常欢迎这种形式,我们应该搞,就是内容太旧了,如果加进抗日内容,那就成了革命的戏了。”^②毛泽东注意到在文学艺术上,有一个群众欣赏习惯的问题。旧的文艺形式在民间还有很大的影响,既然群众喜欢,就说明它仍有生命力。党的宣传教育工作者应当了解这种情况,尊重群众的欣赏习惯。对群众喜爱的旧文艺形式,要善于加以利用,加进新内容,使之成为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成为有现实思想教育意义的东西。据此,毛泽东后来多次提出改造旧戏、旧秧歌等旧文艺形式的问题,延安文艺工作者也创作出一大批既有积极思想内容,又有受到群众喜爱的民间文艺形式的新戏。

群众的文化水平是在不断提高的,要让群众“喜闻乐见”,不但要利用旧形式,还要善于创造新的形式,不断提高作品的审美价值,但这种创新的泉源一定要来自群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向文艺的“专门家”提出任务,要求他们挖掘“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要求他们注意“农村中的小剧团”,“注意群众的歌唱”,“注意群众的美术”,“一方面帮助他们,指导他们,一方面又向他们学习,从他们中吸收由群众中来的养料,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③不断创造出更高级的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在毛泽东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34页。

② 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第7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63—864页。

的这些思想的启发下,延安的文艺创作空前繁盛。受到工农兵群众热烈欢迎、盛行不衰的不仅有根据民间秧歌调改编的《兄妹开荒》、《南泥湾》等,也有被毛泽东誉为“百听不厌”的《黄河大合唱》、大型歌剧《白毛女》等内容新、形式也新的艺术大作,在教育人民,陶冶革命情操中起了巨大作用。

综观延安时期毛泽东关于思想文化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群众性是一个鲜明的特点。“群众”是毛泽东思考思想文化教育的逻辑起点和归宿。以提高群众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为出发点,他总结和强调革命文化启发、动员群众的巨大作用;提出建设为大众服务的民族新文化的任务;重视文化在团结人民、教育人民中的作用;重视开拓思想教育的文化渠道,使其更具群众广泛性和普及性。群众性又是毛泽东指导思想文化教育实践的原则。他强调文化要为群众服务;文化教育工作要在对象上下功夫,要在群众中收到效果,以免成为无的之矢和无功之事;并提出一些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这些思路和原则具有长远的意义,在新时期的精神文明建设中仍然值得继承和遵循。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搞好社区文化、村镇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的建设……把精神文明落实到基层”的任务,就是要求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加自觉地把群众性文化建设和群众性思想政治教育完美结合起来,创造一个为新时期人民群众服务的文化环境,培养出大批社会主义事业的开拓者和建设者,提高整个民族的精神文明水平。

结束语：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延安时期的 13 年，是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都极为丰富的 13 年。在这里，产生了系统的理论，积累了众多的经验，也孕育了优良的传统。这些东西在我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史上将永远闪耀着不灭的光辉，供思想政治工作者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从那时以来，历史已经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道路，前进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的年代。那个激动人心的时期不可避免地渐行渐远了。今天较之于过去，历史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思想政治教育的背景不同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不同了，从为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服务转变到了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不同了，从受压迫受剥削的工农兵劳苦大众转变成为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爱国者。这一系列的不同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如何处理好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准确地说，是如何处理好历史上的思想政治教育与现实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历史与现实是相通的。如何对待历史也就意味着如何创造现实。在这里，那种简单地否定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经验的态度是不足取的。没有历史就不会有我们的今天，没有历史经验的借鉴，也就不知道今天该做什么，怎样做。共产党人是从丰富的历史经验出发的。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样巨大的理论创造，不也是长期历史经验的总结吗？在这里，那种简单地照抄照搬历史上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些具体做法的态度也是不足取的。思想教育人

员的讲话并不是被教育人员获得信息的唯一渠道,忆苦思甜也不再是启发阶级觉悟最有效的手段。简单的历史模仿不会收到好的效果。唯一可取的态度就是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把历史上形成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和经验与现实的新的历史条件结合起来,从新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在新的实践中创造出新的理论和经验。为此,我们应当很好地总结和消化历史上特别是延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经验,同时也应当很好地认识和研究现实中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的挑战 and 机遇。这是把历史与现实成功地结合起来的两个必不可少的前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对思想政治工作的继承与创新提出了许多富有新意的思想。例如,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历史经验必须与新的历史条件相结合的思想;关于实行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两手抓、两个文明都要超过资本主义的思想;关于用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干部、党员、军队和人民的思想;关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思想等等,都是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也构成了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邓小平同志是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典范。

近年来,广大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在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与现实相结合,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继承与创新方面,也做了不少探索。我们这本小册子也是为这种探索所做的一点努力。当然,它是偏重于总结和消化历史上的理论和经验的。然而,历史的研究终归是为了现实的。我们也希望它能为现实的思想教育稍尽绵薄之力。

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而言,就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而言,我们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和繁重的任务,需要开拓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视野、新思路、新体制、新境界。这当然有很大难度。但是,我们有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光辉照耀,有包括延安时期在内的思

想政治教育历史经验的光辉照耀,有邓小平同志这一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与现实成功结合的榜样的光辉照耀,就一定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完成时代赋予思想政治教育的神圣使命,从而也把毛泽东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推向前进。

主要参考文献:

- 1.《毛泽东选集》第一—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 2.《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
- 3.《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 4.《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5.《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6.《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
- 7.《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
- 8.《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 9.《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论党的宣传工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 10.《中国共产党七十年》,胡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 11.《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 12.《中共党史导读》,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
- 13.《思想政治工作七十年》,国防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 14.《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姜思毅主编,解放军政治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
- 15.《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教学研究资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防大学训练部1987年编印。
- 16.《解放日报》,延安时期出版。
- 17.《西行漫记》,〔美〕斯诺著,三联书店,1979年版。
- 18.《毛主席在陕北》,中国青年出版社,1977年版。
- 19.《毛泽东伦理思想简论》,刘广东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 20.《毛泽东的文化性格》,陈晋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
- 21.《弘扬延安精神》,吴木等主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 22.《时代的精神支柱》，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 年版。
- 23.《延安整风运动纪实》，求实出版社，1982 版。
- 24.《毛泽东的读书生活》，龚育之等著，三联书店，1986 年版。

后 记

本书从 1991 年底酝酿写作到 1993 初完稿,历时一年有余。

这本书是在思想政治教育专家、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理论组负责人吴木教授提议下搞起来的。在提纲酝酿、修改和撰写过程中,始终得到吴木老师的直接而具体的帮助,因而他实际上是本书顾问。在提纲征求意见的过程中,还得到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同志和其他专家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本书由主编席文启、副主编刘阳和韩玉芳承担全书的提纲设计、初稿修改和最后定稿工作。承担本书各部分写作任务的是:开篇的话和结束语为席文启,第一部分为韩玉芳,第二部分为刘阳,第三部分为元跃旗,第四部分为冯善京、闻鸿,第五部分为林泉,第六部分为张军、韩玉芳,第七部分为郭秋元、汪杨,第八部分为侯海宏。

把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综合起来,加以研究,这还是第一次,加之编作者水平、能力所限,使得本书不能不具有初步探索的性质,疏漏、不确之处在所难免,恳望各位专家、读者指正,以期将来有机会时做进一步的研究、修改。

作 者

1993 年 3 月 14 日